

# 目 录

- 第十二战区抢夺包头归绥大同胜利果实的经过  
.....靳书科 ( 1 )
- 归绥包头战役的经过  
.....靳书科 ( 15 )
- 国民党中央党部见闻录.....郎正之 ( 33 )
- 绥远省学生军事集中训练回忆.....杜海荣 ( 46 )
- 吉鸿昌将军轶事二则.....耿泽山 ( 60 )
- 呼和浩特市“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边 计 ( 64 )
- 心中的丰碑 永恒的怀念  
——记五原战役中死而复生的宋海潮先生  
.....周树钧 ( 66 )
- 赵英先生传奇.....张尔杰 ( 73 )
- 技艺出众，传帮育人  
记我的老师——赵四.....温 万 ( 83 )
- 呼市民间艺术家周根心.....胡淑贞 ( 94 )
- 归绥两城的文昌庙与魁星楼.....刘映元 ( 107 )
- 日本宪兵队长小川暴行录.....范若珍 ( 117 )
- 日本投降后的托克托县.....范若珍 ( 119 )
- 呼和浩特药行史话.....张 杰 ( 134 )
- 归绥市的粮店行业.....赵 萃 ( 163 )
- 回忆义丰粮店.....赵国华 ( 174 )
- 关于天主教.....张辉敬 ( 130 )
- 绥远省天主教神哲学院简介.....少 林 ( 184 )
- 从东上默川各村兴建龙王庙说起.....刘友仁 ( 109 )

# 第十二战区抢夺包头归绥 大同胜利果实的经过

新书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达八年之久，中国人民受尽悲惨痛苦。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特进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并任命傅作义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受降官接受日伪军投降（当时蒋介石拟着傅作义率部到东北接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日军投降。因傅兵力不足，地区太远，完不成受降任务，未有接受，才改为热、察、绥三省受降官的）。傅作义奉命后，即在绥西陕坝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召开党政军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受降及接收有关事宜。参加会议的有绥陕边区副总司令兼第十二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董其武（总司令邓宝珊）、察绥挺进军副总司令孙兰峰（总司令张砺生）、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李世杰、副参谋长张潜，秘书长王克俊、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张濯清、保安处长陈光斗、绥远省政府秘书长于纯斋、民政厅厅长陈炳谦、财政厅厅长李居义、建设厅厅长曾厚载、教育厅厅长潘秀仁、地政局局长周北峰、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兼党政总队队长张庆恩，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会议决定由孙兰峰代表傅作义长官为第十二战区受降官，并成立东进接收指

挥部，组织成员有陈光斗、孟昭第、王雷震、周钧、苏伯安、张庆恩、张国林、苑乃安、李大超、李英夫、张恺然、许树仁、刘映元、陈雉卿、白震以及电台工作人员及警卫人员等多人。与此同时，急令战区所属各部队，即刻由防地出发，兼程向指定地区急进，配合接受日伪军投降，办理接收事宜。现就记忆所及简述如下，供研究史料者参考。时隔将近四十年，难免有错误遗漏之处，尚希知情者予以补充纠正。

### (一)

以晋兰峰为首的第十二战区接收大员，奉傅命之后，立即率领先遣指挥部人员数十人，分乘卡车三辆，迳直向包头、归绥、集宁、大同等城市挺进。并在接收大员中，内定孟昭第为集宁警备司令、张恺然为集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县长，陈光斗为大同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王雷震为副特派员、陈雉卿为主任，白震为对外联络官，负责处理集宁及大同日伪军投降及接收有关事宜。同时，傅作义长官分别向各部队下达进军命令：1、暂三军（军长袁庆荣）所辖暂十七师向包头挺进，并令该师担任第一线防务西山嘴及黄河以南二小圪堵一带的第三团（团长靳书科），即刻集结全团星夜兼程向包头急进，迅速进入包头，控制城内日军，维持地方秩序，接受日伪军投降。并令该师副师长宋海潮率领该师第一团（团长张进修）向凉城县进军，协助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该县。2、令该军所辖暂十一师（师长王子修）即刻由东胜县驻地出发昼夜兼程向归绥市挺进，迅速进入市内，维持地方秩序，接受日伪军投降。3、令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所辖新三十一师（师长安春山）即刻由驻地出发经包头沿绥包铁路线向归绥挺进，迅速进至归绥附近，协助暂十一师接

受日伪军投降。并分兵一部向陶林县进军，协助地方行政人员接受该县。令该军所辖第一〇一师（师长郭景云），由驻地出发，继新三十一师之后，经集宁向大同挺进，到达集宁后归孙兰峰受降官指挥，接受大同日伪军投降。令该军长率所辖新三十二师（师长李铭鼎），继一〇一师之后，向集宁、丰镇挺进，协助该两县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该两县。

4、令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率领该部由哈拉寨驻地出发，渡过黄河沿集宁、兴和、柴沟堡之线，向张家口挺进，迅速进入该市，担任城防，代表傅作义受降官接受日、伪军投降。为便于各地进行接收，特于事前组成各市县政务委员会，负责接收日伪物资，开展地方工作。各军、师奉命东进后，傅作义长官任命步兵旅（原五临警备旅）旅长于霖瑞为河套地区警备司令，担任该地区的防守任务。

## （二）

日本投降时，我任暂十七师第三团团长，担任西山嘴及黄河南岸二小圪堵一带第一线防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晚，接到傅作义长官直接发来的紧急电令：着我团即刻集结连夜出发，向包头市进军，担任该市城防，控制市内日军。十六日下午我团进至麻池以西地区时，傅作义长官又派汽车传令我团：“部队加速前进，靳团长在原地等候接受新的任务。”不一时，傅长官乘坐卡车到来，我即向前请示任务。傅作义长官指示说：“据报包头飞机场有日军战斗机一架，日军想焚毁。任命你为包头市城防司令，代表我接受日伪军投降，进入包头市后，命令日军放下武器，将

其控制起来，准备接受投降，不得有任何轨外行动，所有日伪物资一律贴封看管，令日军造具清册，听候接收，无长官部命令任何人员不得动用（因我系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对日军情况比较了解，可以不经翻译直接命令日军）。部队让副团长率领继续前进，你先带兵一部乘汽车速即进入包市，并将办理情况报我。”我奉命后即率一加强连及部分后勤人员先行进入包头市内，以城防司令的身份，命令日联队长兼特务机关长田中大佐（原为中佐后升大佐），不得有任何破坏行为，并勒令将企图焚毁飞机之日军士兵山田关押禁闭。随即将日军大队长尾原少佐，情报主任儿玉大尉，日军在乡军人中队长中村大尉，日本驻包头领事××（名字失记）等人召来，命令他们严格掌管好日军与在乡军人（日军中有一部分系日军退伍后的，在乡军人重征入伍的）及日本侨民，不得有任何不法行为。并命令分别集结在几个地方，等候处理，不论任何人无城防司令部发的通行证，一律不许在大街上行走。同时，将日军特务机关的无线电台先行接管，责令儿玉大尉负责向张家口及大同日军进行联络，通知各处日军向我军投降。就在此时，从包头日军特务机关得悉：①驻张家口市的伪蒙疆日军指挥官根本博中将，已奉到侵华日军总指挥冈村宁次大将之命，令包头及大同等地日军直向第十二战区受降官傅作义司令长官投降；②驻归绥及集宁日军，已于日前乘火车撤至大同，集中候令投降；③归绥市内的秩序暂由伪蒙军维持；④伪蒙军总司令李守信命令驻归绥的伪蒙军参谋长包贵廷率归绥市及其他等处的伪蒙军直接向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受降官投降，听候处理；⑤伪蒙军有一个师（第九师）起义投降了八路军。

此时，我一面将对日军处理及所获情况呈报傅作义长官，一面令部队在包头城外宿营，严格遵守纪律，好好休息一夜，明日上午整队进城。当晚第十二战区长官部进驻于麻池村内。傅作义长官接到我团上述报告后，即又命令暂十一师和新三十一师，务于本月十九日前排除一切障碍（估计在察素齐或毕克齐可能遭到八路军的阻击），进入归绥市内，接受日伪军投降。又令在萨、托二县之间活动的游击支队司令部郭长清即率所部向归绥急进，抢先进入归绥市内，等候孙兰峰受降官接受日、伪军投降。同时又急电孙兰峰迅速进入归绥市接受伪蒙军投降。

### （三）

我团于八月十七日上午十二时进入包头。当全团官兵身着草绿军装，脚穿麻织草鞋，人人精神饱满，打着雄威战鼓，吹着响亮军号，迈着整齐步伐，唱着胜利凯歌，雄纠纠，气昂昂，列队进入城内时，市民夹道欢迎，军民互相握手问好，亲人相逢分外亲。特别是那些离别八年的傅部官兵家属一见亲人，高兴的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有的甚至跟在部队的侧面，直到入城式结束。部队进城后，立即将城防全部接管。除对重要关卡派兵驻守外，并将日军所看管的武器、弹药、粮秣、医药以及其它军用物资仓库等全部查封，派兵看守，规定没有长官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随意动用。责令日军管理人员将各库存物品，分别造具清册，听候有关部门派人接管。

一切城防布置妥善后，傅作义长官及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即于次日（十八日）进驻包头市城外电灯公司院内。傅

作义长官进驻包头城后，为了尽快恢复包头市的正常秩序，特令马秉仁为包头市警备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建立市政机构，开展市内工作。但其时马秉仁正忙于组织警备司令部及建立市内各行政机构，对日伪物资仓库仍然暂由城防部队派兵看管，还未着手进行接收。一直到我团调离包头开往归绥时，才行正式接管。

我团进驻包头之后，新三十一师即沿包绥线向归绥兼程前进，行至毕克齐火车站时，不幸与坚持艰苦抗钱的大青山下来的八路军发生冲突，这时铁路被破坏。安春山师长即令前卫团第九十三团(团长赵晓峰)投入战斗。从而战端轻启，萧墙祸起，令人痛心。傅作义长官闻讯，深恐归绥市被八路军先行占领，严令安春山师长不顾一切困难，务于当日，占领毕克齐，将铁路迅速修复，继续向归绥前进。这时，暂十一师也由该师副师长刘景新率领该师第二团(团长郁傅义)先从东胜出发，连夜由高龙渡口渡过黄河向归绥急进。郭长清游击支队也奉命由托县地区向归绥市快速前进，企能抢先进入归绥城内夺得首功。与此同时，第十二战区另一游击支队司令兼归绥县县长乔汉魁，也奉命向归绥急进，期能首先占领归绥市。

八月十八日上午，郭长清部到达归绥城南茶房附近，游击支队司令兼归绥县县长乔汉魁偕同伪蒙军骑兵旅长奇子祥所派的连长奇玉林及副官张子芳等也赶至旧城南郊附近村内。郭、乔两部得知八路军已先进入市内，并占领旧城小什字街及小教场等处制高点，同伪蒙军正在战斗。即由奇子祥的副官同伪蒙军师长门树槐联系后，由郭长清率领该部由旧城南门突入，向八路军展开争夺战。正当战斗激烈进行时，暂十一师刘景新副师长率领的先头部队第二团也进至归绥市

郊，亦即参加战斗。八路军因众寡悬殊，主动撤退。此时，新三十一师安春山部也从毕克齐沿铁路线向东进至归绥西郊。郭长清部及暂十一师、新三十一师先后进入归绥市内。先遣指挥部孙兰峰受降官，也随安春山师进入归绥市内，代表傅作义司令长官接受伪蒙军投降。傅作义令暂十一师驻防归绥担任城防。令新三十一师向陶林、兴和推进，协助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该两县。令郭长清向清水河县推进，配合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该县。二十日一〇一师继新三十一师之后进入归绥市附近，孙兰峰受降官指挥该师继续向集宁大同挺进。

八月二十二日，傅作义司令长官由包头乘火车到达归绥第十二战区长官部驻麻花板营房内，将伪蒙军各部队改编为第十二战区第十路军，为了安定伪蒙军的情绪，仍任命李守信为总司令，包贵廷为参谋长代行司令职务，任命门树槐等人为师长。将伪蒙军炮兵部队改编为第十二战区直属野炮营，令暂十七师第三团第三营少校营长张令功为该营中校营长。伪蒙军兵工厂厂长兼炮兵团团长张启祥任命为第十二战区炮兵副指挥官(指挥官刘振蕻)，伪蒙军官学校官兵仍令住该校听候分发安排。将伪绥西联军编为第十二战区第一集团军，任命王英为集团军总指挥。成立绥远省政务处，由李居义任主任委员，张遐民为副主任委员。任温永栋为归绥市警备司令兼归绥市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韩伯琴为归绥市副市长兼归绥市警察局局长。朱恩达为归绥市稽查处处长。与此同时，绥远省政府也由绥西陕坝陆续迁来，占用原旧省政府大院。除在陕坝时原绥远省政府的各厅长及原绥西河套各县县长未更动外，傅作义又明令任命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军医



处长杜勤书兼任绥远省卫生处处长兼省立医院院长，刘建勋为公路处处长，张立范为农林处处长，张遐民为合作管理处处长，常佩三为社会处处长，仇曾武为人事室主任，杨凯南为归绥县县长，张恺然为集宁县县长，卢建飞为丰镇县县长，王觉民为陶林县县长，乔汉魁为凉城县县长，陈绍为清水河县县长，卫力石为武川县县长，于维欧为萨拉齐县县长，李麟兆为托克托县县长，鲁凤昌为和林县县长，卢文桀为兴和县县长，石正中为固阳县县长，全文斗为包头县县长。

#### (四)

孙兰峰率先遣指挥部人员及一〇一师于八月二十二日到达集宁，督饬集宁警备司令孟昭第及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县长张恺然接收集宁，安定地方。傅作义长官在孙兰峰未到达集宁之前，通过包头日军特务机关的电台，命令张家口日军指挥官根本博中将即饬令大同日军直接向孙兰峰受降官投降（大同日军归张家口日军指挥）。大同日军指挥官接到命令之后，即派日军两个中队（相当于我军两个连的兵力）乘火车到集宁车站来迎接孙兰峰受降官。孙等一行乘火车行抵红沙坝时，铁路被破坏，火车出轨不能前进。只好让机车（火车头）拉着未脱出轨道的车皮将孙兰峰等运送到大同。孙到大同后，日军指挥官设宴招待孙等一行。席间日军为表示殷勤，特找来女招待数人为孙敬酒，孙大为不满说：“这成什么体统，为什么不让你们日本女人来敬酒呢？”吓的日本人不敢申辩。只是说：“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请宽恕！”是日孙等接收大员住在大同饭店。特派员办事处设在丽生魁商

号。郭景云率领的一〇一师当日也赶到大同，驻大同车站附近，协助孙兰峰进行接收。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孙兰峰等正在研究如何接受大同日军投降及接收日伪物资等问题时，大同日军指挥官突然拿着山西太原日军指挥官给他的命令：“着大同日军直接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全权代表雁北地区领导小组楚溪春受降官投降，并将日伪一切物资交由楚等接收。”正谈论中，阎锡山的参谋长楚溪春乘飞机到达，直奔孙兰峰的住所，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说：“大同是山西省的地方，第二战区的管辖地区，你们凭什么到这里来接收呢？”孙兰峰说：“大同是第十二战区的管辖地区，属于热、察、绥三省受降范围，当应由十二战区接收。”楚溪春凭着上述理由，又有阎锡山的命令，日本人的支持，以及楚本人在晋绥军的职位和资望都高于孙兰峰，是孙的多年上级，态度非常强硬，非要接收不可。孙兰峰则以奉傅作义命令这是十二战区应接收的地区，且有一〇一师军事力量，分毫不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竟各自拍案反目，不欢而散。孙兰峰将此情况电傅请示解决办法，张家口日军指挥官根本博也同时电呈傅作义请求裁决。傅作义接到孙兰峰及日特务机关转来根本博的电报，经一再考虑，认为大同虽属第十二战区的范围，属于热、察、绥的受降地区，自应由十二战区受降，但阎锡山是傅多年的老上级，楚溪春是多年的老朋友，大同是山西的辖区，日军又倾向于山西一方。若强行接收，必然影响今后时局的发展。经过反复研究，还是以礼相让为宜。这样既不失双方和气，又不影响晋绥团结，使日军也好处理。最后决定分电孙、日双方，大同交由第二战区接收，纠纷始告平息。

大同受降问题解决后，孙兰峰随即带少数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北平，随同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东北三省受降官熊式辉及接收特派专员蒋经国等到哈尔滨，同苏联红军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接洽对东北三省日军受降事宜。

### (五)

在张家口的伪蒙疆日军指挥官根本博，奉侵华日军总指挥冈村宁次大将之命，向热、察、绥三省受降官傅作义司令长官投降。根本博的电报，是通过包头日特务机关的电台，直接拍向傅作义，并请速派大军来张，以便进行投降交接。傅接电后，即令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率部前往，接受投降。马奉命后急率所部由哈拉寨地区星夜渡过黄河沿集宁、兴和、柴沟堡之线，向张家口挺进。一路行军顺利，未遭任何阻击，夜晚进抵柴沟堡，宿营后，夜间子时许被八路军包围袭击，里应外合，一举袭入堡内，战斗异常激烈。马占山突围不出，不得已从城墙用绳子吊下来，才行脱走，率残兵败将撤回集宁一带。马军败退后，傅部再无部队派往。但张家口日军，因被八路军围攻甚急，多次电请派军接收，而不可得。紧急时甚至请求傅长官哪怕用飞机派一两位大员前来，日军即可遵命投降，听从指挥。而傅长官连一两位接收大员也派不出来。其时，蒋介石虽任命冯钦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并已到包头数日，但冯本人无部队护送其前往，也无法到职。最后苏联红军进抵张北狼窝沟坝上，在此情况下，根本博偕同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率日军和伪蒙疆军政人员乘火车到北平，向北平受降官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投降。行前，根本博特给傅作义长官来电(由包头日军特务机

关电台转来), 陈述其情, 表示遗憾。张家口遂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接收, 成立察哈尔省人民政府, 张家口市归人民所有。

在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向张家口进军的同时, 傅作义长官令暂十七师副师长宋海潮率领该师第一团张进修团前往凉城县协助地方政权抢夺该县城时, 在凉城附近被八路军迎头痛击。战斗异常激烈, 官兵伤亡甚重。由于宋海潮指挥失当, 全团几被全歼。傅作义长官将宋海潮撤职( 遗缺由郑海楼接充), 这是第十二战区继马占山军柴沟堡之役后, 又一次出不义之师的败北。

#### ( 六 )

侵包日军及日在乡军人和日本侨民, 经我军接管后, 安分守己, 未发生任何不规行为。放下武器后即在指定地点集中, 听候遣返回国。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日军将各个仓库中的武器、弹药、服装、粮秣以及其他一些日伪物资分别造具清册, 经双方负责人签名盖章交接完毕, 并由我方将受降情况呈报国民党中央备查, 在全国各地区的受降工作中, 包头市名列第一, 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嘉奖。

接收工作全部清结后, 即在包头市聚德成饭庄礼堂内举行受降仪式, 由暂十七师师长朱大纯代表傅作义受降官接受日军投降。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代表日军向我受降官进献军刀敬礼投降。仪式结束后, 由我方设宴款待日方投降人员, 以示宽厚。次日日军设宴向我军致谢。最后由我团派兵两连, 由第二营副营长率领, 将日军及日在乡军人与日侨民眷属等共计二千七百余, 用军用专车护送至大同, 交由大同日军接管, 而后和大同日军一起经天津遣返回国。

在我团遣送日军到大同之前，日军田中大佐请求火车路经归绥时，允许他下车到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向傅作义受降官认罪致谢，以示敬意。经请示傅作义长官同意接见。接见时由傅的日文秘书苑乃安担任翻译。

### (七)

日军迁返后，由重庆来了两位朝鲜客人，负责人李某（名字失记）。代表韩国（南朝鲜）政府前来接管朝鲜侨民回国。为了工作开展顺利，特向我城防司令部作了拜会，要求帮助搞清侨民人数，并允许迁返回国。在饭店租用礼堂举行中朝联欢，庆祝抗战胜利，设宴招待各方人士。联欢会由朝鲜的那位李某主持。在致欢迎词时，大讲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多年统治亡国之痛苦，感谢中国及同盟国家帮助他们复国之恩德。联欢会后第三日即携朝鲜侨民男女约一百二十余人，一起由归绥乘火车经大同转太原到天津乘船返国，对我军给予照顾表示感谢。

我困在担任城防期间，为了不发生意外，执勤官兵非常认真负责。一天傍晚，有三位身着异服人士（其中有一位外国人）进城，卫兵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有无护照？三人中有一人口出恶言：“你管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没有护照就不能进城吗？”态度非常恶劣。这时值班排长在屋内听见外边争吵，即出来过问此事。这位口出恶言的人，不容分说伸手上去打了排长两个耳光。并说：“你们连我们别动队的人都不认识吗？”因我军纪律严明，在军纪中规定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条，这位排长未与之争论，用电话报请处理。我听后非常生气。刚刚送走欺压我国人民八年的日本鬼子，

又来了什么别动队的外国人污辱我军官兵，真正岂有此理。着将他们押送城防司令部处理。经讯问才知道一位是别动队的工作人员，一位是美国教员，一位是翻译人员。我很严肃地将他们批评了一顿，最后他们承认打人不对，说话态度不好，认错之后，把他们放了回去。我认为此事就算完啦！未想到三人回去向军统局报告说：“我团官兵打了美国人，骂了他们的工作人员，要求给我处分，军统局为此事还特派负责人大特务头子唐纵来包头作了一次调查，要求将我撤职。傅作义长官明了真实情况后，一笑了之。

### (八)

我团在奉命开往归绥的前几天，傅作义长官发表王雷震为包头市市长兼包头市城防司令，介仰推为包头市警察局长，李秉智为高等法院包头分院院长，赵冠一为电灯公司经理，岳占元为包头银行行长。部队在出发的前一天，将看管的各个日伪仓库及其他物资分别交由包头市政务委员会及警备司令部接管。并将城防有关事项交城防司令部，还由我负责将伪包头警备队改编为包头市保安大队，由城防司令部指挥，暂时担任城防，维持地方秩序，不久傅作义长官又派补训一〇一师李思温部担任包头的城防。

我团部队奉命看管的日伪物资仓库，交由包头市警备司令部及政务委员会接管后，一些不法分子，即以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等贪污盗窃手段，将一些重要物资随意盗走，然后重新加封。最后傅作义长官察知此情，派员查明属实后，将警备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秉仁撤职关押，参谋长唐希舜撤职，副官处长袁荫浓以及王华亭和王某某（大汉奸蒋

辉若的副官长)等人执行枪毙。在归绥市还枪毙了赵亚民，以严明法纪。

第十二战区的这次接受包头、归绥、大同等地日、伪军的投降，实际上是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绥远全省敌占区及游击区几乎全部被第十二战区国民党军抢夺去了。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青山、蛮汉山和绥南等游击根据地的八路军，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艰苦斗争，抗战八年，牵制了日本侵华军的四个多师，伪蒙军的十多个师、伪绥西联军的三个师，使日寇未能西犯，保卫了整个大西北的英雄功勋，全部被国民党篡夺，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一九四五年十至十二月绥包反攻战役之发生。此系后话，兹不赘叙。

# 归绥包头战役的经过

新 书 科

绥包围城战役是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方部队在归绥和包头两城市进行的一次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战役。这次战役虽在归绥和包头两个城市进行，但它是一次战役的两个战场和两个地区，是两军双方同以两城互为策应，互相牵制，互为影响的一次战役。此次战役我任暂三军暂十七师第三团团团长兼第十二战区炮兵指挥部副指挥官（指挥部观测所设在我团部指挥所院内），对战役的情况知道的较多一些，并参考了有关资料。现将战斗经过分述如下，以供研究史料者参考。唯以时隔久远，虽同参加此次战役的一些人士查对核实过，仍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希知者予以补充纠正。

## 一、战役发生的起因

### （一）为抢夺胜利果实在各地发生冲突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促令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八月十日、十一日延安总部朱总司令下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战区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而蒋介石为夺取胜利果实，巩固其反动政权，一面命令日军侵华总指挥官冈村宁次饬令各地日军一律向国民党各战区受



降官投降，不得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投降；一面令各战区国民党的部队，即日向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区（沦陷区）挺进，接受日、伪军投降，并借接收之机对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艰苦奋斗、抗战八年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以期一举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在各地区建立起来的各个军区的部队，实现其一党专政法西斯独裁统治。当时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所部驻守绥远西部地区，蒋命傅作义任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受降官，并即率所部东进，接受各地日伪军投降。傅奉命后除任命步兵旅（原五临警备旅）旅长于霖瑞为河套警备司令留河套地区担任防务外，即指挥所属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誓三军（军长袁庆荣）、骑兵第四师（师长先为刘万春后换刘春方）、炮兵第二十五团（炮兵指挥官刘振衡兼）以及归傅节制指挥的二十六师（师长何文鼎原为胡宗南部）、骑兵第七师（师长朱钜林）、战车防御炮营（营长伊汉初）、党政总队（队长张庆恩）、交警总队（队长陈启祥原为别动队）、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两个师，察绥挺进军（总司令张砺生）以及鄂友三、乔汉魁、王有功、郭长清等游杂部队，分别由绥西河套、伊盟东胜、哈拉寨等地出发，昼夜兼程向包头、归绥、集宁、丰镇、大同、张家口等地挺进，抢占各市县。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在绥远地区的绥蒙军区姚喆司令员，在延安总部指挥下，于八月十六日派兵一部先行占领毕克齐镇，并亲率步骑兵各部于八月十八日上午进入归绥市内，占领小校场和旧城小十字等处的制高点，同伪蒙军发生战斗，绥中、绥东地区的解放军也先后占领了集宁、丰镇等城镇。但因国民党第十二战区的部队在人数以及武器装备上，均占优势，兵力悬

殊，寡不敌众，致将先后已占领的一些县城如归绥、集宁、丰镇、陶林等县城又为国民党军抢占。暂三军暂十七师（师长朱大纯）进驻包头，暂十一师（师长王子修）进驻归绥，三十五军新三十二师（师长李铭鼎）进驻集宁、丰镇，一〇一师（师长郭景云）进驻大同，新三十一师（师长安春山）挺进至天镇、阳高一带，骑兵第四师进驻隆盛庄，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挺进至柴沟堡，并企图抢占张家口，接受日军投降。

## （二）解放军起而反击国民党军撤防绥包

在共产党领导下，绥蒙军区部队与大青山、蛮汉山、绥南等地区的广大劳苦群众患难与共，血肉相连，先后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与晋、察、冀解放区的部队，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四个师团、伪蒙军的九个师、伪绥西联军的数个师，以及一些地方警备队等，使日寇无法西进。有力地保卫着绥西河套乃至大西北地区。而第十二战区的部队，在日本投降后，先后抢占了绥远省的大部城镇，进而图谋张家口。并将伪蒙军各师改编为第十二战区第十路军，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包贵廷为参谋长（代行司令职务），伪绥西联军王英部改编为第十二战区第一集团军。使之积极进行反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为了保卫抗战八年取得的胜利果实，坚决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气焰，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反击。在贺龙将军的统率下，晋、察、冀、晋绥和绥蒙军区的部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向绥南、绥东、大同等地推进，以优势兵力袭歼傅军。首先袭进柴沟堡内，将马占山军打得焦头烂额，突围不出，马占山最后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来，率残部撤退到集宁一带。其次将进攻凉

城县的傅军暂十七师副师长宋海潮指挥的该师第一团（团长张进修）包围聚歼，伤亡惨重，几乎全团复没。宋海潮被撤职。惟恐其他部队也蹈马军之复辙，被共军各个击破，傅作义当即命令各部队迅速西撤，向归绥地区集结。在撤退中，由丰镇经集宁向归绥撤退的新三十二师第九十四团（团长鲁乐山），乘火车驰至新安庄与永旺庄车站之间隘路险地时，被解放军阻击，一列车皮兵力，全部损失。二十六师在卓资山被解放军围攻，激战一昼夜，官兵伤亡惨重，有一个团几乎全部被歼。何文鼎师长率部突围西撤至包头休整。丰镇、集宁、卓资山等地全部解放。傅作义根据上述情况判定解放军此次集中强大兵力分路进击，是要先将散驻各地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然后集中兵力进攻归绥、包头。傅为保存其军事力量，不为解放军各个击破，遂决定集中兵力于归、包二市，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攻为守，以逸待劳，依城野战，以消灭解放军有生力量，保卫绥、包二市。即令主力部队三十五军、暂三军、骑兵第四师、炮兵第二十五团、战车防御炮营等部集结于归绥，担任归绥市的防守。令二十六师、补训一〇一师（司令李思温）、补训新三十二师（司令郝世昌）、伪蒙军改编的第十路军各师、伪蒙军改编的森盖等部集结于包头，担任包头市的防守。令鄂友三、乔汉魁、郭长清、王有功以及伊盟准格尔旗的奇子祥部、伪绥西联军改编的第一集团军王英等部，分别在绥、包二市北靠大青山、南依黄河两岸，不时掌握时机，向共军展开游击机动战，相机打击解放军，以配合绥、包城防部队，歼灭解放军有生力量。

## 二、兵力配备及工事构筑

### (一) 傅部在归绥市的兵力配备及工事构筑

归绥市是绥远省的省会所在地，是绥远省的政治、军事中心。傅作义将其主力部队集中于归绥新、旧两城，并区分为城防部队及野战部队。城防部队以暂三军所属的暂十一师及暂十七师（暂十师在后方兰州一带接领新兵）为主。暂十一师的防御地区为：右起小校场西北角、回民坟至西茶坊（不含）相连之线。暂十七师的防御地区为：右起西茶坊（含）至南茶坊及新城城墙相连之线。该师又令所属第三团（团长靳书科）担任右起西茶坊（含）至南茶坊（含）之间地区的防御；令第二团（团长梁泮池）担任南茶坊（不含）龙泉公园至新城之间地区的防御。野战部队以三十五军所属一〇一师、新三十一师、新三十二师为主，并令新三十二师位于车站附近，派兵一团担任右起新城至麻花板营房、公主府至小校场相连之线的防御。一〇一师位于新城之间地区，并令该师三〇二团（团长冯梓）担任新城城内的防御。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原设在新城北门外麻花板营房内（现内蒙古军区院内），为便于指挥及安全，移驻新城北门里屠家花园（现内蒙党委住地）。

担任城防部队奉命之后，即分别开往指定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攻城之解放军。我团担任的防区为旧城西茶坊（含）至南茶坊（含）之间地区。因为这个防区的正面孔家营子、八里庄、水磨、南瓦窑等地，驻有解放军主力部队三五八旅等部，这个地区即为重点防区。在工事构筑上必须特别加强。除将防区内的高大建筑及坚固院落作为坚固防守

据点外，为便于各据点之间的指挥及部队灵活调动，又将各据点之间的院落打通，使部队昼夜通行无阻。但对居民却造成惊恐和相当破毁。在整个防区，筑有坚固防御阵地，阵地内筑有明暗碉堡及侧射斜射轻重机枪掩体和掷弹筒、迫击炮游动阵地，火力交叉，消灭死角。阵地前沿挖有深宽各四米的外壕，壕外设有鹿砦及通电流的刺铁丝网。阵地后方筑有坚固的炮兵群阵地（这一防区为解放军攻击重点地区），并在通顺街耶稣教堂院内的钟楼上设有我团及炮兵观察所，任命我为炮兵副指挥官，协助炮兵部队指挥作战。

为构筑这一防区的防御工事，除我团官兵不分昼夜加紧构筑及设置外，并由归绥市政府及市警察局每日抽派民伕三千余人，协助构筑。工事所需的铁丝、阵地所需麻袋等物，均由市政府指定商务会专人收购供用。给广大市民造成很大困难和经济负担。特别是那些摆摊小贩，全靠每日所获微利维持一家人生活，这些人所遭受的痛苦尤甚。当时认为是保卫归绥市应取的合理手段，实际完全是误国害民的恶劣行动。

## （二）傅部在包头市的兵力配备及工事构筑

自“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第十二战区夺取包头之后，包头市的城防即由警备司令王雷震指挥补训一〇一师李思温部及保安大队李修天部担任。当解放军在十月下旬连续攻占丰镇、集宁、卓资山以及绥东各县城，进而向归绥、包头合围之时，傅作义感到防守包头的兵力薄弱，虽有退到包头的二十六师和包贵廷指挥的第十路军以及森盖等部队，但无一职位及资望都较高的人统一指挥，难以统

一掌握，充分发挥这些部队的力量。经考虑后，即派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总司令邓宝珊）兼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董其武前往坐镇指挥。并任命董其武为包头防守指挥部总指挥，何文鼎为副总指挥，王雷震为副总指挥兼包头市警备司令，成于念为参谋长。当即派专机将董等送往包头。在董正待登机之时，被撤职的前包头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唐希舜，自荐他对包头的情况熟悉，愿意跟随董其武到包头去立功赎罪，经傅作义长官同意后随董一起飞往包头，在指挥部担任参谋工作。为加强包头市的防守力量，傅作义又从大同将交警总队（队长陈启祥）两个大队千余人空运到包头，并从北平空运山炮数门（此炮系代表傅作义受降官到热河接受日军投降未成，留在北平待命的孙兰峰在包头被解放军围攻紧急之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要求调拨空运来的）由炮兵营长杨耀康负责指挥。

总指挥董其武率参谋长成于念及指挥部其他人员等飞抵包头后，即召集何文鼎、李思温、郝世昌、包贵廷、森盖、程启祥、杨耀庭以及团长以上军官开紧急军事会议。会后由总指挥部下达命令如下：①令补训一〇一师李思温部担任包头东门（含）至西北门（不含）之线的防御，并支授担任东门外玉皇庙、转龙藏森盖部作战；②令第十路军第五师（师长安恩达）、第六师（师长门树槐）担任西北门（含）至西门（不含）之线的防御；③令补训第三十二师郝世昌部担任西门（含）至东门之线的防御，并负责发电厂、皮革厂的防守；④令山炮营位置于城内黄土梁高地附近占领阵地，由杨康营长指挥；⑤第二十六师保安大队（队长李修天）、交总队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各防守部队；⑥各部队即行

构筑工事，向总指挥部构成通信网，情况及时报告。

各部队受命后，即分别在指定地区赶筑防御工事，随时准备迎击解放军攻城。包头是一座高五米、厚二米的土城。城内地形北高南低，东西平坦，北靠大青山（城北十五公里），南依黄河（城南五公里），周围约七公里。有东门、东北门、西门、西北门和南门五个城门。四周筑有深、宽各二·五米的外壕。该城在日寇侵占时期，即筑有较坚固的城防工事。此次战役前，又进行了加固。城的外壕筑有鹿砦，壕的边沿设置了带刺通电铁丝网，并布有地雷。城墙和部分城角筑有暗碉多处，城外各据点均有通往城内的暗壕沟通。尤以转龙藏和玉皇庙两处，地势最高，可以俯视全城，在军事上尤为重要，不仅筑有暗碉暗道可以互相来往，并用重轻机枪构成严密火网。四周筑有通电铁丝网，是一个极为坚固的易守难攻的据点。

### 三、战役经过情况

绥包战役是由以聂荣臻将军领导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和以贺龙、李井泉将军领导指挥的晋绥野战军两个军区协同进行的。在绥包战役开始之前，由贺龙将军指挥的晋绥野战军，先将驻防卓资山的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击溃之后，即行挥师西进，向归绥及包头进攻。兵力部署为：由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张达志将军领导指挥绥蒙军区康健民的骑兵旅和晋察冀军区陈金昆的骑兵旅，晋绥野战军王尚荣的步兵独立旅，先向包头进军，攻击包头市。由贺龙将军亲自指挥晋绥野战军三五八旅、独一旅、独二旅、三旅以及晋察冀野战军马龙的一个旅向归绥挺进，围攻归绥市。两市战斗经过如下：

### （一）归绥围城战役经过

十一月四日，接到第二战区长官部通报：①共军约三万余人分数路向归绥挺进。主力约万余人向新城东北郊接近，先头部队约四千余人，进抵红山口、石头兴营子、线圪圪等村；一路四千余人进至南地村、兴家营，向新城东郊接近；一路三千余人，由归绥南经大黑河、昭君坟，进至旧城南五里营，一路约八、九千人进至旧城西郊孔家营、八里庄、水磨、西瓦窑及西乌素图一带。归绥四郊五华里之外，均被共军占领，将归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随时有向归绥城发起总攻的可能。希各部队严加注意，积极防范，搜集当面情况，及时报部。②另悉共军部队继有增加，其兵力约有三十二个团，由贺龙指挥，一路沿大青山向归绥东北、西北两面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经毕克齐、察素齐西进，向萨县及包头进攻。

傅作义长官根据上述情况，认为共产党发动这样大的兵力向绥、包两市进攻，必将形成一次大的战役，短时间内不可能结束。如防守不力，绥、包两市即有被攻破之虑。为了加强防守力量，以防守城失利，除令各部队不分昼夜积极加强工事构筑，准备迎击解放军攻城战斗，并报请蒋介石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速派飞机支援作战，空运武器弹药，补充战斗力量。并令在北平的孙兰峰，直接向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孙、王系山东同乡）要求派飞机支援作战；向第五补给区司令耿××（名字失记）要求空运武器弹药，补充战斗力量。与此同时，在新城屠家花园召集团长以上部队长会议，研究作战计划。傅在会上鼓励干部说：“就目前形势看来，共军运用这么大兵力围攻绥、包二市，并由贺龙指挥，



是想彻底打垮和消灭我军。为了不被各个击破，我军已主动放弃了各个县城，集中兵力于绥、包二市，采用以守为攻、依城野战的战略方针，同共军进行战斗。只要我军不论是城防部队或野战部队，都能做到守必固、攻必克，必能歼灭其有生力量，取得胜利。放弃的县城定能收复回来。希望我军上下戮力同心、团结一致，坚决打好这一战役。”会后，傅作义以省主席身份又在绥远省政府会议室召集厅局长会议，将当前情况讲明之后，从各厅局抽调干部组成数个工作队，分派在市内各区，协助地方清查户口，安定社会秩序，搞好军民合作，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守城战斗等任务。

十一月五日，解放军小部队向归绥市进行侦察性的攻击，同守城前哨警戒部队发生小的接触战斗，双方无大伤亡。六日，解放军炮兵向新城守军进行炮击，傅军炮兵进行还击，双方炮战约一小时，守军无大伤亡。六、七两日，双方无大接触。但夜间都派出战斗小组，互行牵制扰乱，零星枪弹声彻夜不断，但无大的战斗。在此期间，解放军拟用火力侦察守军兵力配备薄弱之处，进行突然攻击，不用大的牺牲，一举突入城内，歼灭守军占领全城。傅军也拟用火力侦察解放军主力，企能集中优势兵力，先行打击或歼灭解放军一部有生力量，削弱攻城兵力。

傅作义从火力侦察及派出的侦察部队侦知解放军主力精锐部队三五八旅等部，集结在孔家营子、八里庄、水磨、南瓦窑及西乌素图一带，并筑有坚固工事以防我军袭击的情报之后，决心在解放军未进攻归绥之前，以攻为守，先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向扎驻城郊之解放军分别进攻各个击破，以达全歼之效。遂于十一月八日拂晓前令新三十

一师安春山师长派该师第九十二团(团长刘丰初)第三营营长孙英年率该营及迫击炮连出西茶坊向南瓦窑之解放军进攻。战斗从上午七时至下午二时,该营屡攻不克,最后孙营长集中营步兵炮及迫击炮火力轰塌瓦窑缺口,部队进行突击,解放军始行撤退,该营收兵回城。九日,安春山又亲率该师第九十三团赵晓峰团向水磨之解放军攻击,战斗异常激烈。解放军从侧面出击,将该团第二营(营长叶长青)包围,赵晓峰团长亲率第三营进行反包围,解放军才行撤退,叶营未遭全歼,战斗至下午四时全团撤回城内。又于十一月十一日令新三十二师李铭鼎部向归绥东北约二十华里毫沁营子的解放军进攻。因解放军事前撤走扑空。又转而向西攻击坝口子的解放军,战斗非常激烈。由于解放军利用坚固工事及猛烈炮火进行反击,战斗由上午十一时战至下午四时半,多次猛攻,均遭挫折,只得收兵撤返城内。当日夜晚在孔家营子、八里庄的解放军三五八旅的战斗小组(约一排人)向我团西龙王庙前哨警戒阵地进攻,激战甚烈。我为免遭无谓牺牲,即令担任警戒阵地的一个加强班,由交通暗道撤回主阵地。解放军即占领西龙王庙。

十二日晨,解放军三五八旅利用西龙王庙掩护,向防守西茶坊的我团阵地发起进攻。我团一面利用阵地工事进行反击,一面将情况上报师部及第十二战区长官部。长官部参谋长李世杰向傅作义汇报后,傅认为解放军主力三五八旅向市区攻击,以正面作战有利,即令三十五军一〇一师郭景云师长亲自指挥该师三〇一团(团长卫景林)及三〇三团(团长常效伟)两团,在强大炮兵火力的掩护下发动进攻。解放军三五八旅见傅军出动大军在密集炮火支援下猛攻

过来，即变攻为守，退入八里庄既设阵地进行还击。战斗异常激烈。郭景云先令三〇一团展开猛攻，被解放军三五八旅从正面以集中火力阻击，使该团不能突进；又从侧面袭击该团侧背。该团不支向后撤退。郭景云又将三〇三团增加上去，协同三〇一团发起总攻，枪声、炮声、手掷弹声震天动地。在战斗最激烈之时，傅作义曾亲自到前线。一来为了给官兵打气，二来为了亲自观察解放军的战斗实力。傅同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及长官部随从人员，在我团指挥所掩蔽部用望远镜观察战况中，看到郭景云师长指挥一〇一师两个团在猛烈炮火的支援掩护下，向解放军多次进攻，均未取得战果，为减少伤亡，取得战绩，特令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特务营（警卫营）用接收日军的两辆装甲汽车编成的装甲车小队投入战斗。这两辆装甲车都是日军弃置不用的破烂货，行动迟缓，尚未冲击到阵地前沿，即被解放军以集中火力射击，弹中油箱，人车俱焚。由于解放军火力集中猛烈射击，傅作义在郭师长的指挥所，离第一线太近，子弹嗖嗖地落在傅之左右，并有一粒子弹打破他的皮大衣。鲁英麟军长及随从人员见此情况十分着急，经多方劝阻，傅始由随从人员护送下来。傅走后，郭景云师长又指挥两个团猛攻多次，均被解放军击退。战斗由早晨八时许打起，一直到下午四时许始停，一〇一师退回城内。一场激烈战斗，傅军以失败告终。

当天下午六时许，参谋长李世杰打电话给我说，长官有事找我，着我马上去见他。见面后，傅长官问我：“你对日军武器比较了解，为什么日军的武器如此之劣，装甲汽车还未冲到共军阵地前沿即被击毁？”我说：“这都是些老掉了牙的日军退役下来的废武器，放在阵地当作活动碉堡，尚有利

用价值；用于冲锋破阵根本不行。北平行营接收了日军两个战车团，有轻、重坦克（中、小型）百余辆，最好能让孙兰峰到行营交涉，拨给我们一、二十辆，用飞机空运归绥，这个战役就好打多了。”傅长官当即电孙向北平行营交涉，后用飞机空运来小型坦克数辆（中型的装不进飞机里边），编了一个战车队，由我兼任队长。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二时许，傅作义偕同参谋长李世杰、参谋处长贾璜、作战科长雷雨田，由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新三十二师师长李铭鼎以及其他随从人员等，到麻花板营房高最楼顶，用望远镜对城外四郊观察瞭望后，认为旧城西北攸攸板的解放军对车站及旧城威胁最大，为了将之拔掉，即令师长李铭鼎派兵一团前往攻占该地。当时傅的意图不仅是为了攻占攸攸板，而且还想以此诱使八里庄一带或其他驻地的解放军前来支援，以便派出重兵打援，歼灭一部解放军，减轻围城威胁，促使解放军撤退。李师长即令该师第九十四团鲁乐山团长率该团向攸攸板进攻。解放军侦知此情况后，留下一批人员，化装成农民，潜伏村内，大部队均转移到东西乌素图。鲁乐山团进至该村时，未遭阻击，入村以后，看到解放军是有计划的撤退，判断夜间必来夜袭反攻。乘天色尚明，鲁乐山命令各营不顾进攻疲劳，迅速构筑工事，加强警戒。当日深夜二时许，解放军突从四周围攻而来，鲁团急忙应战，战斗甚为激烈。此时，潜伏在村内的解放军人员，起而里应外合向鲁的团部及各营营部进行袭击，团、营、连失去联系，指挥失常，官、兵乱成一团，第一营营长苗玉春负伤脱离战斗，团属迫击炮连被解放军全歼，战斗混乱，伤亡惨重。一直战至天明，解放军始行撤走。此役由于指挥失当，

官、兵伤亡惨重，损失一个营及一个迫击炮连，丢失迫击炮四门。傅作义非常生气，即将鲁乐山团长撤职查办，关押在长官部军法处。这是傅军又一次的战斗失利。

十多天以来，虽然傅军多次出动攻击解放军，但并未取得预期战果。解放军经过多次战斗，也感攻击归绥不易成功。而且市内工事构筑极为坚固，从武器装备及战斗力衡量，即使动用大军进攻，也难取得胜利。遂又改变战术——只留兵力一部对归绥围而不打，将主力调往包头方面，全力进攻包头。在此之前解放军已向包头进攻多次，但均未奏效。这次将主力转移包头，是拟用大于包头傅军数倍的兵力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傅军，占领该城。傅作义为确保包头市，除将此情急电总指挥董其武加强戒备，严予防范外，同时又电请宁夏马鸿逵派兵支援，进行牵制；并令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方率领该师从归绥出发，绕经党三窑子，指挥奇子祥及鄂青云两部，由老龙渡口渡河，支援包头守军；又令在东胜县的第三管区司令郭跻堂，即日由东胜出发，打着宁夏马家兵的旗号向包头挺进，支援包头，牵制解放军。

## （二）包头围城战役经过

包头在军事上是一个战略要地，又是绥远省的水、旱码头，是归绥以外的第二大城市。占领包头，即可以控制整个绥西，等于占领半个绥远地区。在军事、政治方面，均有很大价值。解放军在围攻归绥的同时，认为包头守军薄弱，比归绥容易攻取，已分兵一部于十一月九日开始进攻。其兵力部署：以主力围攻转龙藏、玉皇庙，企能先行占领这两个制高点，以便居高临下，向市区进击；以一部分别向火车站、飞机场、电面公司、皮革厂、西脑包以及城郊各村内的傅军

进攻，肃清包市外围，便于攻城。在战斗中解放军士气旺盛，猛力冲杀。火车站、飞机场、西脑包以及城外各据点的守军，为集中兵力，均撤回包头城内。只有电面公司、皮革厂、转龙藏、玉皇庙几个主要据点的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及炮火支援，顽强抵抗，解放军猛攻多次，均未攻克。夜晚十二时许，解放军又动用两团兵力向上述各点及西北门发起猛攻，战斗异常激烈，枪声、炮声、喊杀之声，震及包头全城。由于傅军奋力抵抗，解放军虽多次猛攻，均未攻克。

十一月十六日夜间十二时，解放军改变主攻方向，一一重点指向西北门至丰备仓之间的薄弱地区，出其不意，一举攻入城内。并攻占天主堂、石忽洞和吕祖庙几个据点，部分守军后撤。董其武急令唐希舜参谋督率交警总队前往阻击。又从两个补训防地各抽一团兵力，从东、西两面迂回侧击，并令王雷震副总指挥亲往指挥督战。双方逐巷逐地展开激烈争夺战，参谋唐希舜在财神庙被解放军击毙。战斗打至天明，解放军为避免重大牺牲，主动撤出城外。以后即白天休战，入夜战斗又剧烈起来。如此相持到十一月二十一日。该日夜晚十一时许，解放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由东北门至西北门之间地区向城内发起总攻，期能用炮火轰开几个缺口，一举攻入城内。总指挥董其武判知：解放军集中炮兵火力掩护步兵猛攻，必为由归绥增援来的主力攻击重点。除严令防守东北门及西北门之间的守军加强防守外，并将武器最好、火力最强的交警总队立即增加上去，予以支援，战况进一步激化。解放军虽在强大炮兵火力掩护下，越过战壕，突破电网，逼近城墙，攻势较为得手，但因守军火力炽盛，始终未能攻入城内。又因六日国民党飞机多架前来助战，狂轰滥

炸，解放军为避免无谓牺牲，又主动撤离战斗。

据总指挥部参谋长成于念谈称：在一次战况危急之时，董其武总指挥曾请来驻在包头的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冯钦哉研究对策。冯系原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属下的某师师长，“双十二”西安事变时，转投蒋介石，这次蒋介石委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因张家口为苏联红军及解放军所占领，冯无法前往就职，暂住包头市，他听到董其武请他，以为是战事情况不妙。当即将脚上穿的布鞋用绳子扎好，换上短衣，腰中扎上皮带，来到董的司令部。董一见冯的装束，即猜透他是来主战的。董说：“现时战况非常吃紧，解放军由归绥调来重兵，对包头发动总攻，究应如何防守，请主席见教。”冯坚定地说：“当年傅长官守涿州时，奉军以十倍之兵力，并且有飞机、大炮和坦克，围攻三个月之久，都没有攻克。我们现在比当年涿州的情况要好的多。我守城兵力虽稍薄弱，而共军绝不可能大我十倍，武器装备不比我军强。为什么不能坚守呢？坚守是生路，撤退是死路，不被消灭，即当俘虏。此路绝不能走，必须坚决固守，才能取得胜利。”冯的一席话，不但坚定了董的防守决心，而且鼓舞了一些官兵的反动气焰。认为坚守就是胜利。是以解放军虽多次反复进行猛攻，均未获胜。此外，宁夏马鸿逵接傅作义电后，认为支援包头，即等于保卫宁夏。遂又派过去曾拨归傅作义长官指挥过的马腾蛟师及马彦骑兵旅，即日起兵前往包头支援。先头部队行至包头以西哈叶胡同一带时，被解放军伏击，遭受重创，未敢再继续前进，但却牵制了一部分解放军兵力，削弱了解放军攻包力量。驻东胜的第三管区司令郭跻堂部打着宁夏马军的旗号进入包头，制造声势也起了作用。刘春方的

骑兵师到达党三窑子后，正拟指挥奇子祥及邬青云两骑兵部由高龙渡口过河，绕道包头以南，向包头进军，支援包头守军，以解包头之围。解放军得知此情，即派有力部队进行阻击。骑四师在五旗牛窑子、邬青云在二十四顷地，均遭到解放军的袭击。邬青云见势不好，一经接触，即自行向北撤走。奇子祥在党三窑子背着刘春方师长同解放军洽谈起义。因解放军提出必须先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方接受其起义，奇子祥不同意，将部队拉往准格尔旗。骑四师遭到解放军袭击，刘春方师长亲率两个团脱离战斗，未受损失；该师乔日安团遭解放军围攻，损失较大。骑四师虽支援包头未成，但也牵制了部分解放军，使之未能集中全力进攻包头。

#### 四、解放军主动撤走绥包两城解围

解放军围攻归绥，未取得预期成果，而后又由贺龙将军亲率攻绥劲军——晋绥野战军三五八旅、独一旅、二旅、三旅以及晋、察、冀野战军马龙的一个旅等部，西进包头展开攻击，由于包头傅军防御工事坚固，又由北平空运来大批武器、弹药，解放军重武器较少，不能摧毁傅军防御工事，轰开突击口；又以时值严冬，气候特别寒冷，部队士兵无皮衣御寒，不好完成攻占包头任务。遂决定战略撤退，主动脱离战场。各部队分别东撤。晋绥野战军各部，分别撤到卓资山、十八台、凉城一带，绥蒙军区部队撤至集宁一带；晋绥野战军撤驻丰镇；晋察冀野战军由归绥外围撤回张家口一带。

绥、包围城战役，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开始，持续到十二月初，历时一个多月。解放军虽未占领绥、包二市，但给傅军以沉重打击，并占领丰镇、凉城、集宁、卓资山以及



其他各县城，阻止了傅军东进，扑灭了傅军妄图一口吞并热、察、绥解放区的野心，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为解放战争中的一系列胜利及和平解放绥远，打下潜在基础，终于促使傅作义将军领导下的绥远部队在1949年“九·一九”举行了光荣起义。



# 国民党中央党部见闻录

(1941—1942)

郎正之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前，我在重庆蒙藏学校读书。事变之后不久，特务们查抄重庆邹韬奋先生主持的生活书店时，发现读书会的名单有我的名字，加上我写过一些不满当时现状的文章，蒙藏学校便以思想不纯的罪名把我开除了。其实“读书会”只是一个宣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卖国的组织，只要有五个人联名写一个申请，生活书店便按时给会员邮寄一些进步书刊，收费低廉而书刊内容健康丰富，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在重庆街头流浪了几个月之后，经一个同学的家长续琅介绍我到国民党中央的抚恤委员会当了一名录事，地位虽低，只是个雇员，还够不上职员，薪水也少的可怜，除伙食费外，所剩无几。可是却进了一个大衙门，门口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子，上写“中央党部”四个大字。“接触”的也是“党国元老”。地点在上清寺附近的国府路，与“国民政府”只有一墙之隔。

这座大衙门内，主要的部分均为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所占用，除此而外就是几个小的无法独立存在的直属委员会，比如，跟抚恤委员会同在二楼的侨务委员会，便是工作人员不满十人，办公室只有两间地方的单位之一。至于当时朱家骅主持的组织部，张道藩主持的宣传部和同是直属委员会的、

由段錫朋主持的庞大的训练委员会等机关，则另有衙门，不在中央党部之内。

这座衙门里权势最大的官，是抗日战争前当过上海市市长、抗日战争开始后一直担任秘书长的吴铁城，副秘书长是甘乃光。一九四二年初我在值日牌上看到张国焘的名字，出于好奇，打听了一个同事，才知道这位有“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专员”头衔的人物，就是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以后又从延安叛逃的张国焘，而不是我原先以为的另一个同名同姓者。还听说他的“干货”卖尽之后，并未得到相应的、他希望中的报酬，能当个专员还是靠甘乃光的一臂之助。在我的同事的指引下，我曾从楼上看到过这位西装革履、肌肉丰满、面色惨白而阴沉的人。也见过“专员夫人”但已记不清是个什么样子了。

在这个衙门里的几个委员会，规模虽小，油水不大，可是挂帅的却都是“党国元老”。比如，财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早在日本留学时代便跟着孙中山先生闹过革命的河北省人张继；抚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山东日照人丁维汾，在“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之前，蒋介石刚在江、浙站稳脚根之后，一度曾经是“蒋家的天下，丁家的党”的党魁。可见丁维汾的来头也不在张继之下。可是他此时的“兵马”，除了一位不知名的随身保镖、山东壮汉之外，就只有一个兼职秘书刘瑶璋（在训练委员会也担任秘书，四二年四月刘任训练委员会专职秘书长并当上参政员时，抚恤委员会才由刚到重庆的陕西人于振瀛接任。刘、于在解放后都是民革常务委员）、两名科长（其中之一是同盟会的老会员、被阎锡山暗杀身亡的续洞溪的孙子，抗日战争前在中山陵剖腹自杀未死，后来

和薄一波同志一起带领山西新军起义的续范亭的侄子、崞县人续琅）、一名总干事、两名干事、两名助理干事（有一个是丁维汾的孙子、丁肇中的堂兄丁肇祐）和一名录事。可见这些没有油水的委员会只是安排下野元老的地方。

抚恤委员会的委员们，每月借用秘书处的高级小礼堂开一次会，究研孙中山领导革命时期牺牲烈士遗属的申请，决定抚恤标准。有的只给一次抚恤费，有的每年都给，但在当时飞涨的物价下，数目都少的可怜。被抚恤的亲属，大多是清末牺牲的革命党人的后代。比如，辛亥革命前夕，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方声洞、林觉民等，以及在此以前牺牲的女烈士秋瑾等的后代。后来在我登记卡片时，发现过少数中统特务死后，也申请抚恤而偶有发给少量抚恤金的。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不知道当时这些委员们的态度，但能猜到，这种不合抚恤条例规定的做法是在野元老们既不情愿，又不敢得罪陈家的情况下干出来的。因为在他们这个大圈子里闹小矛盾是我老早就知道的，何况这些委员们自以为功高而受屈，对蒋介石虽怕，对宋、孔、陈三家却时有非议。其中有一位例外，那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我不知道，也无心打听委员中究竟有些什么人（因我一心准备以同等学历考大学，忙于复习功课），但我的最年轻的同事丁肇祐却有收集“名人墨宝”的爱好，这些名人因为不“红”，故而也就不忙，闲得无聊，便多以书画自娱。其中当然有不少原来就很有根基的写家，如于右任、林森和王法勤等人。这些人在每月一次的例会中，如果有事、有病不能参加，便会以自用宣纸信笺亲笔写一封请假信，着人送去。我从丁肇祐保存的这些“墨宝”中，知道委员中不仅全是“党国元老”，而且还

有一位地位崇高、没有实权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本来我自幼就对福建名门、“天下无林不开科”所称誉的林家很羡慕，学过历史，知道林则徐禁烟反英和读过林觉民感人很深的“绝命书”之后，对这一名门望族就更加尊重而不只是羡慕了。可是在我亲眼看过林森的一次表现后，不禁为之一叹了。

这件事发生于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为国民党元老、中央委员、河北省人王法勤逝世举行追悼会。会前，我们所在的大院的礼堂内外挂满了当时要人们的挽联。惟恐象吴稚晖那样的穷委员们会前赶来没有个休息的地方，我们及早把办公室整理了一番，却未想到，林森提前进了这个大衙门，在文武宰相即文官长魏道明、武官长吕超这两位空有其名，没有实权的人物陪同下，参观了各个办公室，这位身着蓝缎长袍、黑缎马褂，蓄着稀疏的白色长须的长者，外表是够体面、够威严的。我们当然都站起来迎接他的到来，谁知他对站着的人不屑一顾，却在地板墙角和桌椅下寻找着什么，终于用手杖从卷柜下拨拉出一双雨鞋，连说：“这还了得！这还了得！一会儿让总裁看到，还了得！”续琅红着脸用报纸包起这双雨鞋放在卷柜内。林森又环视一周，方才放心地离开。

唉，原来一位国家主席是为他的蒋总裁来打前站的。

由于我在这种大衙门里地位低下，一心想投考大学，另谋出路。投考目标是西北农学院。当时《新民晚报》的《学府风光》栏先后两则报导，促使我产生了离开重庆，前去投考西北农学院的决心。头则新闻报导了在重庆附近的中央大学一个学生，为多喝到一碗粥，被人拥挤，掉入粥桶，烫伤了面

孔；第二则新闻却说，位于八百里秦川的西北农学院，用同样数目的贷金——当时国民党教育部规定每月借给在校大学生每人七元伙食费，毕业后分二年还清，故名贷金——每餐可吃到八到十个菜，且可节余一、二元，归学生零用。这两则新闻对比之下自然认为投考西北农学院为好，为了积蓄长途跋涉所需的路费，我舍不得花钱更换新衣，穿着破旧的衣衫，很少露面，整天埋头复习功课；再加上有左倾思想罪，怕自找麻烦，被特务盯上，便有意躲避有大人物在场的各种集会。当王法勤逝世的追悼会上蒋介石到场时，丁肇祐拉着我到阳台上瞭望，丁很奇怪我不乘机混在人群里就近看看这位“领袖”。我只好告诉他我曾是他的学生，他曾是我的校长，一年前蒋到南温泉给政治学校学生训话时，我都装病未去。至于陈果夫、戴传贤等二流要人都到过蒙藏学校，我并不希罕。我也对丁谈过戴在讲话中自称是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叔父辈，自己老早就是日本通，并骂“近卫这个小孩子，他懂什么。”在谈到达赖喇嘛于一九四〇年举行坐床盛典，他到西藏当“钦差大臣”受到隆重接待时，则眉飞色舞，极尽添油加醋之能事。为什么这样吹捧呢？从西藏同学中传出，原来达赖送了他一份很厚的礼物。除大量土特产品，如麝香、鹿茸、藏红花之外，金、银、珠、宝、玉器，每件都价值连城。在该校的藏族同学，对他的许多污辱少数民族的说法和贪赃好利都很反感。

当然，也有无法逃避开大人物的时候。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元旦，吴铁城设宴招待这个大院的全部工作人员。因为这位秘书长是当时仅次于孔、宋的官僚兼富商，整日忙于发国难财，经营投机生意，远自美国的走私贸易，近至上海、南

京的日伪占区的同样性质的买卖，都需要他亲自在重庆坐镇处理，有时还不得不秘密飞往美国看看行情，摸摸形势。

以即使有意见他，也很难得。我的这次会见，当然更是唯一的一次。秘书处的日常工作，都由甘乃光主持，这次宴会虽然菜肴丰盛、饮料名贵（如其中有我迄今只品尝过一次的熊掌和四川特有的名菜烧白鳝鱼），但吃饭的都是部属，所以吴既未站起来说话，更没有离席与人碰杯祝贺，只是甘乃光起来说了几句文不对题，我却爱听的话，大意是：勉励人们当专家。他的论点是在中国当个专家很容易，只要下五年功夫就行。

第二次和大人物混在一处，却没有这么轻松和惬意。

同年四月间，重庆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有一天，丁肇祐在下午下班前，领来一位上了年纪的速记员，用满口上海话很客气地请我帮他一次大忙。我很吃力地听着，也尽可能用南腔北调并借助于手势和表情使他听懂我说的话。加上丁的帮助，我终于知道这位老速记员要求我帮他干的事了。

原来国民党有一个多年沿袭下来，当时已经成为形式的规定，即每月有一个由部长向他们的党中央轮流汇报工作的会议，出席听取汇报的有党的总裁、常委委员、五院院长和各部委的头头，大概后来因为这些要人很难到全，会场显得冷落，便把出入证发到这个大院的干事一级，谁想去就去，不想去的人比想去的人更多，有的雇员想见见世面，可随便跟同事们借上一个，进去看看。这是我早已知道而不感兴趣的事。

老速记员告诉我，明天是水利部长薛笃弼的报告，他听不懂这位满口山西音调的部长的话，无法把速记整理成文，

交差存档。正在发愁时，跟他学速记的丁肇祐出了个让我也去听听记记，会后两人共同整理的主意。丁知道我的脾气，怕我不去，所以他亲自前来求助。

于是，第二天上午我穿了一套借来的中山服，在丁的陪伴下走进了“国府”的大门，经过室内的长廊，向北往上望去是铺着地毯的有二十几个台阶的大厅，台阶两边是身着呢制德式军服的仪仗队和乐队。人们停在台阶下的走廊两旁先后依次签到，正当我低头签名时，听见背后有人带着慌张的音调说了一声：总裁来了。一抬头，长廊两边的人都不见了，而且周围一下子变的鸦雀无声，好象连空气也冻结了似的。我既不能前进，更不能后退，左右是木板隔起来的走廊，真有无地自容之感。用“说时迟，那时快”这句套语，形容当时的状态十分恰当，我很快镇静下来，做出了决定：若无其事的向上进入大厅，而不能慌慌张张的倒退，因为，那样一来有可能和蒋介石撞个满怀，后果不堪设想。

还好，当我走完二十多个台阶，进入这个林森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的大厅时，里边已有几个不是大人物的人物，在西向的开着窗户下乘凉，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曾经出过一身冷汗而现在却因松了一口气，觉得空气十分闷热。看到头顶上的大电风扇不动，便按了一下壁上的开关，站在偏离入口处的风扇下乘凉，并等待着将要看到而预想不到的下文。

不一会儿，人们陆续走了进来。大人物站在前边，小人物们都尽量往墙角和墙边站着，因为整个大厅只有正面中山遗像的两边放着十来把椅子，正中则只有讲桌，桌后也未放坐椅。在乐声中蒋介石穿着惯常的军装，走了进来，在入口处摘下了军帽露出光头，装模作样地迈着大步从中间走到前



排，又向旁边走了几步，面北站在偏东的一边，而不站在中间。

一套固定的仪式完毕后，薛笃弼走出来站在讲桌后准备报告。这时，于右任、戴传贤等三、五个元老和孔祥熙从前排走出来坐在面向听众的椅子上，蒋介石始终和其他听众一样立正站在原地不动，因而林森也就不敢就座。于是大部分坐椅都空着。元老们，都穿蓝缎长袍，外套黑缎马褂，黑色白底布鞋，白麻纱长袜而以黑色宽带裹着裤脚。于右任稍有不同：家做白布袜、裤脚装在袜筒内。当然，坐在椅子上十分显眼的孔祥熙并非元老，不仅与并排就座的白发长须的老头子们有明显的年龄上的差别，穿着也大不相同：黑色西装，洁白的衬衣，色彩鲜明的领带上卡着镶有闪光宝石的金饰，手里不时的满不在乎地，或者说心不在焉地玩弄着一把黑色小摺扇。我看着孔的一举一动，当时倒觉得，孔比林高超一些，因为在蒋的面前，一个没有显露奴才相，一个却奴气十足。事后丁肇祜订正说，孔的财力雄厚，而林则仅仅靠一点老本，不当奴才，就会从元首宝座上掉下来。我则提醒丁，这可与他们的祖上遗风很不相称。

因为报告刚开始，我也有些心不在焉，听在耳朵里的不多，记在本儿上的更少，好在薛虽有一纸提纲，却几乎一眼不看，他的信口道出的，但很简洁明白的讲演，慢慢地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不得不承认这位山西籍的部长，既有专业知识，又有政治手腕，他的不到四十分钟的报告，安排的十分巧妙。

第一部分是我没有注意听的几句开场白。

第二部分是很有鼓动力的。也是当时对国民党还抱有希望的知识分子经常谈论的，有关战后在美国朋友的协助下开发三峡水力发电的宏图大略。他在这一部分的结尾处说：竣工之后，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不论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还是偏僻的山村小镇都将大放光明，那时人们将不再用烟囱林立来形容工业发达的城市，工友们将穿起医生的白大褂，坐在干干净净的厂房里，按按电钮就会出来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他的绘神绘影的描述，使我这个书呆子想到抗日战争以后的美好未来，真有飘飘欲仙之感。可是当我的视线一扫过孔祥熙带着轻渺微笑的肥白细嫩的面庞时，便清醒过来，无心再听下去了。只是在谈到将来的治黄计划时，提到两个我熟悉的名字——李天佑和吴右龙（前一位解放后曾任青海省水利局长，后一位解放后曾任包头市人大付主任），才又听了下去。

接下去的是第三部分。经过精心安排的，为他的水利部当众诉苦要钱的全部报告的中心内容。其中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中国的水利工作者的精华几乎集中于黄委会；第二，他们撤退到黄河中上游的穷山沟里，在经常断炊的情况下，仍坚持调查研究，而且成果累累；最后，引用黄委会二十几名（提到的几个人名中就有李、吴二人）专家联名上书中的几句很动听的话说：“黄河是我们祖先的发源地，胜利之后，不能只管长江，不治黄河……我和专家们的意见一样，不应撤销黄委会，还要为这些扶老携幼困在山沟里的不愿当顺民不做汉奸的几十名民族精华向党国请命，增加拨

款，让他们的研究能继续下去！党国幸甚，黄河两岸的民众幸甚！”

最后两句谁都厌烦的套语，用在这里却不能不称一绝。因当时在重庆的北方人包括于右任在内都有地方情绪，我在一年前陪杜学魁见于右任时，于曾亲口对我们说过一句“西北乃我们西北人之西北”。我的许多满族同学都为北京改称北平而愤愤不平，有时激动起来还要为此骂街。可见这种现在听起来很可笑的地方情绪，在当时的北方人中是很普遍的。

我不知道薛笃弼是否有地方情绪，但他的报告的结尾部分，却很合我的口味。所以，我估计这个精彩的施政报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不料还有一段更精彩的收场。据说，这种每月一次的汇报，虽然形式隆重而庄严，并且蒋、林等头头每次都要出席，但谁也知道这是一种不得不应付一下的过场。报告一完就散会，很少有人提出什么质询之类的事。所以薛的最后一个“幸甚”一出口，大家便准备离开。几乎是在于右任等欠身站起的同时，甘乃光用他那象妇女一样尖细的声音，向报告人提出一个问题：“您对龚德柏的黄河改道设想以为如何？”许多人一听便都笑了；也有几个人没笑，却对笑声感到莫名其妙。比如于右任等笑了，孔祥熙却有些发呆。薛笃弼则既没有笑也没有发呆（可见他是事先已经知道这个龚大炮的设想的），却很为难的看看对面站着的林、蒋并回顾了左右坐着的几位元老，然后便对甘乃光小声地，但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副秘书长，会后谈好吗？”精彩的插曲就这样结束了。

在蒋、林随后是元老们依次退出会场之后，我一反常态紧跟在并排走的甘、薛后边，听着他们的谈话。

“龚德柏急民之所急，我很赞赏他的大胆的设想。”甘说。

“此人爱出风头，书生的空想，抱着地图画河道，纯系纸上谈兵。黄河这条龙不会从天上飞越贺兰山和阴山，腾格里沙漠上也建不成河道，如果黄河能远上白云间，那就更糟了，它挟带下去的泥沙，足可把包括北平等地区的华北平原变成不下于腾格里的大沙海”。我觉察到为了照顾甘的面子，薛的话是经过字斟句酌的。比如，本来应该说“爱招摇”，改为“爱出风头”，龚本来就不是个书生类型的人物，却用“书生”代替“外行”这些可能刺激甘乃光的字眼儿。但在我的印象里，甘是一个有学者风度的人物，他会乖乖的接受教训，免得再冒出一分钟以前那种凉腔。

“水利专家们说得对，治本的办法是在中上游植树造林，限制垦荒，保护草场，以防止水土流失。”薛大概比我更了解这位副秘书长，要不他就不会这样认真的给他讲课了。

至于老速记员的差，我事后很快就代为完成了。当时的速记法本来就不是记音，而是用省略符号记词，比如“黄河水利委员会”用一个简单符号可以记下来，但当你听不懂这个词时，也就无法画出相应的符号，所以他的速记是用不上的。这位老实诚恳的小职员为此说了许多感激我的话，因而我也不好当着他的面责怪丁肇祐在“金鸾殿”前自己躲起来而不管我的事了。只是问了一下，那么多人一下就全看不见的奥妙。他们哈哈大笑之后，才告诉我用木板隔成的走廊两边，签到台的左右，都有可以推开的板门，他们当时都在两侧的休息室内静悄悄的躲了一会儿，等蒋林等步入大厅乐

队停止了演奏之后，大家随即进入大厅了。

最后，我向老速记员声明，根治黄河的方法，报告时未谈到，是我散会后听到，觉得重要才加进去的。并提出，希望不要改动，照我的底稿抄存。他虽连说：不改、不改。我却对这位“尽忠职守”的小职员是否有这种胆量当即产生了怀疑，因而十分后悔我的多余的声明。

“金殿”上的笑，不是笑甘乃光多嘴或破例插问，也不是笑黄河远上白云间的改造设想（因为当时这个有名的“狂想曲”还未广泛流行，在场的人知道的并不多），而是笑提出这个设想的人。

龚德柏是四十年代初靠“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成名的记者，人们经常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他发表的奇谈怪论，大胆的假设，前题错误的结论，毫无根据的推测，对天下大事的武断预卜，是他所有大作的特色，有时也敢对他认为有可能下台的要人来一闷棒，所以有龚大炮之称。大概除了孔祥熙等从不看中国报纸的人，没有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龚德柏者。他的让黄河从兰州以下就开始绕过贺兰山和阴山背后，把腾格里沙漠和阴山以北的荒漠草原变成数十万顷良田之后，再穿过燕山，在北平以西与桑干河会合入海的伟大创议，因为狂想成份太浓，重庆的报刊都不同意刊载，于是自己刻印发散。起先只给“党国要人”，大概因要人们无暇过问“这么重要的大事”，只好降格以求而扩大印数，求助于参政员们。当他知道参政会也没有做出这一“重大事件”的提案时，便再降一格，散发到所有西北各省的公私农牧林业机构，请求声援他的伟大计划的实现。直到一九四六年我在包头主持西北农牧公司时还接到过这位名记者的呼

呀，也听到绥远农研所收到过同样的呼吁信。他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不懈，一直为黄河改道呼吁了六、七年，这种精神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的。同时因为时隔数年之后我已知道在治理黄河的课题上确实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方案。龚德柏只是为主张“有水才能有树有草”学派的人们“提供水源”，因而也就不觉得他的空想是应该责难的了。



## 绥远省学生军事集中训练回忆

杜海粟

###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的怒潮，汹涌澎湃，席卷全国，“打回老家去”的歌声，震撼着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青年学生，到处振臂高呼，以至游行示威，卧轨请愿，此起彼伏，血书请愿，充满报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吼声，有力地击打着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国民党中央面对青年学生爱国热潮的高涨，名难劝阻安慰，实际深恶痛绝，遂决定在学校实行严格军训的手段，由训练总监部（当时部长蒋中正）向全国各高中以上的学校，派黄埔毕业的学生为军事教官，把军训作为学校的一门主课进行，企图达到象其嫡系部队那样“绝对服从”的要求，以遂其控制和利用学生的诡计和目的。

绥远省各中学于一九三五年下学期，每校派军事教官一人（因为绥远中等学校，只有一中和一师有高中，其他各校均为初中，但不管有无高中部，每校都派了教官），开始了军事教育，与其他文化课并重。这些教官，均为校级，每人均佩有“蒋中正赠”的小佩剑，上面均刻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字样，衣冠楚楚，与众不同。一听“蒋委员长”或“蒋总裁”的声语，马上立正致敬，表示绝对效忠不贰，这

就是他们的身教。

学生们一开始，就对军训教育，存有极大的反感，那种“无理要求，绝对服从”和丘八式的呆板生活方式，和学生们天真活泼，纯洁活跃的习性，的确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军事训练的课目，一天比一天加紧、加重，赶到一九三六年的暑假，便开始了绥远省第一届学生暑期军事集中训练。这一期军事集训，各校大约有半数学生参加，参加军事集训的学生暑假期间均不让回家，在酷暑中，承受严格的军事集中训练。

当时正是傅作义将军主政绥远兼三十五军军长，由于日寇在“九·一八”后，得寸进尺，竟然于秋末侵入绥境，傅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自卫反击，爆发了有名的长城抗战，特别是百灵庙战役，击溃了日伪后，使边远沉寂的绥远省，顿然引起全国的注目和各地军民的喝采。于是各地慰劳团体，络绎不绝地来到了绥远，抗日救国的嘹亮歌声，响彻了绥远的上空；全国各地充满激情的慰劳信，象雪片似的飞到了绥远，慰劳团中有一位进步音乐家刘良模先生，一九三六年冬初来到绥远时，在绥远饭店（即现在的人民电影院）召集各校学生，教唱《救国歌》，到现在我还记得歌词是：“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努力呀，努力呀，努力呀，救国要奋，救国要奋斗！”如此反复唱几次后，就开始全场二部合唱，不一会儿不仅都会唱了，而且那种激昂慷慨的歌声，把人们救亡图存的激情引到了最高潮，我们愈唱而热血愈沸腾，恨不得马上投军从戎，奔向抗日战场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就在这个当儿，我们一中的军事教官姚寿华，站在我们的背后，骂这位教歌的刘先生，说刘先生是煽



动学生，不怀好心，并勒令我们回学校去。这些所谓中央派来的军事教官，最反对宣传鼓动抗日情绪的场所。从这点也可以说明救国与卖国两条道路的斗争了。

在这些教官们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下，我们还参加了长城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了烈士们碧血洒荒野，青山埋忠骨的悲壮事迹和英灵，他们为中华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使我们热泪盈眶，久久不能自己！可是那些身负特殊使命的教官们，却无动于衷。

这年寒假，绥远学生不顾那些教官们的拦阻与恫吓，组织慰问团到百灵庙慰问英勇杀敌的三十五军孙兰峰旅的将士。到达营地后，听取参谋长袁庆荣讲解战斗的经过，还到作战现场作了指点，使我们这些参加慰劳的热血青年竟然忘掉凛冽寒风的刺骨，逐句地铭刻在我们的心田。

一九三七年，绥远各中等学校在普遍实行军训的基础上，继一九三六年第一届学生军事集中训练后，又开始了绥远省第二届学生军事集中训练。当时我住绥远省第一中学高一，参加了这次集训。从四月份起各校完全停课，开始集中军事训练，不参加的班次，都放假回家，欣欣向荣的学校，一时变成了军队式的营盘。

集训组织的名称是：“绥远省第二届学生军事集中训练总队”。总队长由傅作义将军兼，副总队长向鸿钧是国民党中央所委派，级别上校；政治总教官杨焕文，军事总教官杨剑秋，都是训练总监部派来的，均为上校级。总队下辖三个大队，每队三个中队，分别在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及正风中学等校集中训练。各中队长都由中央委派在各学校的军事教官兼任，均为校级。每中队下辖三个区队，区队长和班长，均

由二十五军派充；军事教官、政治教官则由中央委派。

我被编入第三中队一区队第一组，中队长是第一中学的军事教官姚寿华，级别中校，安徽人，黄埔军校毕业。区队长姓李，我记不清名字，是三十五军的一位上尉级别的军官，他曾在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受过短期训练，佩有“蒋中正赠”刻有“不成功便成仁”字样的小佩剑，班长叫王杰，是三十五军中的一个上士排附，他军事动作娴熟，脾气很不好，对我们完全用对大兵那套“无理要求，绝对服从”的办法，严格要求我们，稍不顺他的心，上来就是一拳头。出操回来，中队长、区队长脱马靴、打洗脚水，均得我们轮流给他们值勤。班长起初也让我们给打洗脸洗脚水，经过我们的对抗，才赢得了免去这项勤务的胜利。

我们这个第三中队和第一、第二中队，同随总队部住在第一中学内，所以集中授课和听报告，大部在一中礼堂，对我们来说，的确少走了不少路。军事学科及政治课，一般都分别集中在一中和一师的大礼堂内讲授。总队的会操、检阅或上级的校阅，各中队都得到三十五军营房附近的小教场集中进行。军事科目，有各个班、排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以及各种典、范、条令的讲解及演习。政治课目有“如何拥护领袖”、“如何复兴中华民族”和陈诚所宣扬的那种“领袖脑壳论”等等。在集训中间，还围绕上列政治课的内容，举行了两次讲演和论文比赛。这些东西，主要是给学生们灌输蒋介石倡导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藉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以利对外屈辱求和对内大打内战的反动主张的实施。其用心“良苦”，真所谓“司马之心，路人可见”了。

在集训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还专程来归绥进行检阅，在小教场举行了阅兵式、分列式的校阅以后，何应钦还在绥远饭店给我们讲过一次话，内容虽记不太清楚，但他那副仪容，我是忘不掉的。他架着一付白金丝眼镜，身着高级将校呢礼服，左口袋上方佩满“勋章”，闪亮的武装带斜佩着“蒋中正赠”字样的佩剑，马靴锃亮，马刺发光，天虽炎热还戴着雪白的手套，真是衣冠楚楚，不可一世啊！再看陪同他的傅作义先生，只着一身大兵的灰布军服，腰系一条战士的皮带，足穿黑布军鞋，打着灰绑腿带，两相对比，一个是鹤冠博带，神气十足，高高在上的“伟人”，一个是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的将军；一个是签订辱国条约“何梅协定”的罪魁祸首，一个是长城抗战的民族英雄；显明的对照，更使我们感到这位“伟人”的可耻与可恨。

在集训中，学生们对中央所派的那些教官们，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的言行作为，和热血沸腾强烈要求抗日的学生心情，完全背道而驰。学生们一唱抗日救国歌曲，他们就诬为“过激”，不是冷遇就是申斥，所以学生们对这批教官，的确恨之入骨。在愤懑心情的驱使下，同学们给这些教官起了绰号，如一中教官姚寿华，我们给他起了个“窑皮”的“美”号，因为他每到星期日，就换上长袍礼帽的便服，到妓女院逛窑子去；二中教官龙月波学生们叫他“蠢球”，正风中学教官刘玉常叫“顺腿流”，一师教官称为“夜猫子”，还有“炮弹”、“王得儿”等，总之：每个教官都起了象征性很强的“美称”，学生们对这批传声筒教官的蔑视，于此可见了。

## (二)

当年六月中旬，国民党的训练总监部有令着全国高中以上的集训学生，每校选一名优秀代表，组成各省学生军事集中训练赴庐聆训代表队，分两批衔接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聆训。我们绥远省中等学校共有九个，其中有高中部的只有一中和一师两校，其余均属初中，按规定只能出两名代表，但由于绥远地处边陲，文化落后，再加上长城抗战后的绥远形势的变化，所以破格允准，不管高初中，每校选派代表一人，组成代表队前往。如此我们共选出九名代表，组成了“绥远省学生军事集中训练总队赴庐聆训代表队”。第一中学是我、一师卢秉颖、蒙旗师范云惠元、职业学校郝森林、正风中学张占荣、第二师范薛岐山、第二中学史秉衡，中山学院的代表，我想不起来了，一共九人，编成一个班，共推我为班长，卢秉颖为副班长（因为我二人是高中、高师级）。为了沿途洽接联络顺利，我们还印了全衔代表队的名片，并做了一面队旗。总队部派中校教官唐炯带队，一切就绪后，傅作义主席在省府后院，召见了我们，当面嘱咐出去以后，要处处注意，事事留心，要为绥远全省的学生争光！我们表示了决心后，当场发给我们往返旅差费五百元金马驹法币，由我保管负责出纳。总队还为我们九人做了统一的新军服，每人再发一条军毯，一个水壶，全是新的。就这样我们排着队，扛着队旗，在教官的率领下，于七月十三日乘火车由归绥出发了。

出发时，芦沟桥事变已过七天，京汉路北段还不通车。我们从大同转同蒲路先到太原，然后从正太路转石家庄，再乘京汉路车到达汉口。一下车教官让我们整队扛旗唱着歌前

进。当时的汉口，楼房并不多，但比起归绥，则是大巫见小巫，我们这些塞上娃，还是第一次开眼，简直使我们东张西望，大一步小一步地不会走路了。

我们刚住进大华饭店还未卸装，就有两个极其摩登的女子，涂脂抹粉、奇装异服，站到我们所住房间的窗口，手托腮帮，一个劲地看着我们微笑，当时我还认为是那家官员的太太不守清规呢，经我们有经验的教官解说，才知道这是操皮肉生涯的“野妓”，啊！真没见过呀！一会儿，我们到洗澡间洗澡，不料这两位“太太”又从窗口看着我们只是托腮微笑，这可把我们臊得坐在澡盆里既不敢抬头，也不敢乱动，好容易等这两位“太太”走开（大概她们识破我们不是寻花问柳的顾客而失望走去），马上我们跑出洗澡间，才算躲过这种尴尬的处境。夜间饭店里弹歌小唱声，男女猥亵声，哗哗的麻将声，汇成纸醉金迷，酒绿灯红的污浊之夜，简直噪得我们难以入睡，直到东方既白，而这些“宠儿”才进入“甜蜜”的梦乡。芦沟桥隆隆的炮声，还震不醒后方荒淫无度的夜生活，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的写照啊！一叹！

在汉口我们参观了应有的新市场，那种玲珑剔透的福建骨雕，迄今还记忆犹新。接着还游览了中山公园及江干名胜，冒着酷暑爬上了黄鹤楼，放眼远眺，真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啊！这时游人如织，香烟缭绕，络绎不绝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在吕祖庙里抽签问卜，大概是为了时局航程，求神指示迷津吧！下来时发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黄兴铜塑像岿然屹立在路旁，我们凭悼良久，依依离去。

我们从汉口坐轮船到了九江转上庐山。抵莲花洞而庐山的五老峰已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古人说：“难见庐山真面目”一点不错，五老峰经常在云雾中交互隐现，就是一个证明。香炉峰的瀑布，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奇丽壮观，堪称观止。上山时，我们“高贵”的教官，坐上两人抬着椅子形的滑竿，逍遥自在地观赏着秀丽的山景，我们这九个丘八式的学生跟在滑竿后，汗流如注。抬滑竿的两名壮汉，光着脚，履险如夷，赤着背，肩上压出很厚而凸起的茧子，苦力劳动者，着实可怜！山路奇险，陡峭参天，峰回路转，目不暇接。

到达山麓牯岭市后，训练总监部有专人招待我们，住到庐山图书馆，房间里内务整洁，宛如军营。

山上到处有权要人物雪白色的别墅，掩映矗立在郁郁葱葱的碧绿景色里，相嵌点缀，煞是好看！山上的气候凉爽极了，这种凉是Cool而不是Cold 炽热的夏天，有此境遇，无怪乎要人们在火热的伏天，都到庐山避暑呢！那真是意想不到的一种清新、凉爽、舒适，仙境般地享受啊！我想他们沉浸在这样的避暑胜地里还能体味出劳动人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苦生活吗？

我们在吃饭上也遇到了困难，顿顿大米，吃不上白面，特别是油炸大对虾，我们一看就生畏，多少次都是望虾怯管，后来我们才逐渐入门知味了。一天我们到英国人开的商店买雨衣去，未等进门就被人家推出来，我们说买雨衣，人家说我们买不起，一问价的确惊人，这次奇耻大辱，终身难忘。那个时代，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被看不起，处处受辱，抬不起头来。

我们在庐山图书馆住了一周，首先听了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的训话，内容记不太清了，可是中间有一句话，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我叫周亚卫，原意是保卫亚洲，可是现在连中国也保卫不了了！”这时，日寇正长驱直入，大块国土被占领，这句话为当时的局势所映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在庐山图书馆前广场上，排演了数次照像的队形，声言蒋介石要同各聆训代表队合影留念，卒因沪战突然爆发，蒋仓皇飞回南京，而合影一事化作泡影。

在庐山大礼堂，各省聆训代表队，举行了一次联欢并比赛歌曲，其它各省代表队，少则三十多人，多则百余人，唯独我们绥远仅有九名，是人数最少的一个代表队。这样和兄弟省市比较，真是有点相形见绌。可是我们牢记临走时傅作义先生的鼓励，九人鼓起勇气，引吭高歌，结果人虽少而效果尚佳，每次唱毕，还博得热烈的掌声，丝毫没因人少而逊色。另外各代表队选出一个班进行班制式教练和班战斗教练比赛，我们九人虽不满一个班，在指挥官下达科目后，我大胆的指挥，八个队员认真演练，结果还得到较好的评价。

庐山最后一次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聆训，就是在海会寺听庐山暑期训练团团团长陈诚的时事形势报告。这天我们从牯岭市沿着悬崖上凿出梯阶式的小道，在细雨濛濛大雾弥漫看不出三步远的铁索杆栏石磴路中，提心吊胆地盘旋下到海会寺大礼堂。这是陈诚给少校级以上的暑期受训军官们作的一次重要训话，破格让我们聆训代表队亦参加。所讲的内容当时宣布不准任何人向外界发表。主要内容是：中国和日本在军事实力上的对比和双方军队素质作战能力的分析，从他

的讲述中，使人一听，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这个所谓形势报告，彻头彻尾是三个月亡国论的版本，特别强调不安内就无法攘外的谬论。截止这次最后“聆训”，给我们整个的印象是：恐日病的气氛，笼罩着弥漫着庐山的上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这就是庐山聆训的所获。

沪战爆发后，在庐山避暑的要员们，考虑到他们的财产及后事，相继匆匆下山飞回南京。各省的学生聆训队，也不得不草草结束。我们奉命在鄱阳湖鞋山附近上了轮船，沿长江顺流东下直抵南京。

到达南京后，我们被安置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炮标 住宿。蒸笼似的湿热气候，使人喘不过气来，夜间睡在院内草坪上，还浑汗如雨，不住摇扇，直到后半夜，才能合一会眼。日夜防空演习，被刺耳的警报吼声，弄得人们心惶意乱，夜间实行灯火管制，探照灯的光柱，从四面八方，交会在南京上空，简直成了大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景象。

休息一天后，首先参加了军校的扩大纪念周，在这次纪念周集会上要召集中央各要员、陆军大学师生等，由蒋介石作训话，抵京的各省学生聆训队亦参加。我们被安置在军校大礼堂的楼上，楼下挤满了中央各部门的要员和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军校全体学生在礼堂外广场上列队听训。这次参加的杂七杂八的部门，人数特别多。在蒋介石未出场前，我们观察了一下大礼堂的布置：正中央悬挂孙中山先生的标准遗像，下面是他的遗嘱。两旁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联语。党旗和国旗左右分插，主席台上两侧挂着一副长联，上联是“生命的意义在创造人类继起的生命”下联是“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礼堂正中横悬一



匾上书“礼义廉耻”四个大字。这些联匾，都是深蓝色底，上雕镏金字，看上去堂而皇之，庄严肃穆，实际如何，也不过是虚伪装璜，欺世盗名而已。

当蒋介石出场后，礼堂顿时鸦雀无声，人们屏息着呼吸，一动也不敢动，那种独裁专制的淫威，简直窒息着人们的自由呼吸。蒋某以严峻的目光，向楼上楼下扫视了一阵后，故作镇静地开始了训话。他那浙江的口音，好多话我都听不懂。主要的内容是：“和平未到绝望时刻，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接着还是中日力量的对比，言外之意，中国实力不如日本，战则没有胜利的把握。芦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长驱直入，形势紧迫到这样，而蒋还犹豫不决，幻想和平，这是多么令人气愤的事啊！

第二天我们乘车前往紫金山敬谒中山陵，远远我们就望见一派雪白色似的陵园建筑，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整队入门，拾级而登上了陵寝的大厅前，由护陵警卫部队引导我们列队面向大厅，举行了谒陵程序，然后缓步依次而入，在陵寝的外厅，是孙中山先生的高坐雕像，我们瞻仰了坐象后，进入陵寝，在椭圆形的陵寝边，俯视水晶棺内中山先生仰卧着的遗体，上面覆盖着党、国旗，脚下呈供着大型金叶花圈，落款孙科。拱形顶上，镶嵌着不太耀眼的电灯；墙壁上雕刻着他的遗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字体镏金，闪闪发光。我们徐步绕棺一周后，停步凭悼良久，依依而出。

步出陵寝大厅后，俯视汉白玉宽广的台阶大概有几百个阶梯；陵园四周墙下特别是两侧奇花异树，带比排列，据说

多系各国赠送，用表敬仰之意；由于我们对孙中山先生高崇的敬意，所以谒陵印象，迄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下关、浦口间的轮渡，这在当时来说，还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据介绍是德国工程师给设计的。当时长江上没有大桥，火车过江，全靠轮渡，轮船上铺有道轨，火车过下关与浦口间的滔滔长江时，以轮船接通两头的轨道而过。奇怪的是，长江水位升了而轮船自然下降，反之，长江水位降了而轮船却上升，不管江水涨或落，船上的轨道总能与两岸陆上铁轨接平通过。解说人给我们大讲科学道理，我还是稀里糊涂听不懂，只是觉得新奇巧妙而已。今天看来，怎么也不如我们南京长江大桥的雄伟和方便了。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是蒋介石培养嫡系部队军官的学府，他兼任军校校长并住在校隔壁，警卫还得军校学生担任他才放心。所以首先让我们去看看他的军校。我们看了军校学生的内务的确整齐划一、清洁卫生、窗明几净，有条不紊，军毯叠得象刀切似的方整，就连牙刷把都摆成一个方向。紧接着让我们参观了各种制式教练，是比我们学生集训的操练好得多。又领我们参观了现代化的靶场，有好多自动装置，有炸战车、打飞机等模拟射击表演，这对我们来说也真开了眼界。

在金陵兵工厂参观了制造子弹全部生产过程，从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成品子弹出来一整套自动化过程，光这道生产弹药线，我们就参观了大半天。我们这些学生，一窍不通，只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还参观了唐山炮兵学校，该校礼堂阔气，仅次于军校礼堂，校长邹作华（据说是东北军的一位老炮兵专家），

在大礼堂给我们讲了中炮国兵发展的历史，然后让我们参观了各种炮的制式操作和模拟射击。午饭后返回军校。

在参观通信学校时，看到军犬听人指使做出各种动作，觉得很好玩，遂哄笑嬉戏开来，结果被该校校长，把我们臭骂了一顿，责备我们把他那挂街的军犬当玩物笑闹，是大不敬的举动，后来大家谁也不说不笑地参观了军用通信鸽算完了。

工兵学校我们也参观了一次，给我们表演了探雷、扫雷、破坏铁丝网、架桥等课目后，又走马观花地参观了榴弹学校的项目。

最后，还让我们到机场，参观蒋介石乘坐的专机。这架特殊飞机，是意大利首相莫索里尼赠送给他的，机身较大，的确和普通飞机不一样。我们要上去坐坐，被教官斥责一顿未坐。蒋介石和莫索里尼、希特勒是一流独裁者的货色，所以他们气味相投，不比寻常了。此外还看了飞机发动和起飞的动作算了事。

到南京参观之后，给我们的印象是：有这么多的军事学校，培养出多少军事干部，反而对小日本却怕得要命，悲夫！这时时局一天比一天吃紧，南京日夜防空，人心惶惶，训练总监部深知时局不利，力促我们离开南京返省，于是我们破格要求了一张乘特快返回的军用护照，匆匆离开南京。这时第二批聆训队已到达南京了。

我们在归途中，目击沿途纷纷乱乱的军队像惊弓之鸟，争先恐后向后方退窜。火车及军队车辆均用草绿色的伪装网罩着，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日本军队，被我们那些胆小如鼠的要员们宣传得太吓人了。

我们坐津浦路车到徐州转陇海路，直抵潼关，从风陵渡过了黄河，乘同浦线其慢如牛的火车，好不容易到了太原。该市也已混乱不堪，天天防空，警报凄厉的响声，使人们丧魂落魄，看来恐日病早已蔓延到太原了。于是我们乘车赶到大同，又转车返回归绥。这时南口已失，日寇长驱西进，军训总队的头头们都早已逃之夭夭了。学校无人管事，机关绅商，纷纷向后套迁移，我们九人，自觉地各回各家探望，不料返家后，日寇很快占领了归绥及家乡四周各县城，遂使我出走靡由，蟠伏在家里，日夜不安，直到冬天八路军一二〇师宋支队从晋西北越过长城到了我们家乡——凉城南山营盘梁，我才参加了抗日游击支队，踏上抗战的征程。

（完）

## 吉鸿昌将军轶事二则

### 耿泽山

一九三八年夏，我去河南开封考学。当时正值北伐战争结束，冯玉祥将军兼任河南省主席，他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及表彰在北伐战争中流血牺牲战功卓著的将士，特在开封相国寺利用一座大佛殿，改作临时的“革命纪念馆”。相国寺是开封最热闹的游乐场所，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去那里游玩，顺便参观了革命纪念馆。我一走进该馆的大门，首先看见迎门竖立着一座一丈多高的玻璃亭，亭子的顶部嵌镶着“吉鸿昌将军血衣亭”几个大字，特别引人注目。走近亭子一看，里边悬挂着一件半旧的灰布皮大衣。大衣的肩部及两袖的上部沾满了黑红色早已干巴了的血迹。那次参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座“血衣亭”和“吉鸿昌”这个名字。当时我曾凝神沉思，对这位英雄默默地起敬。很想了解这位吉将军那件血大衣的来历，但仅凭看了看旁边挂的一纸简介是满足不了心愿的。

事有巧合，后来我参加了冯玉祥办的军事学校当学兵。毕业后，正巧分配到吉鸿昌领导的部队工作，结识了一个朋友名叫郜云露。了解到他曾追随吉当警卫员多年，有一天在闲谈中，谈起开封革命纪念馆参观“血衣亭”的事，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了这段吉将军的勇敢果断的真实故事。他说：那是民国十六年初春，北伐军冯玉祥领导的第二集团军开始向盘踞在山东省西南地区的奉鲁军进攻，吉鸿昌率领号

称铁军的第十九师连克运城、嘉祥两个县城后继续攻打曹县城。防守曹县的敌人是张宗昌的王牌军姜明玉部，装备精良、战斗顽强，加以曹县城墙坚固，设防严密。吉部十九师屡攻难下并且伤亡较重。吉师长对此异常焦急忿怒，乃命令他的卫队营及各旅赶造云梯，准备爬城强攻，并从卫队营挑选敢死队数十人，他亲自督练爬城动作。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吉师长命令各部发动总攻击，他亲率卫队营到第一线督战走在敢死队后面。战士们的鞋底都插上棉花静悄悄地接近城墙，正要竖梯爬城，被城上敌人发觉，鸣枪示警，这时吉师长命令吹冲锋号，在一片喊杀声中敢死队的勇士们在敌人枪弹阻击下纷纷竖起云梯奋不顾身拼死轮番爬登，上边的倒下来，下边的又涌上去，拚搏的激烈感天地而泣鬼神。约半个多小时后，一个突袭点的几个敢死队员用集束手榴弹消灭了城上的对手，跃身登上城墙，高呼“我们上来了！快向师长报告！”喊声刚落，随即听到铜钟般答话：“不用报告了，我在这里”。在昏暗中，战士们定睛一看，竟是吉师长。这时吉师长臂部负伤，鲜血淌流，已湿透了大衣，但他毫无顾忌，拒绝警卫员的包扎救护，仍挥手指挥登上城的勇士们赶紧用冲锋枪扫射左右城上的敌人，扩大战果。一点突破，全线改观，后续部队陆续登城。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敌人落魄丧胆在混乱中纷纷弃械逃窜，有的成批地投降，敌师长姜明玉被活捉。听完这一真实生动的故事，才清楚地了解开封革命纪念馆那座血衣亭的由来。

另一件事是惩办贪官

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阎冯倒蒋战役失败，吉

鸿昌为保存西北军的实力，率部暂与蒋介石妥协，改编为中央军第二十六路军，吉任总指挥，所辖三十、三十一两师及第四混成旅，开赴大别山北麓潢川、光山、罗山一带驻防。同年冬初蒋介石电令吉调派一部挺进大别山进攻红军根据地。吉为敷衍蒋的命令，指派驻防罗山的三十一师九十二旅全部开拔执行任务（事前吉已把情况通知了红四军）。九十二旅旅长李敬明率部队从罗山出发经宣化店、七里坪等地，一路未经任何战斗深入红军根据地黄安县，在该县平静无事度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春天该旅又奉令返回罗山县原驻地，这就揭发了一件意想不到的贪污案件。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去年九十二旅驻防罗山期间，部队食用的军粮，全是通过县支应局向该县各乡征购的，在该旅离开罗山时所有粮款向支应局完全结算清楚，付给了现金。按说该支应局应将粮款照数付给各乡卖粮农户，万没想到罗山县支应局长尚伟仁狗胆包天，竟勾结县长胡光麓将粮款两万余元贪污私分。他们愚弄乡民诡称九十二旅军饷困难，仓促开拔，所欠粮款分文未付。老百姓不明真象，信以为实，只有暗暗叫苦，咒骂吉鸿昌的部队坑国害民。也该胡、尚两个贪官倒楣，第二年九十二旅又重返罗山。

九十二旅回到罗山驻定后，有的乡镇派代表到部队询问粮款问题。旅长李敬明一听此事，十分气忿，很快向师长张印湘及吉总指挥请示如何处理。吉鸿昌将军一向对所部的纪律要求甚严，对军内军外的贪官污吏，只要查出一定严惩。他听完李旅长的汇报后，大为震怒，拍桌子大骂：“这些狗官真是该杀！”第二天他随带总部的军法处长亲自到罗山过问此案。他到旅部稍事休息，即召见县长胡光麓及尚伟仁。

胡、尚没意识到吉总指挥是为处理他们的贪污案而来的。记得当时正值暑天，气候很热。胡尚二人，衣冠楚楚来到旅部院内，有人引进旅长办公室，他们进门即点头哈腰向吉将军寒暄问好，吉将军没有理会他们，面带怒容站起来开门见山就问：“去年九十二旅征购的粮款给你们结清没有？”他们一见吉的神态又听到问粮款的事，马上脸色发黄言语吱唔说：“都……都结清了。”吉又问：“粮款付给各乡农户没有！”他们吞吞吐吐地答：“那……那款县府暂时挪用了。”吉未容他们再多诡辩，走前两步，举手赏了他们每人两个响亮的耳光。吓得两人浑身发抖、狼狈不堪。这和平日站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神气，成了鲜明的对比。随后，军法处长叫人把尚伟仁押起来，喝令胡光麓回县把所欠粮款限一星期内发付给各乡农户再听候处理。胡光麓灰溜溜地走了，尚伟仁被戴上脚镣关押起来。这一消息不翼而飞，传遍罗山城乡，农民们无不拍手称快，赞颂吉总指挥办事英明果决。

当时刘峙正兼任河南省主席，胡光麓曾是刘峙的亲信部下；尚伟仁是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官僚，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河南省官钱局局长，是罗山县头号大劣绅，他的儿子当时在南京政府任较高的职位。他们有钱有势，所以才敢胆大妄为鱼肉乡民。此案揭发后，胡、尚的孝子贤孙在开封、南京到处奔走，妄图营救，特别是求告于他们的大靠山刘峙。刘峙未负所望，乃函电往复与吉鸿昌磋商，强调胡、尚是地方官，应由省府审理为宜。吉将军再三考虑贪污的粮款问题既已解决，部队恢复了声誉，不愿再为两犯的刑事责任多所争执。乃将已经镣禁二十多天的主犯尚伟仁及其县长胡光麓一并解送开封省政府。



## 呼和浩特市“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 边计

呼和浩特市“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坐落在火车站的西北侧。它的北面，逾越海拉尔路与公主府相邻，它的西面，横过赛罕路与胜利桥相接，恰位于两路的交汇处。

公墓始建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八二年由市人民政府拨款重修。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军队侵占了热河，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等要隘相继沦陷，中国各路部队纷纷后撤。五月二十二日夜，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开始与敌方商议停战，二十三日早四时，接受了日寇的城下之盟。就在这时，离北平六十余里的怀柔县城附近，傅作义将军指挥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与日寇侵华主力第八师团铃木旅团的早田联队和川田旅团的福田支队，展开了一场反侵略的激战。五十九军面对的敌人，兵员为我之二倍，武器尤其精良，但由于五十九军官兵同仇敌忾，戮力同心，发挥近敌战、肉搏战、伏枪、伏炮之优势，打退日寇一次又一次进攻。战斗中，全体官兵表现了顽强的不怕死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悲歌。战斗进行到下午七时，大量杀伤了敌人，给疯狂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乃执行北平军分会命令，退出战斗。五月三十一日何应钦与梅津签订《塘沽休战协定》，傅部开至昌平集结，旋复返回绥远。

在这一战役中，中国方面阵亡367人，受伤284人。同年九月傅作义将军派人从当时的战场得203具尸体，装殓入棺，运回归绥，并修此公墓。

公墓原建墓堂一所，墓碑一座。碑为三菱柱形。碑的正面刻字，上款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中行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下款为“傅作义敬建”共二十九个字。碑座上刻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碑文。纪念碑由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撰文，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同书丹。碑文上简叙了五十九军官兵顽强杀敌的英雄气概，歌颂了烈士们为国捐躯的丰功伟绩。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它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永远不会亡，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

三菱柱形石碑的另两面，刻着阵亡将士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激励着前往凭悼的人们的心。

墓堂宽敞明亮。一九八二年重修时，在墓堂的两侧增筑两座对称的亭台式的建筑。

公墓陵园占地：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50米，共面积110亩。园内松柏掩映，杨柳成行，数百株桃树，点缀其间，在园林工人的培育下，还设有花坛，现已成为附近居民锻炼及游览的场所。

# 心中的丰碑 永恒的怀念

——记五原战役中死而复生的宋海潮先生

周树钧

抗日战争时期，在绥远省河套地区传诵着一个传奇性的故事：傅作义将军所部一〇一师三〇三团团团长宋海潮先生为国捐躯而又复生了。这个传奇性的故事，不仅传诵在傅部的军政人员中，而且扩展到整个河套地区，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我和他相识是在一九四〇年九月，是他刚从后方医院回到部队不久，那时我在三〇三团团部政工室工作，每天和他一个院子里住宿，一个桌子旁吃饭，而他在五原战役中的英雄事迹，是我和他未认识前早就听说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傅作义将军率部攻入包头市内，日寇遭到严重打击，便采取报复手段，集中大量兵力，于一九四〇年一月末二月初，开始向绥西河套地区进犯，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傅作义主力部队。当时我在一〇一师三〇三团担任指导员。为了阻击从北路乌镇、乌不浪口向五原进攻的日军，二月二日我团在折桂乡利用城堡、围墙和日寇激战了一天，双方伤亡甚重。我团团长王赞臣身负重伤，我连连长和第一排长也都受了伤，全团伤亡四百余人。为了保存

有生力量，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傅将军命令各部避开正面战场，向偏僻地区转移。我团奉命后，也沿阴山向西转进。日寇便沿着大路，占领了五原、临河等地。

敌人后方空虚，不能久留，加以各村实施空室清野，不能站脚，不得已又把战线缩短，自动放弃陕坝、临河等地，把部队龟缩到丰济渠以东，部署在五原外围，以五原城为中心，准备长期固守，以确保归（绥）、包（头）安全，并进而控制河套地区。

河套是傅作义的命根子。如果丢失了河套，不仅没有立脚之地，而且整个大西北都将受到威胁。但打吧，又如何打呢？部队转战察、绥、晋数省，加上这次进击包头会师河套，损失严重，干部思想混乱。为了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舞斗志，傅作义将军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广泛征求大家意见。在大敌当前，国土丢失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在讨论中，有人主张到后方去休整一个时期，求得补充，回来再战；也有人主张，我们固守丰济渠，在丰济渠以西进行整顿，缓一缓气，然后再打；还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以上意见，他们认为：利用黄河解冻之期，乘敌立脚未稳，这正是我们打击敌人，收复失地的良好时机。当时，宋海潮任新三十一师上校参谋主任，是主战最坚决的一员。他们说：“我们不同意不打或缓打的主张。因为，河套的存亡，关系到西北大局和抗战后方的安危，到后方整顿一个时期再打回来，那时敌人脚跟已稳，战力增强，要收复河套谈何容易，这是幻想；如果到宁夏，马鸿逵能容我们存在吗？有人希望到后方补充人马枪弹，也是办不到的。我们过去打了胜仗，他们给我们补充了什么？枪还是旧

枪，炮还是旧炮。现在带领残部，跑到活方，正好坠入人家消除异己的圈套，会给我们补充吗？我们看只有依靠自己。因为地形我们熟悉；老百姓支持我们，宾主之势对我有利；目前日军大部东撤，留在五原的只有一个连队，虽有伪蒙军六个师，但战斗力不强。而我们步骑炮合起来还有一万多人，敌我对比我占优势。再加黄河解冻，大地翻浆；五原城墙也早已被拆除，敌人无险可守，随处都可以进攻，仗不但可打，而且一定能打胜……”。傅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表态同意宋海潮等主张现在即打的意见。他说：“我向大家表决心，誓与后套共存亡，就是最后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血战到底”。

一九四〇年三月，正是黄河解冻期，道路翻浆，人走上去还要颤抖，汽车、坦克、大炮、骑兵就更困难了。再加各大渠溢水横流，到处一片汪洋，困守在五原城内及五原外围的日伪军，已陷于四面楚歌不能自拔的境地。这时，傅作义将军为攻取五原而秘密组织的掏心突击队，已经训练完毕，便及时下达了向五原及外围据点进攻的命令。各部队按照命令的部署分头前进，我所在的一〇一师，奉命驰往五原之北，防守乌加河沿岸，破坏乌加河与乌拉壕上的桥梁，切断敌人援兵的道路，阻击敌人的增援。这时，我留在临河训练新兵，未能参与战斗。宋海潮是这个时候调到一〇一师三〇三团担任团长，接替王赞臣的职务。三〇二团担任攻击乌加河二财主圪旦守桥敌人和破坏桥梁的任务。三月二十日夜，该团到达攻击地点，一方面派一小部队从郭碾房渡河到北岸，两面夹击，很快击溃了守桥的敌人，并炸毁了桥梁。二十一日敌人增援部队乘汽车八十余辆，到达万和长附近，发

现桥梁破坏不能通过，企图架设浮桥和抢修乌加河桥，即与我隔河展开了激烈战斗。我们利用有力地形，以火力封锁了河岸，使敌不能得逞。在战斗中三〇二团团团长郭景云受了伤，董其武师长又命三〇三团团团长宋海潮率部阻击，防止敌人渡河和修桥。战斗一直坚持了一天一夜，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三月二十二日，我攻城部队完全收复了五原县外围据点和五原县城。盘踞在外围据点和五原县城的敌人，绝大部分死于阵前，侥幸逃出的，有的被游击队打死，有的被村民诱杀，有的冒险横渡乌加河，而淹死在水里。基本上做了全部歼灭。

在这次战斗中，全歼日伪军万余人，俘敌五十余人，缴获各种大炮十六门，汽车五十余辆，其他枪枝弹药甚多。大桥大佐和桑原特务机关长都被击毙。敌酋水川伊夫中将被砍下了脑袋。

提起水川伊夫，这个人不简单。原来他是日本皇族。为了庆贺入侵河套战役的胜利和慰劳五原前线的日伪官兵，专程从日本乘飞机到包头，从包头又到五原。但他那里料到竟在五原遇上我军反击。结果作了一名超级殉葬品。

敌人在五原战役彻底失败遭到惨重损失，为了挽回败局，寻找失踪的官兵和回收尸体，调集重兵于三月二十四日以数十门大炮向乌加河右岸我一〇一师三〇一团阵地猛轰，并以飞机十余架低空轰炸、扫射，掩护一个旅团乘橡皮船强行渡河，我三〇一团伤亡惨重，团长王建业臂部受伤。敌过河后迁回到我三〇三团背后向我猛击，全团官兵浴血奋战。团长宋海潮身先士卒，阻敌前进，战斗愈打愈烈，进入了近距离阶段，他毫无惧色，还从容指挥，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

锋。敌人用机枪连续扫射，他腰部连中七弹，洞穿大肠，昏死过去。此时，傅作义将军认为攻击五原的任务已经完成，阻援再无必要，放敌进来，待机再歼。遂令部队向后转移。宋的警卫人员大都牺牲，只剩下勤务兵门兆祥，他认为团长已死，在敌人密集炮火的袭击下，来不及掩埋，只好匆匆跟随部队转移了。

部队撤到后方，门兆祥向师长汇报了团长死亡的情况，师长对宋团长的牺牲，非常哀痛，急派门兆祥换成便衣，又带了几个回来寻找。

当时，由于宋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大家都认为他已经牺牲。国民党中央追认他为中将，并按中将予以抚恤待遇。国民党的报纸如：《中央日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在第一版都报道了他身中七弹，壮烈殉国的消息。有的还画了连环画宣扬他的英雄事迹，称他为“民族英雄”。

宋海潮先生实际没有死，而是奇迹般地复生了。当天夜晚，宋复苏过来，看见满天星斗，寂无人声，但因流血过多，天气特别寒冷，不仅伤口已冻，而且手和脚都冻僵了，痛疼万分，又晕厥过去。

在作战的前一天，部队借了村里老乡一付挑水桶，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老乡刘大宽、郭四毛旦来这里找水桶和扁担，发现有人在呻吟，进前审视，见还有一口气，就把他背回家中。村中有人曾见他给部队讲过话，认定是一位当官的。他就是宋海潮。白天怕被汉奸和日本人看见，就把他藏在村外场面的高粱杆里，夜里给他送水送饭。由于老乡的细心护理服侍，才免于死亡。

再说门兆祥等人返回战场，寻觅宋的尸体，遍寻无着，

进村打听，方知下落。找到宋海潮团长，便夜行昼宿，将宋辗转送到了宁夏后方医院。蒋介石接到宋未死并已送到医院的报告，立即派两名德国医生从重庆飞到宁夏。经过手术治疗，才获得了新生。但却留下了满身伤痕和残疾，腰部有两处一尺多长的大伤口（尾骨还有一颗子弹未取出），两手伤残了八指，脚姆指冻掉了一个。宋在医院经过半年的治疗，终于伤愈归队，重新回到了抗日前线。在他路经陕坝时，傅作义将军接见了，对他说：“为了祝贺你的新生，我把你的字‘泽生’改为‘再生’。”宋听了很高兴，当即表示同意，愉快地接受了傅将军的建议，以后就正式改名为“宋再生”了。

宋海潮团长的这段传奇事迹，在河套地区传为佳话。后来在一九四一年夏乌镇战役时，他又率部击退了敌人的猖狂进犯。当地群众给他赠送了一面“卫民却敌”的大红锦旗。他的英勇爱国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受到人们的敬仰。

关于宋海潮先生的身世，据我所知，他是山西省万荣县城关乡沟北村（即小泽村）人，字“泽生”。一九〇八年出生于一个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的庄户人家，从小家中极贫，给人放猪。只念了几天小学，后来托人到太原上了学兵团（北方军校的前身），这里是公费。他在校学习勤奋，名列前茅，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一九三一年跟随傅作义将军，历任队长、营长、师参谋主任、团长和师长等职。他平时生活艰苦朴素，和士兵吃同样饭，穿同样衣，从不表现特殊。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易近人，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愿和他接近。一九四二年部队在五原陈三登圪旦驻扎时，三连连长郭丕清叫炊事员做小锅饭（面条），被团长发现，端给病号吃了



(当时粮食困难,人们都吃黑豆)。他治军极严,从不马虎,说到哪里作到哪里。一九四一年部队在乌镇驻防时(一说在临河东新家庙),运输连有个新入伍的小战士(十六、七岁),因猥亵幼女被团长知道,拉出要枪毙,后经军官和当地老乡极力求情,才免于死,结果一打二开除。由于他要求严格,赏罚严明,又能和士兵同甘苦共患难,所以深得官兵的尊敬和爱戴。

绥远“九·一九”起义后,他在绥远,担任军官总队代总队长(董其武主席兼任总队长),以收容从各地回来的军官。他们对他们热情关怀,照料备至。这些人经过党的培训,重新安排了工作,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道路。解放后,他到内蒙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二十多年来,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加强自我改造。努力工作,积极组织和撰写文史资料。三中全会后,他心情更加舒畅愉快,虽然血管硬化行动不便,但有些政治活动他仍积极参加,不断追求进步。我和他相识四十余年,是我的老上级。不幸,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因高血压脑出血他和我们永别了。宋海潮先生逝世后,组织上对他的家属很关怀,逢年过节,机关领导人多次携带礼品看望他的夫人。现在他的子女都参加工作,全家人住着宿舍楼,过着幸福的生活,用他夫人的话说:“共产党就是好啊!”

# 赵英先生传奇

张尔杰

辛亥革命以后，至日本投降以前，这三十多年中间，在土默川的前归、莎、托三县交界地区，曾有过一位远近闻名、影响颇大的清末秀才，这位老知识分子，就是现今土默特左旗大岱村已故的赵英先生。他的经历虽然并不震惊遐迩、惊天动地，但他傲骨嶙嶙，我行我素，对于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黑暗统治，始终是倔强顶抗，从不驯服，并且利用辛辣文字和讽刺语言，给予无情的口诛笔伐。由于他的愤世嫉俗，不向恶势力低头，敢言人所不敢言，而赢得了当地广大群众的同情与爱戴。至今这一地区的人，特别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当谈起赵英先生时，无不津津乐道，成为一个经过多半个世纪，仍为人们赞叹未忘记的人物。

赵英先生字子俊，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出生于大岱村一家农民家中，家境清贫，世代耕读，他自幼聪明好学，但科考很不顺利，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才在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跑到宁武考中山西宁武府和归绥道这一考区的壬寅科头名秀才。和归化城厅铁帽村的侯封鲁（后任绥远高等法院院长）和丰镇厅的温廷相（后任广州非常国会议员）等秀才为同年。因为归绥道于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始设七厅儒学总教谕，而无考棚设备，故

必须和宁武府属各州县童生，同在宁武贡院应试。

这次考试试题是“商汤三聘伊尹论”。笔者在幼年时期，曾读过他的这篇应试文章，记得开头破题一句是“古之圣君有求贤者，一聘不至至于再，再聘不至至于三，商汤之三聘伊尹是也。”接着引用刘备三顾茅庐、诸葛孔明应邀出山，终于创建蜀汉政权的历史，说明识才、重才、用才对于国家兴衰隆替所起的重大作用。虽是八股文章，也觉琅琅上口，对于今天的国情亦是不无现实意义的。此外，他鉴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和种植鸦片，人多吸毒的糜烂局面，曾摹拟杜牧的《阿房宫赋》写成《共和赋》，仿照刘禹锡的《陋室铭》写成《烟室陋》。《共和赋》记不清了，《烟室铭》的后几句改为“谈笑有烟鬼，往来无壮丁”和“无生计之乱耳，无国事之劳心，烟鬼云何怡之有”。虽是游戏笔墨，亦颇振聋发聩，故在归莎托三交界的各村书馆中，广为流传。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赵英先生的学生，过去两家都有《共和赋》和《烟室铭》的手抄本，我的一个妻弟都能背的滚瓜烂熟，回去进行收集，不难把全文录下，可以作为文献，保存起来。

土默川的汉族农民，多来自山西晋北的忻代“二州五县”。归莎托三交界地带，在赵英未考中头名秀才以前，各村的地主都讲究聘请老家的念书人设馆课子，尤其是蒙古人的嘎兰达和章盖，更迷信崞县和五台的秀才，因此本地品学皆优的童生，反不如忻代两地的下架子商人吃香。“二州五县”的秀才所以被人尊重，是因为名额有限而念书人太多，宁武府的保德州偏关县文化落后，其秀才便不值钱，由于偏关人不重视教育，“二州五县”的童生多冒其籍应考。辛亥革

命以前，在包莎一带为同盟会做地下工作的忻州人王 建屏（字树侯），就是冒籍偏关和赵英同在光绪二十八年考中的宁武府区秀才。因为赵英这次不仅和“二州五县”的童生作了较量，而且和“三晋名士”神池谷如墉（字美塘，出身进士，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粤海关监督，山西大学校长和袁世凯称帝时拟定的宰相）家的子弟见了高低，故其在宁武考取头名秀才以后，名噪边墙内外，这才扭转了口外从前相沿下来的“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和“此地无朱砂，红土也为贵”的传统观念，不仅赵英被尊为一方儒宗，连赵英的学生也被人看成是绥西夫子的门徒，于是发展了归莎托三交界地带的乡村教育，并形成黑河下游的文风。

赵英有了功名，闻者仰慕，先在木村设馆授徒，为地方培养人才，五年以后，又被双龙镇聘去，到黄河岸上，僻室讲学，一直坚持到二十年代未尝一日息肩。他在此一期间，教出的有名学生，除了安祥（一九二一年在莎县第五区保卫团任内被绥远都统蔡成勋杀害），侯斌成（一九二二年在莎县保卫团总任内被绥远都统马福祥杀害）和刘会文（一九二八年在绥包警备第一师长任内被绥远都统汲金纯杀害）而外，还有本村的于效仁（曾编过莎拉齐县志）、刘昆（曾任莎拉齐县建设科长，参议会副议长，为国民党空军军官刘承秀之父）、忽拉格气村的陈志仁（曾任绥远民众教育馆馆长）、善岱镇的张国宝（曾任绥远工业学校校长）、喇嘛营子的张元文（曾任绥远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社长）、双龙镇的侯璠（美国康那尔大学教育博士）、祝乐沁的韩国良（曾任解放后的托县师范副校长）、五甲桥的张巨礼（北京高等警官学校毕业）、鄂尔圪逊的陈壁（曾任莎拉齐参议会

议长)，以及里素的陈国英、保同河的曲步霄等旧社会的知名人士。其中有的出生于大岱附近，有的是由远道慕名而来。土旗蒙古族学生也有不少拜赵英为师的。赵英先生原对辛亥革命曾寄予很大希望，民国以后看见国事日非，便不主张“学优则仕”，而让门徒们“耕读传家”，并以身教移风易俗；所以他的绝大多数桃李，都担任了小学教员，这些学生受了他倔强性格的熏陶，在社会上起了潜移默化作用，因而解放以前，归莎托三交界处成了贪官污吏不好统治的地方。

一九一三年春末，赵英先生也曾当过几天小官。原来他的同年忻州王建屏，于民国元年被山西督军阎锡山发表为萨拉齐县首任知事，取道河曲前来上任，路经双龙镇时就看望了赵英，并邀请佐理县政，他没有答应。到了第二年春末，阎锡山派打死巡抚陆钟琦的河津人姚以阶为归绥道的禁烟监督，雷厉风行地要铲尽绥远各县的鸦片烟苗，王建屏知道赵英刚正不阿，派出轿车接进县城，让他担任城东的禁烟委员，赵英由于王建屏一顾再请，不好意思推脱，只好答应下来。

头一天在四五个警察前呼后拥下，乘坐轿车到了西老藏营子村。鸦片种户为了让委员对他们的烟苗少铲或者不铲，纷纷贿以银钱，赵英都一一“笑纳”，但到晚间，赵把大家召集起来，赵问：“你们这钱是哪来的？”众人都答是“种地辛苦得来的”。赵英说：“那末给了我，你们的老婆孩子咋活呀？”众人都默然了。赵英把赂款一一退还，并说是“我用这钱就是损德”。可又悄悄地嘱咐大家：“等到割上几刀子再铲除，卖了钱养活家口。不铲，上头不饶知事，你们也对不起我”。种户深受感动，交口称赞他是清官和好

人。

本来按照规定，要在村里住下，撒开人马，进行抽查；这位赵委员，第二天起来，却变成了禁烟宣讲员。他绕开苏波罗盖这些大村，嫌进去村社派人宰猪杀羊招待，索兴沿着大青山东行，流览起沿山的风景。每过一村就把车停下，给村民们重复在西老芷营子所说的那几句话，故当天下午，就进了妥妥岱村。这时突然有个女人大喊：“赵英叔！快回我家喝口水，我娃他爷爷经常念叨您呢！”一看，认得是大岱村邻舍在这里做媳妇的姑娘。他马上跳下轿，和媳妇的公爹啦呱起来，喝了几碗茶水，辞出门来，只见轿车不见警兵，情况使他吃惊；一问车夫，才知道警兵都溜到民舍打闹“外快”去了，一听是半街的鸡飞狗叫声，赵英不禁暗自思忖：“这不就是‘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情景吗？”踌躇再三之后，越想越不是滋味，写了一个向知事请“长假”的条子，交给车伕说：“你拿上向知县领车费去吧，这官我坐不了。”当天连夜跑回大岱，再没出来给公家办事。从此，“赵英日怪，给官不爱”的顺口溜便在方圆百里内传开了。

这个“日怪”人，当他晚年辍教以后，经常利用农闲季节，左手挎着粪筐，右手拿着粪铲，到各村走串书坊学校，因为这些书坊学校的教师，多是他第一代和第二代学生，食宿不成问题。有时也到归绥和包头旅游，主要是到处搜寻各种报张书刊，拿回去贪阅不懈，因此，能针对时事，发表奇谈怪论。他的走串书坊学校无形中兼了归莎托三县劝学所和教育局的义务视察员，他非常注视教员必须备课，遇到疑难，顺便给以解答，他谆谆告诫门徒：“千万不能误人子

弟。”因此，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后来归莎托三县交叉地带，成为绥远正反两方面的人才荟萃之区，这跟在初小时就打下较好的基础很有关系。他的奇谈怪论，都是有的放矢，因敢说人不敢说，而且有些属于先知者的预言，不少人便目为“疯话”。

赵英先生最使人认为“日怪”的，是他对门徒们的衡量标准。凡是耕读自持者颂之，大富大贵者嗤之；胡作非为和纵兵殃民者还用形象的语言讥之。例如包头的卜兆瑞于一九二八年出任绥远省会公安局长时，他的学生陈壁也当了归绥旧城小召一带的公安二分局局长，警察在街上随便殴打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找到二分局去见陈壁，门岗当然要阻问盘查，他就借机大喊“陈壁看狗来，你的白脖颈（当时警察的黑军帽上有一道白箍）狗咬我呢”。陈壁只好亲自出来迎接，无可奈何地说：“您老又疯啦”。里素村大地主陈恭，是赵英先生的亲妹夫，由于大儿子陈国英当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二儿子陈国珍当了归绥市党部委员，为了表示门庭显赫，经过二年施工，盖起了一处特大的砖瓦庄院，真是雕梁画栋，冠绝一方，一天他去到里素探望妹妹，不知道外甥中的哪一个“麻烦”（陈国英在家里种地的三个弟弟，乳名叫四、五、六麻烦）问他：“大舅，您看这房盖的如何？”他顺口回答：“房充公、人枪崩，人死财散。”在他看来，庶民百姓的房院不能过凶，物极必反，不该如此举动。远在二十年前，就预料到陈家在解放后的结局。还有喇嘛营子的张大霖，是莎拉齐县五区的恶霸地主，建有炮台和养有家兵，自从弟弟张元文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当了绥远国民党《民国日报》社的社长，居然在大门上油漆出：“文启塞北、武贯绥西”

的对联，赵英先生看见非常生气，他指责张大霖是“村夫无知，好大口气”，并去信骂张元文“瞎而忽视，假装不知。”

一九二八年，赵半吊子（赵青山）匪伙，蹂躏绥远大部，都督李培基不敢派兵进剿，听任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次年，归莎托三县交界地区又有特大灾荒，他的家乡大岱村更不例外，第三年算是丰收啦，但政府却规定除了逃亡户外，连同上年所欠公粮也要限期比交。这样一来，谁能交得起田赋！村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马上跑到善岱区公所将赵英先生告下，理由是“他不交，别人都跟着效尤。”区长立即传讯这位“日怪”人，问他“你怎么不交官粮？”他说：“回禀区长大人，我的粮都被赵半吊子刁走了，拿啥交呀。”区长听后，威胁他说：“村长把你告下了，只好把你扣起来。”这一下可把赵英先生惹恼了，随口顶撞说：“村长早把赵半吊子告下了，你怎么不给扣起来？”区长无言以对，只好把他放走了，限期比追的命令，随之废弛，也就是赵英用“铁肩担道义”的臂膊，给莎县五区的农民顶住压下来的杠子。

赵英先生卒于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享年七十八岁，他经历了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三个反动统治时期，给西部土默川留下了好多值得记录和收集的语言。这些语言，其实都是民谣，很有文字表达艺术，有其独特风格和手法，往往一句两句，最多四句不等，写时信手拈来，说时脱口而出，不受韵律约束，不为平仄限制，但却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俗易懂、妇孺皆晓，针砭时弊，有感而发，非常尖锐辛辣，特别生动形象。例如“大都督嫌钱少，二都督嫌官小，遍地尽官，刁人不管”。这把满



清政府推倒以后，各省纷纷独立，土匪到处横行的民国初年政治局面，描绘的多么淋漓尽致。又如“把儿头刁入十几村，总统刁人十几省”。这是袁世凯称帝失败垮台以后，他把民国总统和当地土匪等量齐观，而又以大巫小巫比拟，怒斥袁世凯是个特大土匪头子。仅仅十四个字，就概括了他们的共同本质，听来真令人叫绝和拍案惊奇。再如“黄陂（指出生湖北黄陂县的黎元洪）段执政（段祺瑞），祸国又殃民，曹锟吴佩孚，越发是灰人”。这与“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成东西”的名联，除了文字技巧外，岂非异曲同工！

赵英先生没有接触过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当然不可能懂得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症结所在，可是他根据自己亲身体会的结果，发现地主老财之所以成为地主老财的奥密是“日灵、独吞、黑心、不亲”。八个字就揭穿了地主老财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不择手段、六亲不认的发财之道。“日灵”是内蒙西部的方言，指投机取巧的尖头而言，发音为“Rēling”与“独吞”、“黑心”、“不亲”，双字合辙押韵，是在语言的海洋中最难捕捉到和提炼出来的字句。由此可见，赵英先生不愧为奇士加才子。

一九二六年，国民军从察绥撤退时，将近一百枝枪被包莎和达拉特旗的土匪掳走。一九二七年奉军赶走晋军，把所有土匪都编入绥西镇守使满泰和绥西护路司令王英的三十军和三十一军里边。一九二八年雨量稀少，为一九二九年大旱预示出先兆。这一年春天，双龙镇的黄河岸上，发现一个很大的青蛙，特别是莎拉齐县城，灰老鼠和黄老鼠打了一黑夜仗，第二天死了一城壕（此事见《绥远通志》灾异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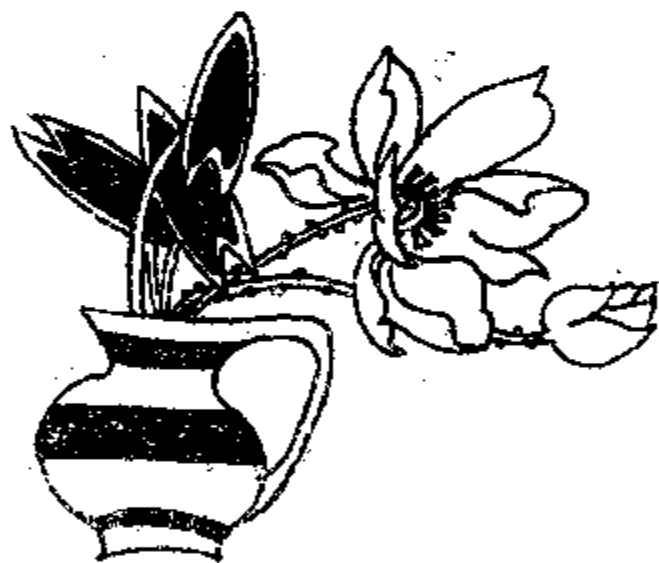
和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很快就在归、莎、包、托、和、清六县到处传出“斗大的蛤蟆十八斤，一有云彩就刮风，先死耗子后死兵，死了满泰死王英”的民谣，这一民谣就是赵英先生所编的。斗大的蛤蟆系指疥蛤蟆成精，引起了天公震怒久旱不雨，对满泰、王英的纵兵殃民，更直接发出谴责和诅咒。故此一民谣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且富有神话色彩，可谓之绥远的新乐府和内蒙西部的近代史诗。

赵英先生在七十岁以前，还能象闲云野鹤那样，到处游转和逢人就说。他看见马福祥担任绥远都督以后，仿照山西在绥远改革村制，把甲头取消，改为村正村副，将苏雨生和赵有禄的土匪，收编为“西军”的骑兵营，所编的“甲头改村正，捣鬼不用问，把儿头编营长，刁人不隔行”一一非只流传于土默川，而且流传于绥东五县和雁北十三县。他七十岁以后，两眼迷离，身体衰老，已经不能到外边走动，可是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代表老百姓在大岱村里发言。一九三七年秋天，阎锡山把傅作义和王靖国的队伍，调回山西防守太原，国民党的其他部队，都是不加抵抗而闻风逃跑，他很气愤地说过“养兵养将多少年，日本一来不见面”。特别是一九三九年秋天，他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大青山的队伍，艰苦奋斗和英勇善战，纪律特别良好，真是秋毫无犯的王者之师，感到有了这样的人民子弟兵，中国就不会灭亡，所以在临死的时候就对侵略者指出他们是“越胜越坏，终久失败”。

经过时代的考验和历史的证明，土默川中部的蒙汉老乡，都认为“老赵英所说的话大部分都应啦”。这是人民对他的公正评价。可是过去的所有反动统治者，都是妄自尊

大，目空一切的蠢猪，他们连“要知朝中事，深山问野人”的常识也没有，当然不会也不可能访求民间隐逸之士，以致赵英先生只能潦倒以终，“老死于糟枋之间，不以千里称焉”。

土默川不仅是诗歌之乡，也是语言最丰富而幽默诙谐的地方，在极左路线干扰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拦住好些人“灰说溜道”，为了实行改革和实现四化，我们要加强采风工作，因为在四六句的窜话中，有不少名言和说论。这就是我给赵英先生树碑立传的居心用意所在。



# 技艺出众，传帮育人

记我的老师——赵四

温 万

著名的二人台琴师、我的老师赵四逝世已二十三年了。他温和的笑貌、精湛的技艺、忠厚的品德以及高尚的艺德，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使我不能忘怀。尤其是他对艺术精益求精并毫无保留地认真传授给后人的精神，时时激励着我，促使我对艺术进行不断地探索，要像他那样搞好教学工作。

赵四一九〇一年出生在山西河曲卢争堡一个汉族贫农家庭。父亲虽然懂得一些医道，能治疗一般的病症，但赚不了钱，家中生活艰难，只供他念了两冬天书，便无力再供。仅仅八岁的赵四就开始给人放牛、放羊、打短工做零工，藉以糊口，减轻他父亲的负担。

年纪稍大了些，父亲教赵四扎针治病。此后，他就一边揽零活，一边给人治病。但零活不常有，治病也赚不下钱，当生活维持不下时，又不得不行乞要饭。夏天穿件破单衫，冬天穿件烂皮袄，沿村讨要。他在后套讨饭，曾被狗将右腿咬伤，从此留下残疾，走路略有颠簸。

赵四从小喜爱二人台，在河套一带打零工时，结识了老艺人秦五毛眼。秦五毛眼在哪里演出，他便跟到哪里。秦五毛眼在场上演唱，他在场周潜心摹仿。在他的再三请求下，

秦五毛眼收下他，平时教他唱作，有时也让他配合演出。他进步很快，逐渐便为秦五毛眼所器重，成为能够胜任的业余配角演员。

赵四爱唱二人台，更爱耍乐器，尤其喜欢吹“枚”<sup>①</sup>。为了学习吹枚，不论是揽工、休息，也不顾严冬酷暑，他总是手操着枚，勤学苦练，不辞辛劳，孜孜不倦。听说老艺人瞎满贵（土右旗沙尔沁人）吹得好，他就找到瞎满贵，向瞎满贵学，又听说瞎鲁三（土右旗五卜树人）吹得好，便找到瞎鲁三，向瞎鲁三学。以后又找有名气的月明子（伊盟人）、二牛（包头人）等人学。他博采众长补己之短，不论曲调大小、长短，凡是他不会的，就主动地找众艺人请教。他曾和月明子学了《三套十里洞》等乐曲，听了二牛的演奏便仔细模仿二牛吹的音色，直到完全掌握吹奏技巧而后止。牌子曲《白花》，只有地主赵宏能演奏，为了学到手，赵四给赵宏白割了一秋天庄禾，这才从赵宏那里学到这首牌曲。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几年，到四十年代初，他的枚就相当有名气了。他演奏时筒音气满、声音浑厚、高亢明朗、凝炼有力、旋律多变而又悦耳。有时能用枚吹出像管子的声音。他对每支乐曲记得很熟，熟便生巧。不论是演出伴奏还是演奏牌子曲，在处理技巧花彩等方面都非常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的“即兴演奏”听起来和谐、华丽而又丰满，令人感到妙不可言，达到了自然配合乐器的效果。二人台民间艺人演奏，一般均无乐谱，赵四也不识谱，但掌握得很好。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他以枚做示范演奏《三国调》、《尼姑思凡》等曲调，运用了各种滑音、颤音、舌花、吐音及飞指等

<sup>①</sup>注：枚，方言，即二人台笛子。

技巧，把曲子奏得灵活多变，与众不同。他那饱满的情绪、浓郁的风格、激昂的气质、丰富多变的技巧，引起人们不断的喝彩。据一些老艺人说，当年他们的班子每到一个地方打开场子后，赵四的枚一吹起来，立刻惊动四邻，满村就翻腾起来了，邻村的人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围个水泄不通。听了又听看了还看。久而久之，他吹枚的本事出众，技压一方，群众和艺人们尊称他为“神枚”赵四。

解放前，赵四先后在后套、土右、土左、呼市一带搭班献艺。一九四九年呼和浩特市回到人民手中，赵四参加了呼市民艺剧社。旧社会长年流浪奔波的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年近五十便体质孱弱，气力衰退，牙齿也开始脱落，不能吹枚了，于是操起了四胡（又称四弦），有时还弹三弦、打扬琴。能在乐队里转一圈，而且唱、念、说也都精通，显示出他的多才多艺。

解放初期，艺人们刚组织剧团，条件很差，生活较苦，但不再受人欺负，心里舒坦。这些热爱家乡，热爱二人台的艺术老前辈克服一切困难为城乡人民群众演出。一九五三年，赵四参加了内蒙古前进实验剧团，一九五六年改为呼市民间歌剧院一团。这期间他一直主奏四胡。一九五五年，我正式拜赵四为师，从此我们结下了父子般的师徒关系。赵老师教我二人台传统音乐——四胡演奏技巧，我帮他学文化、识简谱、录曲子、校对乐谱，他像慈父一样地在思想上、业务上、生活上关心爱护我们这些解放后的第一代接班人。

一九五一年他参加了教育工会，一九五二年参加了绥远省会演，被选为出席全国文艺会演代表。一九五三年参加了全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并灌制了不少二人台唱片，有

《打金钱》、《走西口》、《尼姑思凡》、《打秋千》及牌子曲《八板》、《推碌碡》、《柳青娘》、《西江月》等十余首。一九五五年参加内蒙会演获得荣誉奖，一九五六年参加了全国民间音乐周，一九五七年内蒙戏曲会演获得二等奖及艺人座谈会荣誉奖。并荣获呼市文化局“挖掘戏剧遗产，培养二代演员奖”，同年参加了呼市政协会议。一九五九年参加了全国百万民歌展览演出。

赵四老师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历年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心于党的工作。一九五八年他让我代笔写了“五年规划”，此后，即按所订规划，严格要求自己，政治方面，坚持听党课，以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为了加快前进步伐，他经常征求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缺点。在教学方面，他更是勤勤恳恳，毫无保留地主动授徒。他要求自己在五年后，即让徒弟四胡演奏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抽业余时间将自己所会的东西掏腾出来，整理成乐谱传给二代。文化方面，多写多练多问人，进步也很快。

一九五八年呼市民间歌剧团首次赴首都北京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汇报演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及李济深、黄炎培等中央首长亲临国务院礼堂观看了演出。演出后，接见全体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这次汇报演出，乌兰夫、田汉、老舍等都亲笔题了词。一天，苏联交响乐团访华团在天桥剧场演出。演出前，在后台专门观赏了赵四及张埃宾、周智家等人演奏的二人台牌曲，他们的精彩表演，博得了交响乐团演奏家的热烈赞赏，他们个个举起乐器手舞足蹈，有的甚至用小提琴弓子敲击琴的背面，从这一生动场面，可以看出他们被乐曲所感染，达到相当高的程度。通过这次

演奏，赵四等老艺人们为祖国的民间音乐，争得了光彩。

一九五九年因年迈体弱，随团不便，他和刘银威、班玉莲等一同调内蒙古艺校任教。他主教二人台音乐特别是四胡的演奏技艺，任教仅二年多，由于精心施教，培养出不少成绩较好的学生。一九六一年因患脑溢血，病故于呼市。终年五十八岁。他生前无儿无女，遗体安葬在呼市大黑河公墓。师娘杨桃女在他死后不久也病故了。

赵四老师在艺术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艺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赵老师对待艺术从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平时他不论唱念曲调或排演伴奏，只要感到有一点儿音调不准或尺寸（即节拍）含糊、不对的地方，总要弄清错误所在，及时改正。有时为了一个曲调的过门儿或一个乐句的长短，经常和其他艺人反复唱念，有时也辩论的面红耳赤。他不论唱念曲调，还是演奏乐谱，不管在什么场合，总是姿势端正，并且从不说话，全神贯注，绝不马虎敷衍，也不出噱头。只要他一操起四胡，就象战士上了战场，两眼紧盯着演员的做表动作；两耳细听着演员的念白唱腔，认真地演奏。“要给演员伴奏好”是他一生遵循的职业道德。他给演员吊唱或排演，不论是否名角，都一视同仁，从来不三等两样，更不作弄演员。即使有时情绪不正常，也绝不带到台上。真可谓演出当战场，一台无二戏啊！他就是这样满腔赤诚，孜孜不倦地从事二人台演奏生涯。数年如一日，年复又一年。

第二，伴奏中摸清演员，“伴”字当头。

赵老师经常对我们讲：“一个戏曲乐队拉弦的演奏员，首先要了解剧情，了解每个演员的艺术修养，摸清演员的表



演技能和唱念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和演员配合好。在演戏伴奏中要‘伴’字当头，不要突出自己，自我显露。演奏时，要按照剧中人物感情的变化，分出喜、怒、悲、伤，或轻或重或快或慢。”他常用《走西口》一戏音乐为例，说：“该剧一开场，孙玉莲独坐家中，突然听到太春叫门，马上去开门，唱道：‘听见哥哥叫一声，倒叫玉莲喜在心……’这时的演奏，要加快速度；多用分弓、顿音，以烘托欢快、喜悦的心情。后面当太春要迈步出门走西口，玉莲再也按捺不住悲痛的心情，放声大哭，这段哭板亮调到慢板，要大弓大尺地演奏，必要的长音可用打弦和颤弓演奏。以表达夫妻二人难舍难离的悲凄情绪。”赵老师演奏这段时，音量饱满，扣弦扎实，有刚有柔，独具一格。当他演奏到“止不住伤心的泪‘蛋蛋’”时，用上下滑指加连顿弓法的即兴演奏，默契地配合了演员哭泣般的吸气声，接唱“一道一道往下流”的“流”字时，四胡又用了下滑指加颤弓子的特殊演奏处理。（见附乐谱）。

（二人台） 《走西口》 （摘句）

1 =  $\flat$ B 4 \ 4 （6—2） （悲慢地）

唱腔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6.1}}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323}} \mid \underline{\underline{i6i}}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36}} \underline{\underline{53}} \mid \underline{\underline{232}} \underline{\underline{i2}} \underline{\underline{32i}} \underline{\underline{6i23}} \end{array} \right]$
四胡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6.1}} \underline{\underline{2i2}} \underline{\underline{323}} \mid \underline{\underline{i6i}} \underline{\underline{2i2}} \underline{\underline{336}} \underline{\underline{5653}} \mid \underline{\underline{232}} \underline{\underline{i6i2}} \underline{\underline{32i}} \underline{\underline{6i26}} \end{array} \right]$

唱腔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1} \underline{5} \cdot (\underline{5}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3}) \mid \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0} \underline{5}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6}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1} \\ \text{蛋 蛋 蛋 蛋 蛋 蛋} \quad \text{—道 —道 —道} \quad \text{住 下} \end{array} \right]$
四胡 (串把)	

唱腔	$\left[ \begin{array}{l} \underline{1} \underline{2} - -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3}) \mid \\ \text{. . .} \end{array} \right]$	(后略)	(温万记谱)
四胡			

注：唱腔中“V”号为演员哭泣吸气声

由于乐队的演奏和演员的表演融为一体，增强了戏剧演出的感染力和演出效果。他还教导我们，观众看戏主要是看演员的表演，听演员的唱腔和道白。乐队是配合演员的，不要喧宾夺主。当乐队单独耍丝弦奏牌子曲，进行乐队间的观摩时，那是听我们看我们的，便可拿出全身本事，尽量发挥所长，奏出水平。他还说：“为老演员伴奏时，可适当“花梢”（即丰满）点，为青年演员尤其是小学员伴奏时，特别要注意，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掌握。其一，首先要让演员能找到唱腔入嘴处；过门儿的演奏，定要明显清楚，二人台“底锤子”（即小过门儿）要归“窝子”（见下‘V’号处），如宫调式曲

$\dot{1} \cdot (\underline{2} \underline{3} \mid \dot{1} \cdot \underline{2} \dot{1} \dot{1}) \mid$ 或 $\dot{1}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2} \underline{3} \mid \dot{1} \cdot \underline{2} \dot{1} \dot{1} \mid \mid$ ;	商调式曲
$\dot{2} \cdot (\underline{3} \underline{5} \mid \dot{2} \cdot \underline{3} \dot{2} \dot{2}) \mid$ 或 $\dot{2}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4}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6} \underline{1} \mid \dot{2} \cdot \underline{3} \dot{2} \dot{2} \mid \mid$ ;	征调式曲
$\dot{5} \cdot (\underline{1} \underline{7} \mid \dot{5} \cdot \underline{6} \dot{5} \dot{5}) \mid$ 或 $\dot{5} \underline{6} \underline{1} \underline{7}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2} \underline{3} \mid \dot{5} \cdot \underline{6} \dot{5} \dot{5} \mid \mid$ ;	羽调式曲
$\dot{6} \cdot (\underline{1} \underline{7} \mid \dot{6} \cdot \underline{7} \dot{6} \dot{6}) \mid$ 或 $\dot{6}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3} \underline{7}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3} \mid \dot{6} \cdot \underline{7} \dot{6} \dot{6} \mid \mid$ ;	等。其二，乐

队伴奏是为演出服务，为表现剧情服务，为烘托气氛，渲染人

物，要给演员托好唱腔，节奏做到不拖不抢，相对的准确。使演员能唱出感情。其三，演出中一定要听从“梆、板”（即指梆子、鼓板）或无声手式指挥，不可各行其事。耳要听，眼要看，脑子要快。一旦台上演员唱错了，或发生了特殊情况，也要想法子跟上去。他常说：“救场如救火！”登上舞台即不能和任何人赌气，若争高低，那就错了，一旦搞乱，便难挽回。台上没配合好或是发生了事故，下来之后共同研究，找出原因，乐队错了要虚心听取意见，演员错了要诚恳告给，以便总结提高。赵四认真做到了为演员着想，为演员服务，因而得到剧团很多演员的称赞，说：“四大爷伴奏拉四胡，我们可好唱了！”可是当他和我们演奏传统牌子曲时，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他对每首乐曲都很熟练，在演奏中又充分发挥他的技能。尤其在“串把”、“还把”及各种勤、懒、花弓法的运用上，都有独到之处。他演奏的乐曲节奏稳准，乐句清晰，旋律流畅，有力清脆，强弱分明。节奏强烈时，如万马奔腾，气势雄伟；奏到细腻处，娓娓动听。更其可贵的是在原有基础上，多有创新。凡听过赵四演奏的人，都说他拉的四胡“整顿、排场，水平高！”五十年代内蒙古前进实验剧团及呼市歌剧一团所灌制的二人台唱片中的四胡，都是他演奏的。

第三，教学上传帮授艺，毫不保守。

赵四掌握的二人台曲调很多，不论山西、内蒙汉族民歌及蒙古民歌、爬山调，甚至连僧人道家音乐也学了不少。艺人们都认为他“肚里宽套”（即学记得东西多而准确）。他学的曲调不但多而且比较扎实。有不少人称赞他是二人台音乐的“活字典”。平时，同辈艺人，青年人或小学员，遇到

不会，不清楚的曲调、牌子曲，只要找他，赵四总是热情而耐心地教给，直到学会。从没摆过架子更不保守。教罢又笑嘻嘻地说着他那句顺口流：“我是说到哪，做到哪，毫不保留育新花”，逗得人们心花怒放至满意而去。赵老师对我们小青年不单传艺，就连衣食住行也都很关心。尤其对我更是爱徒如爱子。为让我们学会一个曲调，他有时带病教唱，一遍又一遍，唱念得气喘咳嗽时，就喝上一口茶，缓上气来，接着再教唱，直到教会或记录下乐谱为止，从来不顾自己的疲劳。为让我们尽快学会所有传统唱腔、牌子曲和器乐演奏技巧，他经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有时就连开戏前，散戏后的一会儿闲暇时间也要为我们教唱或做示范演奏。要不就手把手地教。那时剧团一天演两场戏是经常的事。当时他可能感到自己身体差劲了，恨不得一下就把他所会的东西，全部教给我们。可惜当时我们才十几岁，没有理解到他老人家让我们快学、快记、快接班的急切心情。他曾对我说：“万子啊！只要你有把握能拉的戏，你就大胆地拿起四胡到前面拉去！师傅给你在后面壮胆的。”（“前面”指文场三大件的座位，“后面”指三大件后面的其它乐器座位）。这些发自肺腑的慈父般的语言，是多么温暖而又令我终生难忘啊！我当时除学四胡外，还学二胡，演出中不拉四胡就拉二胡。赵老师想让我们青年人多学习多实践，快掌握，快接班。有一次剧团在太原，由刘银威和刘全演《打金钱》，我们师兄弟三人操奏“三大件”，即张存喜吹枚，王恒荣打扬琴，我拉四胡。当演奏到快板转捏子板，演员舞起霸王鞭时，乐队节奏突然和演员不合拍了，刘银威马上回过头向乐队硬唱了一句，才又合上了拍子，幸亏没乱了。戏后赵老师主动找演员

表示歉意，请谅解。又一次顾晓青演《尼姑思凡》，张埃宾老师吹枚，周智家老师打扬琴，我拉四胡，因我第一次用四胡伴奏这个戏，不够熟练。上台一慌，有一处串把演奏没和演员配合好，虽没乱了场，但影响了演员唱表情绪。戏后演员在后台有点儿情绪，我心里也不安。赵老师见此情景，又主动地把责任承担起来，分别给演员和我做耐心的工作。怕我以后胆怯，便鼓励我说：“出错是常有的事，今后要用心记。平时要多拉多熟练，熟了才能生巧，做到上台不慌不乱。出一壘，长一智嘛！……”从此更加鼓励我勤学苦练，掌握技巧并提高信心和勇气。

第四，做到老，学到老，前进不止。

赵老师演奏的二人台枚和四胡，得到人们普遍的赞赏，他（拉四胡）和张埃宾（吹枚）、周智家（打扬琴）、刘银威、刘拉拉（弹三弦）等合奏所灌制的二人台小戏及牌子曲唱片，至今仍流传全国。当时人们想再听听他吹枚，他吹奏了几首曲子，虽然年老力衰，但锐气风姿仍在，博得满堂喝彩。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未录下他吹枚的音响资料。老艺人常来彪曾跟他学过一段吹枚，未等继承下来就分手了。现在留给我们的录音资料，只有四胡，至于他超群的吹枚技艺水平，仅能从老艺人们的口述中领略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戏曲改革的要求，新的乐曲不断增加，乐队必须视谱演奏，这对赵四来说，是个新的课题。为了适应这一新的需要，他不顾一天的疲劳，抓紧一切时间学文化、练写字、学简谱，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掌握了视谱演奏的能力。此外，他为将自己所会的二人台曲调，全部挖掘出来，传给后人，让我们和他录谱、整理、校对他那些可贵

的资料。他为现有的二人台音乐资料的出版，曾做了很多工作，那些宝贵资料中，都浸透着他老人家的心血和汗水。但那些出版的书中，很少列明他的名字。

在排练新剧目时，赵老师生怕自己落了后，影响整个儿排练进度，他总是先走一步。一有空便一个人坐着小板凳，配戴老花镜，手操着四胡，坐在乐队共同用的一个木制、手绞的大谱架前，边视唱边演奏，一遍又一遍，一个音符也不差地练习。直到奏对、奏好，他才放过。因此不论乐队集体合奏还是排演伴奏，他演奏的四胡几乎没有挡过道，出错那就更少了。

当时剧团艺人中，赵四年纪最大，但他热爱二人台的事业心最强，他虽盛名昭著，但从居功，也不止步，坚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因此剧团不论演大中小戏，也不论音乐如何改革创新，他总是知难而上，首先自己学习，然后带动我们青年人一道，共同圆满地完成了一场又一场，一年又一年的巡回演出任务。为内蒙古民间艺术在国内争得了荣誉，扩大了影响，播下了种子。今天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些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啊！

赵四老师为继承、发展二人台艺术，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是勤奋创业的一生，他和许多老艺人一样，是党和政府把他们从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中拯救了出来，正象他说过的：“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爱护，二人台事业就不会有今天啊！”这是出自肺腑的语言，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一生就是“说到哪，做到哪。”言行一致，传帮为乐。为二人台艺术事业，为培养接班人，贡献了自己全部心血。

因对赵四老师情况了解有限，不妥处，望同事们补充。

## 呼市民间艺术家——周根心

胡淑贞

周根心师傅是呼市较有名气的木工、画工，在呼市歌剧团制作布景以及参与修葺名胜古迹中，做出贡献，深为艺术界人士所称道。

周根心老师傅今年七十六岁，一九〇九年出生在土默特旗塔布子乡北园子村。全家有父亲、母亲、叔父、哥哥和他共五口人。父亲叫周赵子，给地主田万寿当长工，叔父也是个当长工的受苦汉，哥哥比他大五岁，从小就当小长工，周师傅从七岁起，就背上粪筐整天拣柴拾粪帮助家里打搅烧柴糊口度日。不料九岁时父亲去世，叔父把几间土房踢蹴光后也流落他乡，只剩下老母亲和兄弟俩，糊糊拌汤地打发日子。十二岁他和哥哥一块儿给地主老财放牛，过了两三年搬家到南台基村，伴种祁万年的地。每年分得的粮食还不够糊口，日子仍过不下去。祁万年是个木工，在呼市旧城巧尔齐召开设木匠铺，是远近闻名的全手匠人。市内清真寺望月楼、观音庙、孤魂庙等古建筑的修葺工程，都有祁师傅参与。周根心十七岁那年，改学木工给祁师傅当了徒工。旧社会的学徒，实际上是给师傅提茶壶、倒夜壶，吃饭没工钱的小杂役，这样磨练两三年后，才开始学手艺。开始学徒时，师傅给他安排了做饭的营生。他是个有心人，一边做饭，一边暗暗留心，不等传授便用心学艺。在祁师傅的十二、三个徒弟

中，正式过门徒弟只有六、七个，而周根心是其中学的最快最好的一个。因此，得到祁师傅的赏识，不再让他做饭，提前指点他干活。三年后，无论做木工还是动刀工搞木刻，他都能够独当一面，又还学会划玻璃。当时，祁木匠铺所揽的活儿，杠房铺花轿一类的刀工营生居多，周根心便成了祁师傅的得力助手。又过了几年，一家杠房铺的掌柜看见周根心年轻力壮、心灵手巧、为人老实可靠，就把妻妹许配给他，二十三岁结了婚。他虽然手艺好，可是在那黑暗的旧社会，手艺人的工钱相当低微，不得不经常接受亲友的资助。

婚后第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归绥市（呼和浩特旧称）。周根心不愿受日本鬼子的气，搬到郊区双树村岳母家。在那里租了一间土房，带了三个徒弟做起了木工活。虽然，一年四季东跑西颠，四处奔波，不仅忙于铺内活计，还得外出揽活要帐，但生活仍然过得十分艰难。爱人有了病，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而死去，未满周岁的孩子也相继夭亡，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被拆散了。当时周师傅心情的苦闷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生活无着落，于是就背上工具走村串户，过着半流浪的生活，直到又成了家，才算结束了这没着没落的日子。但真正使他的生活稳定下来，艺术生涯纳入正式渠道，还是在解放以后，参加了呼市民间歌剧团，专搞舞台布景艺术，成了一位布景设计的老师傅，才得以实现。

### 一、学文化、学画画着了迷，初有所获

周根心师傅是怎样爱上画画、雕刻直到专搞舞台布景设计的艺术生涯的呢？



当他十来岁还拣柴拾粪、撵牛放马时，就经常到南台基小学的门口探望，学校里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地吸引着他。有一位农村教师名叫刘补小，看他经常恋恋不舍地在校门口徘徊，就对他说：你来学校念书吧，不要钱。可是，家无隔日粮的周根心，那能进学校念书呢？他只能含着眼泪谢绝了老师的美意，可那位刘老师见他既聪明又伶俐，当他再次走到校门口时，把他叫过一旁，教了他几个字，隔两天考问他竟都记住了。以后每当他过校门口，便教他认一次，而每次教的字他都能记住。刘老师试着加快进度，教的字多了也能记住，在这位老师谆谆教诲下，他不仅把学会的字认识、会写，而且还会用。这个校外课堂就成了周根心学文化的基地，虽然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却认了不少的字，这段学习生涯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

周根心热衷于学文化，而最感兴趣的还是画画。见什么画什么。他多次到村北大庙照着画泥胎佛像。要能赶上村里唱戏，更是他喜出望外地学画机会。演员的一举一动、衣着穿戴，都是他效仿画画的模特儿。一天的劳动结束后，他就用树枝、草棍儿在土地上画起画儿来，回到家里还在土炕围墙上画。他母亲发现墙上被画的乱七八糟，用刷子洗刷掉，他从中又得到了启发，从此以后，每当他画完之后，也同样用刷子刷掉，以便再画。他越画越感兴趣，越感兴趣就越要画，一天不画就象丢掉了什么似的，简直象着了迷。有一次在村头街上，又画起大庙里的神像来，直画得把拣柴拾粪的事忘了。晌午，母亲挑回来一筐苦菜，而他却呆呆地站在门口，粪筐里是空的。母亲一看连做晌午饭的柴火都没有，伤心地哭了，他赶快提起筐子出去拣柴，直到半后晌才算吃了

一顿糜子面拌苦菜汤。每当他想起来这件事，眼睛里总是湿呼呼的。他画画的工具，开始只有树枝棍棍、木头棒棒、高粱杆杆、玉米棒棒等，后来，还是那位好心的刘老师把学生们的铅笔头以及用废的纸本等，送给他用来学画，他高兴极了，用感激的眼神望着那位老师，对老师唯一能够报答的，只能是一张他那天真而稚嫩的笑脸。

他对每一个能画画的机会从不轻易放过。除了庙上的泥胎塑像和过时过节戏台上演员扮演的人物的穿戴及动作外，更能吸引他的还是年画。年画所绘的山水人物，真是丰富多彩，使他开阔了视野，吸收了更多的新鲜题材。他盼望着过年，但他的兴趣与别的孩子不同，别人家孩子是盼穿新衣戴新帽，吃好的放鞭炮，他所盼的却是能够欣赏到大量的年画。他把仅有的几个钱，拿出来买年画，贴在墙上尽情地看啊、画啊、学啊。单靠自己毕竟只能买几张，因此，对邻居、婶子大娘家的年画，他从不放过欣赏的机会。就这样，他不顾艰难，苦心学画，终于初步掌握了画画的技巧。

## 二、铁杆磨绣针，功到自然成

周根心师傅的木工技艺，是向很有名气的祁万年师傅学得。在一位名师之下学艺，对于酷爱艺术的周根心来说，宛如鱼入大海，旱逢甘霖。他时时用心，处处留意，细心地向师傅和师兄们学习刀工活。由于他有画画的基础，加之心灵手巧，细心钻研，在祁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学会画底样，给别人临帖。两三年后，对山水、花草、鸟兽、人物、风景等的绘画都能够运用自如了，特别是在玻璃上画什么〈二十四贤孝〉、〈上、下八洞神仙〉、

〈十殿阎罗〉等人物画，需要反画，这样，才能从玻璃的另一面现出正面的图象，但他仍得心应手，画来毫不走样。在这期间，周根心师傅还投过一位由山西文水县来的张姓师傅学习画工手艺。有一句格言：“学海无涯苦作舟，书山有路勤为径”。经过苦学勤学，到二十三岁左右，他已经能够自己打底配色、描样，成为一位木工雕刻、画画的年轻师傅。一九三八年，周根心师傅吸收李喜珠、魏贵宝、宁小四三个小徒弟，在双树村办起的木工房，由于做工细致，没有多久，便在当时的归绥市城内外，有些名气了。

周师傅在做木工活后，仍下功夫学习文化，他一边干活，一边学习。看小说是他学文化的主要方式。如《说唐》、《儿女英雄传》、《五百罗汉》、《说岳全传》、《封神演义》等，由于他识字不多，阅读中既有“拦路羊”，也有“拦路虎”，但他没有遇难而止，而是向文化高的人请教，坚持读下去。后来又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古今小说选》等，在这些小说里，描写人们的举止、服饰、性格等，都为他所留意，尤其是书上的许多插图，有古代人物，有亭台楼阁等，他便对照这些插图，学习描画，不达熟练程度，绝不停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坚持描摹，终于使周根心熟练地掌握了古代山水人物、亭台楼阁的画法。当人们和他谈起他苦学苦练的经验时，他说：“只要爱就不怕学不会，只要肯钻就不怕学不到手”。

### 三、舞台艺术生涯，如虎添翼

周根心师傅经历了半生的艰难困苦，终于迎了解放。

一九五三年呼市民间歌剧团成立，具有木工、雕刻、画工技术的周根心师傅，被吸收参加搞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对他这样一位酷爱艺术追求艺术的人来说，既是工作，也可以说又是进一步提高艺术水平的阶梯。也只有在这一个环境中，才使他的后三十年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显示出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卓越才华，从而取得了舞台美术创作上的成就。

呼市民间歌剧团，主要演出地方戏——二人台，这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之一，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个剧团常年活跃在呼市城郊，为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演出，丰富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同时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他们曾多次赴北京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又先后赴朝鲜以及祖国的大江南北、青藏高原、大兴安岭作慰问演出，为朝鲜人民及祖国南方、北方、东北、西北、西南边陲人民献歌献舞，受到了国际及国内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起到了文艺使者的作用。周根心师傅经历了东西南北的奔波，学到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对他的舞美工作得到更多的启迪，使他在艺术上有了更深的造诣。一九五八年，呼市民间歌剧团赴京演出时，曾受到敬爱的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在京期间，乌兰夫、杨植霖、苏谦益、奎璧等领导同志，同剧团全体成员游览了颐和园。首都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田汉、老舍、吕骥等同志，观看了演出，还为他们题词留念。所有这些，都予以从事二人台工作的同志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周根心师傅也荣幸地参加了演出，尤其受到了鼓舞。

五十年代初改编的第一批传统剧目，如《打樱桃》、《尼姑思凡》、《走西口》、《打金钱》等，大约五十多个。在舞台设备、布景设置上，都比较简单粗糙，仅仅是挂一块紫色的布幕，摆一张八仙桌，台口上挂两盏汽灯，根本没有什么舞台美术。继续创作的，如《金钗记》、《警锁记》等五十多个，舞台设置上略有增加。后来，移植改编了《陈三与五娘》、《茶瓶计》、《梅玉配》等二十七、八个剧目。还有现代剧目二十四个，如《小二黑结婚》、《小女婿》、《红色种子》、《大破威虎山》等。这些大型古装戏、现代戏的上演，对布景制作、灯光设备等有了新的要求，如何做好舞台美术工作，就摆到重要的位置上了。歌剧团第一代舞台美术工作者——周根心师傅，经过虚心学习，苦心钻研，下功夫反复实践，终于取得了成果。如六十年代期间，由他独立设计的《茶瓶计》、《梅玉配》两个大型古装剧目的布景美术，无论从比例、色彩、感光等方面都是经得起推敲的。《茶瓶计》共十三场，主要内容是描述宋代某官员的夫人嫌贫爱富，对家中遭灾，前来投亲的未过门女婿不但不认，反而捆绑吊打，企图毁婚为女另行选配。而聪明伶俐的丫环春红，出主意、定计谋，以打碎包公赠送的礼物——茶瓶为计，搭救了公子，成全了公子与小姐的婚姻。这个剧中的布景有：达官贵人富丽的庭堂、小姐华丽的绣楼，公子宁静的书房，屋后还有水阁凉亭并以太湖石作陪衬的花园景色，以及青山旷野，花卉树木等。这些布景都是周师傅匠心设计、巧妙制作，异常逼真，因而烘托剧情，获得演出成功。

《梅玉配》这一古装剧，共二十一场。场景有古庙，庙

内有活灵活现的菩萨，有书房，有绣楼，有店铺，有庭堂。这许多场次的布景，都需要一一仔细推敲。周根心师傅钻研剧本，掌握剧情，继而观看演员排练，掌握剧中人物的感情变化，然后思谋着每场演出应达到的效果。根据几方面的心得，设计各场的布景，有的简略，有的复杂，以衬托戏的内容情节，渲染戏的气氛，给观众以真实感和艺术享受。布景制成后又配合本团的董文琇、景柱宝、张文宽等同志在灯光、制景、道具等方面，吸收和借鉴兄弟剧团的先进经验，翻新花样，大胆出新，使歌剧团的舞美艺术出现新的面貌。

《陈三与五娘》也是一出古装戏，周师傅现在保存着五张剧照。这五张剧照还是五十年代拍摄的，而剧照中所摄的布景，显示出周师傅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及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如五娘的家门院墙高大豪华，俨然是达官贵人的府第，显示出贵族人家的富丽堂皇；剧照中所摄的五娘绣楼，从室内外反射的光线，交相辉映，通过舞台展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得到艺术欣赏和美的享受。另外是五娘冲出闺门后的几个外景设计，其中一幅是粗大的古树和幽美的亭台远景，树林中莺歌燕舞，花丛中群芳斗艳，给人以挣脱羁绊，走向光明，心情格外舒畅的感觉。针对戏剧每个主要情节用布景衬托，起到布景为剧目服务，积极配合剧情的衬托作用。这仅是周根心师傅三十年前的一幅普通的佳作而已。可是六十年代期间，他创作的大型古装剧《梅玉配》、《茶瓶计》的众多舞台美术设计作品，都没有留下摄影，又无底稿保存，是布景艺术上的一个损失，实为可惜。从他亲自设计、亲自制、亲手描绘的几百幅布景作品中，可以看出周师傅在运用我国传统技巧的基础上，做到了大胆地尝试

创新，并结合现代科学的明暗透视来表现空间和体积，显示了他美妙和精湛的艺术。

在党的领导下，文化、艺术部门组织参观学习，他曾多次参加。学习兄弟剧团的先进经验，并游览了很多名胜古迹，使他吸收了大量的艺术营养和丰富的精神食粮。无论是首都北京、古都西安、邻省山西、江南的苏、杭，他每次外出游览、参观，身临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并不留恋于山光水色，而强烈吸引他的是那些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古老建筑，那些艺术的精华给他注入了极为丰富的营养，充实了他的艺术知识。特别是我国首都北京，以她那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和风貌，强烈地震撼着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心灵。那红色的宫墙，巍峨的宫殿，描金绘彩的亭台楼阁，参天的古柏和挺拔的白皮松，这一切都闪耀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光芒，散发着古代文化的芳香。一次又一次的参观、学习、欣赏，周根心师傅的眼界大为开阔，提高了艺术水平。

周根心师傅通过到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不仅艺术水平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从心眼里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艺术、热爱新生活。他曾经参观过毛泽东主席的故居，荣幸的受过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这是一个在旧社会出身贫苦的农家放牛娃，从来不敢想的事情。由于他在剧团刻苦勤奋的工作，曾受到过团里的多次奖励。这些都是他在艺术创作道路上不断前进的鼓舞力量。

周师傅曾参观过陕西秦始皇墓的兵马俑，从这些出土文物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在艺术创造上所付出的心血，同时也

揭露了秦王朝对当时人民特别是对穷苦的劳动人民的残酷统治、压迫。唐代的贵妃池，过去是专供王宫里的嫔妃享用，然而在今天它成了人们观赏的地方。西安事变的“捉蒋亭”，已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人民公敌蒋介石抗日的历史见证。在这里英雄的中国人民创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事迹。而今天，时代不同了，过去的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人民过的是和平、幸福生活，劳动人民真正成了新中国的主人，享受着充分的民主与自由。周师傅感到所以能够有今天是来之不易的，因此在参加革命的三十多年里，把自己全部的精力与心血都贡献给了文艺事业。工作一贯兢兢业业、勤恳努力、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如一九五六年的一次赶制戏剧《白莲花》的布景，周师傅在高达一丈四、五尺的架子上专心致志地画着布景，由于当时安全设备较差，搭的木板不牢固，稍不注意一条腿滑倒摔了下来，将肋骨摔断三根，采取紧急手术措施后，医生建议最少休息半年，而周根心师傅知道布景尚未完成，工作正需要他，仅休息了半个月就上班了。象这样的轻伤、重伤，周师傅受过好几次，身体健康也受到了损失，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不肯休息，甚至还跟随剧团外出演出。如他摔伤最重手术后只休息了半个月的那一次，上班一个月了伤口还未痊愈，便跟随剧团去陕西参观演出。这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他呢？那就是他爱祖国、爱艺术、更热爱生活。凭着这一信念，当他遇到困难时，总不忘记过去的苦，而更珍惜今日的甜，满怀信心地向往着二〇〇〇年。

他的生活简朴，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人正派耿直，乐于周济有困难的人。不论环境怎样艰苦，他都能适应，都能为



社会创造出价值来，尤其是艺术的价值。

#### 四、为修葺文化古迹，晚年余热再生辉

一九七六年，座落在呼市南郊的游览胜地——昭君墓，准备在墓东侧正面及墓前新建待客厅、六角亭，并为西面的文物陈列室制作横匾一块。时年六十七岁的周根心师傅，服从组织安排前往支援。这次施工是周根心和他的兄长周兰伴（瓦工）带领近三十名木泥工，从七月中旬开始，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建起的。据粗略统计，五间待客厅从屋檐下的滴空到门窗、隔扇的木刻（刀工）活儿，有二百二十二幅（块）。在隔扇上方的横披处有十幅木刻作品，其中东隔扇上方的五幅是乌素图召、清真寺、喇嘛洞、昭君出塞、美岱召，西隔扇上方的五幅是席力图召、白塔、五塔、昭君出塞、昭君墓。其中两幅《昭君出塞图》，每幅宽一米二十公分，高四十公分（其它八幅的规格均是宽五十公分，高四十公分）。画面上的人物栩栩如生，骏马膘肥体壮，刻工十分精细。这十幅作品都是采用夸张透视画法和大起地浮雕刻法精制而成。

西面文物陈列室横匾上的木雕图案是喜鹊登梅、孔雀戏牡丹以及海棠代云子的四角儿，这些图案雕刻在半圆体的凸面上，工艺比平面木刻的难度更大。昭君墓前的六角亭上，雕刻着凤串牡丹、珍菊佳丰等图案。这次施工中木雕作品的画稿俱出自周根心师傅之手，并由他和亢凤义、齐蝉蝉（蒙古族）、兰福贵、祁义等几位师傅制作的。

所有绘画、雕刻工程，既反映了我国建筑艺术的民族特点，又突出了我市名胜古迹的地区特点。工程完工后，游人小憩于亭内，领略雕绘艺术，莫不有古色古香、景物配合相

宜、相得益彰之感，宛如置身名园胜景。从这一工程中，充分显示了周师傅匠心独具的高超水平。

一九八三年，内蒙民委和佛协等有关部门，决定重修大召。大召是我市最早兴建的寺院，据有关资料记载，该召建立于明神宗（万历六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曾在清代康熙三十七年即公元一六九八年进行修葺，将大殿屋顶换铺黄琉璃瓦，每块值银三钱，竣工后共用银五千两。光绪三十年即公元一九〇四年，大召扎萨克达喇嘛凯穆楚克慕缘又重修一次。在此以后，经过北洋军阀、国民党及日伪统治时期，大召连续遭到破坏，早已残破不堪。解放后，人民政府于一九六二年重修了大召，保护了这座四百年前蒙、汉人民共同修建的寺院和内部尚存的雕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保存民族艺术、民族文化，并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有关部门作出再次修缮大召的决定，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动工。这是一项对艺术水平有较高要求的工程，现在呼市掌握高度雕刻及古典画艺术的艺人，已经奇缺，组织上决定仍请周根心师傅参加修建。周师傅已经年逾古稀，但他懂得修好大召对于内蒙首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及促进民族团结的巨大意义，他没有表示困难，而是积极地参加。组织上组织修葺大召的技术人员出外参观，周师傅也随同前往。参观的名胜古迹是北京的故宫和颐和园，山西的五台山和晋祠，大同的云岗石窟和九龙壁，陕西的秦始皇墓，江南风光名胜——杭州、苏州等。这些胜地，对周师傅来说，是旧地多次重游。而在艺术的提练上，却是一次胜过一次。返回后，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精心设计了大召的几个修葺工程项目，主要是九间楼和山门，

这两项工程从1983年四月开始，经半年施工，已经修复一新。九间楼是建筑在大召最后面的一座楼厅，经周师傅亲自设计、亲手雕刻的首先是楼的中央佛像塔。楼顶修有七珍八宝，据说是供奉最高神位的地方。其次是塔的左右两旁几根五米高的大圆柱上，经周师傅设计雕刻了《喜鹊登梅》、《燕子穿莲》、《凤串牡丹》、《珍菊佳丰》等图案。施工期间，正值酷暑季节，周师傅不顾年老力衰，和其他师傅一起动手，终于修复了这座九间楼，象是大召这座古建筑的后盾，耸立在召庙大殿的后面。

再就是召庙最前面的山门。山门面向大街，有十二根大红柱子。门顶中央的三大佛像，金光熠熠地盘坐在那里，东西两侧雕刻着《凤串牡丹》、《二龙戏珠》、《鹿鹤桐松》、《鹭鸶落莲》等，象征延年益寿、福寿安康，构成佛家圣地和人间天堂。这一难度较大，要求标准较高的工程，在雕刻、油彩、绘画匠人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终于修复。周师傅在这一工程中，以其精湛的木刻雕塑艺术，做出尤为人们赞许的贡献，又一次献出了他晚年的余热。

## 归绥两城的文昌庙与魁星楼

刘映元

文昌庙即梓潼斋君庙，也称文昌祠；魁星楼即魁星踢斗楼，又叫奎星阁。据说梓潼帝君原为在四川七曲山修行的道士张亚子，在晋战死后人立庙纪念。道家谓玉帝命梓潼掌文昌府及人间功名禄位事，因此梓潼帝君很受人崇拜，唐宋时屡封为英显王，元仁宗延佑三年（一三一七年）加封为“辅文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至于魁星，亦为主宰文运之神。学校祀魁星古代未有，始自南宋，其后以魁星踢斗，为文运之征兆，就魁字取象，塑鬼举足踢斗之状。这个鬼赤发蓝身，左足登在鳌的头上，右足踢左手所持之墨斗，用右手拿笔点之。旧社会不少人起名登鳌、占鳌、登魁、占魁以及映斗和映奎，即来源于此。文昌庙和魁星楼，既然有如此封建迷信作用，所以南宋以后的元、明、清各族统治者，尤其是当地的士绅，对建筑文昌庙和魁星楼，都非常重视。相传一个地方能否多出人才和念书人能否学优则仕完全取决于此，故文昌庙和魁星楼的香火，比文庙还要旺盛。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孔子，不过举行一下仪式，其它有关文教的活动，多在文昌庙中进行。

清朝统一全国之后，此风亦由边墙口里波及到边墙口外，不仅归化和绥远两城建起这两座庙宇，即在边远地区，也多建起。当包头尚是萨拉齐厅的一镇时，就在镇内建筑起高

大的文昌庙，归化城厅东区的脑包村，虽系农村亦盖了一很小的魁星楼。归绥新旧两城的三座文昌庙和魁星楼，都是庙和楼结构在一起，魁星楼的底下，为文昌庙的山门，可以说主要是文昌庙，就是附设魁星楼而已，并非边墙口里那样，庙和楼各自分离。这三座文昌庙，土默特旗的坐落于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扩修后的归化老城外东南，绥远城厅的坐落于新城城内东南拐角，归化城厅的坐落于发展了旧城东南顶端。若按现在的街道名称觅其方位，即，蒙古的文昌庙在旧城小东街北口不远的地方，满族的文昌庙在新城南门口书院东街以东，汉族的文昌庙和海窟的南龙王庙毗连在一起，都占着八卦的巽字方位。其中以土默特旗的文昌庙，历史最为悠久，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也最为深远，从雍正（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年间建成，到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解放，二百多年以来，里边一直设有学校和文教机关。

土默特旗文昌庙的跨院中，很早就成立了人们所说的“蒙古书坊”。该旗文庙中的启运书院谓之官学，起初专攻满文与蒙文。文昌庙中的“蒙古书坊”则是私塾，一直专攻汉文和汉学。土默特部自从把世袭王爷废除之后，原来的“台吉”贵族受到很大限制，平民出身的士子，只要满蒙汉文皆通，可以由笔贴式往上升迁，经过骁骑校和“公中佐领”而担任参领。蒙古族的有钱人家，很注意培养子弟读书，不仅送到文庙的启运书院学习，也送进文昌庙的“蒙古书坊”深造。随着满族统治者逐渐把满文放弃，土默特“都统衙门”与山西“巡抚衙门”和归绥道“道台衙门”来往公牍全用汉文，故对文昌庙的“蒙古书坊”，比对文庙的启运

书院还要致力充实加强。特别是“都统衙门”的十二家参领，为使使自己后继有人，不惜拿出重资把山西雁门关南的名儒硕士，聘到“蒙古书坊”执教，于是汉族衙门的“掌案”，“归化美”的税吏，以及富商大贾，亦把子弟送入“蒙古书坊”就读。在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归绥金道的古丰书院未成立以前，土旗文昌庙成为山西口外的最高学府所在地。

清初以迄中叶，山西归绥道未设主管教育的学官。蒙汉人只考翻译，不让参加科举，满族人到右玉初试，汉族人回原籍赶考。到了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设置了归绥道七厅儒学总教谕的“老师衙门”，汉族童生始在归化城集中考取秀才。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已经成立起学堂，这一年举行最后一次考取秀才时，方准蒙古童生和满汉童生，一并到宁武府城，借用那里贡院的考棚举行测验。在这以前，同治年间考中殿试榜眼（进士第二名）、光绪初任山东巡按御史、朔州王康荣，和光绪十一年到三十一年共计七科的归化城秀才，多数为土默特旗文昌庙“蒙古书坊”的学生，许多人受业于在该书坊执教的平鲁县韩秉衡老先生，最后一科考中秀才的有蒙古巴文尚和奎杰。巴文尚在包头受业于堡德州优贡尹斯文、奎杰和同年秀才拔贡的郭象汲（曾任绥远教育厅长和通志馆馆长），以及近代的蒙古族诗人、史学家荣祥，均先后读书于此一“蒙古书坊”，为代州名士吴天章的高足弟子。吴的好多蒙汉学生，曾为老师立“德教碑”于南茶坊到杀虎口的“省大路”道旁。

土旗文昌庙坐落的那条小东街，直通小召前的闹市，在大南街未繁华以前，为归化城最热闹的街衢。因人多路窄，不能在街上搭台给文昌帝君唱戏，每到演剧的时候亦借用附

近关帝庙的乐楼。从“蒙古书坊”发出诵读之声，对于普通“求利于市”的生意人当然无动于衷，可是一拐弯传入关帝庙前和小召后的那条街中，却发生了连锁反响。小召后街往南路西，有个“归化关”税吏的儿子路尔厚，于光绪初年回杀虎口原籍，考中右玉县的秀才，门口挂出“明经弟”的牌匾；路东武家（原籍朔州）有个开面铺的老掌柜，受了此一影响，也把侄子送入“蒙古书坊”读书，改换了原来的门庭。除了侄儿武惠和儿子武敏，相继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己亥科和二十八年壬寅科考中归绥道秀才。在这以前，武掌柜还曾赞助附近元盛德巷子里的一个拣料炭小孩郑永贞到“蒙古书坊”读书。郑永贞先回大同原籍考中秀才，接着于光绪十一年考中山西乙酉科乡试举人，十五年又考中全国己丑科殿试进士。由此归化城兴教之风大起，木匠和衙役的儿子也走上仕途，象考中秀才进入“令德堂”（山西大学前身）、后来逸进日本留学的归化城士子李景泉（曾任归绥道尹）和龚秉钧（曾任国会议员）等，都出身寒微，并非生于名门望族。

郑永贞先在河南担任知县，以后调升彰德府安阳机器织布厂监督。为了报答武家当年对他的恩义，于宣统年间把武敏的儿子武懿美，费送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一直供养到南京金陵大学农科毕业，传为美谈佳说，使缙绅阶层以兴学助学为荣。武敏受此鼓舞感动，首先在自己家中设立书馆，免费收容贫苦儿童，亲自执教督课，并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协助归化城“北头起”的团民，成立了“回部学堂”。当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武敏与蒙古士绅额音泰和回族士绅艾辅庭，共同在三贤庙创办归绥第一座女子小学时，在

武、颢、艾等四个校董中，还出现了一个小召庙的银匠韩权。韩权和郑永贞同住在元盛德巷，原籍亦是大同，祖辈在老城内的四眼井巷口，开设有一座银匠铺，专做蒙古妇女的头戴饰品，和男子们所用的鼻烟壶，制品以鹿为商标，由于质地精良，远销外蒙前后两营和库伦，所以归化城的人，称为“韩鼻烟家”。韩权每天从柜上做完银器，从小东街文昌庙前走过，听到“蒙古书坊”里边的读书声音，路经小召后街，看见路家和武家的两面“明经第”牌匾，回到元盛德巷，望一望郑永贞曾住过的小院，耳闻目濡，转变成为武训式的人物。遂把很好的手艺和能赚钱的生意放下，专心致志从事了文教事业。在创办三贤庙女校时，以韩权付出的辛苦最多，因跪积劳成疾，于学校开课不久鞠躬尽瘁而死。韩权的弟弟韩桂，为郭象汲和李景泉的学生，从山西第一师范毕业后，先任土默特旗“南高等”小学教员，后参加绥远道志馆，从事采访和编修工作。六大卷宗教志，除黄教与天主教外，全由他调查整理写成。韩桂的子孙多大学毕业，为呼和浩特市的知名书香人家，他的儿子韩守恭为内蒙农业学校副校长、副教授，已经退休。韩守恭现仍在包头师专讲师，女儿韩守谦的儿子曹黎光，为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啤酒厂厂长，以老中青高级知识分子，都给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

土旗文昌庙的“蒙古书坊”，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继文庙的启运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后，亦改称为旗立第一初等小学堂，吴天章年过七旬仍在里边讲授古文诗词。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土默特副都统三多（杭州汉军旗人，后升库伦外事大臣），在文昌庙内修房十间，成立了归绥两城第一座公立图书馆，除科技图书不计外，共有经史子



集一万四千册百余卷。土旗第一初等小学堂的学生近水楼台先得月，很便利进去阅读。这个初等小学堂，除了代州的吴天章，还有浙江鄞县的应炳华在里边讲授古文，应为副都统三多的幕僚，人们称为“应师爷”。他虽说话口音难懂，但汉学程度比吴天章还要高深，故文昌庙的初等小学堂名为初等，并不低于文庙的高等小学堂。民国成立，吴天章已经病故，应炳华领上学生，和文庙的高等小学堂合并为土默特旗小学校。由于民国三年归绥道和山西分治改为绥远特别行政区，跟着将军改称都统，原来的土默特都统也改称为总管，历任都统均以亲信担任土旗总董。这些都统总管多系武夫，根本不重视文化教育，加之那时候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所以土旗文昌庙的图书馆，等于虚设了十多年，可以说门可罗雀，里边布满灰尘蛛网。不过小东街的正旗文昌庙位于旧城大十字一带地址比较宽敞，并以其藏书为基础，却仰仗冯玉祥将军督办西北边防之势，开始成为绥远区和绥远省的社会教育中心。

民国十四年国民军进驻归绥后，土旗文昌庙内成立了全区通俗教育讲演所，在宣化冯延铸（起义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所所长）和阳原李泰棻（解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先后担任所长期间，除了把图书馆附设于所内，并将好多出土文物收集起来，另辟了一间金石陈列室。十五年萨拉齐陈志仁（起义后任内蒙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任所长后，出版了图文并茂的通俗白话日报，由托克托县的杨令德主笔，本城民间画家大阿荣通绘图。廿八年绥远由区建省，通俗讲演所改为民众教育馆，首任馆长桑宁樊库（起义后任包头民政局副局长）改石印通俗白话日报为铅印社会日报，文昌庙附近的店

铺中，遂出现了山西太原人开的小大铅印局作坊。樊埠和馆内同仁进行了社会调查，辑成《绥远各县局社会调查报告》一书，还在文昌庙内外举行了破除迷信和讲究卫生的图片展览，对移风易俗起过一定的作用。二十四年绥远民众教育馆搬到“九·一八纪念堂”后院（现工人文宫前身），文昌庙为绥远地方政团潘秀仁派的“二十一学社”占据。日伪统治时代到解放前夕，里边设立了万国道德会绥远分会的小学校。解放初和十年动乱期间，文昌庙的魁星楼先被拆除，后来里边也改建为家属宿舍，所以现在的好多人，已不知道东大街北口的这一处大杂院，曾经是东壁图书府和西园翰墨林，有过当地二百多年文化发展历史的古迹。

新城东南城角的满族文昌庙，当时比旧城蒙汉两族文昌庙富丽堂皇，除了魁星楼高耸入云，山门洞中还塑有文昌帝君骑的骡子。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绥远城建起以后，城内四街四角和城外四瓮城和四郊的十八、九座大小庙宇都由北京白云观等庙派来道士主持。据说文昌庙四周古榆参天，内中广植花木，除了满族士子每到右玉太原，北京赶考来给文昌帝君烧香磕头。每年正月十五全新城的汉族商民在此举办“社火”，高跷、车灯等到“粮饷衙门”和“将军衙门”前边表演，还下帖子给旧城各衙门和商号表演，谓之“新城的秧歌”。此外每年三月十八和端午节，在此演两次大戏，均由粮饷衙门的掌案们主办，相当热闹隆重。

辛亥革命以后，这座文昌庙随着满族的衰微而萧条。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该庙的道士加入“青帮”组织，庙中建立了“纯一坛”，十七年“纯一坛”搬走，扩大为新旧城大马路北的“纯一善社”，同年“中山学院”由旧城恒

昌店巷迁入新城文昌庙以西的满族文庙（启秀书院和绥远中学堂均曾设于此处）以内。职业学校也由旧城蒙古文庙西院迁入新城文庙斜对面的一个协领署内（现呼市第三中学校址）。从此南街一带成了新城的文化区，有两所中学，三所小学和一所幼稚园，文昌庙便失去利用的价值，因无人修补拆除。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我住职业学校时，尚在新城西南角见过改为二十镇“忠烈祠”的那座菩萨庙，里边祭祀第一次百灵庙战役的殉国官兵，有冯玉祥将军的题词。对于东南角的文昌庙则无一点印象，盖当年庙的废墟已被中山学院东面的菜园掩盖，现在庙的痕迹更压在楼房底下，时代向新的方向发展，旧的终归要被淘汰，故提起新城满族的文昌庙，有不胜“人间正道是沧桑”之感。

旧城海窟附近的汉族文昌庙没有建筑以前，那里已有一座供奉龙王的庙宇。文昌庙和龙王庙毗连在一起，除了地处整个旧城的东南方位，还为了海窟是个有风水的地方。由于海窟以南，便是石羊桥附近的荒野，故不如坐落在市中心大十字不远的小东街蒙古文昌阁那样被人所瞩目，好多人往往把汉族文昌庙当作海窟龙王庙的跨院。每年“住衙门的”行社“酆侯社”（祀西汉朝萧何），从三月十一日起，在这里唱戏四天。教书先生们所组织的“崇文社”，于秋日祭祀孔子那天，先去南柴火市的蒙族文庙和杨家巷的汉族文庙参加大典完毕，都在这里聚餐并举行诗会。海窟是归城的风景区，暗通大召前的玉泉井，蓄水池边，古木环绕，池东并排着文昌、土地、龙王三座庙宇，都有高大的杨柳榆树，从南面向北望去非常好看。每当归化城的秀才和童生衣冠整齐地前来汇集，迈着方步从市区鱼贯经过，行人都给让路，站在两

旁候立，以示对师表的崇敬。

“崇文社”，据绥远通志稿记载，成立于清朝乾嘉之际，那么文昌庙的建筑，应该在乾隆年间。这个文昌庙从建筑开始，里边即设有书馆，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归化城成立四个初等小学堂时，文昌庙变为东南街初等学堂，郭象仪考中秀才、拔贡后，即为该校校长。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大革命开始，归绥县的农民协会在海窟龙王庙成立，曾利用文昌庙小学的教室举行过讲习班，协会秘书杨植霖同志等在此授课。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傅作义先生任绥远省主席后除充实了省立中小学外，为发扬社会文风，捐资五百元补修了这一座文昌庙，郭象仪为此撰写了《重修文昌庙碑记》。解放前海窟的文昌庙，扩大为呼市玉泉区清泉街小学，和那两座文昌庙相较，可谓二百多年已修成正果。前些日子我去采访时，海窟已经干涸，上边盖了民房。经过三中全会以后，玉泉区人民政府这几年大力整饰市容，昔日污浊的南龙王庙巷，不亚于现在水泥铺路的清泉街。魁星楼近年才拆除，可是几株苍郁的古榆，却守护着人类的稚嫩花朵，和国家栋梁的茁壮幼苗。听见玻璃弦歌之声，从教室和校园中传出，使人精神振奋鼓舞，由不得涌唱起“龙盘虎踞今胜昔”了。

归绥为归化城和绥远城的合称，清朝以归绥定为山西的一道，民国以后到解放以前，为绥远特别行政区和绥远省的治所和省会。一九五五年改称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由于它是我国北疆的边防军事重镇，也是内蒙中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好几百年来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当地的文化事业，为了把呼和浩特建设为现代化城市，从八十年代就

开始按规划逐渐改建扩大原有的新旧两城，不仅有关风教的文昌庙今天已面目全非，恐怕到了本世纪末连街巷也找不见了。除过青冢、白塔这些古迹和代表民族宗教信仰的召庙、寺院和礼拜堂应该有重点地保留下来，并加以维护修理，其它旧社会的封建上层建筑，势必随着时代进化而消亡，但它们的历史不能按照破砖烂土那样处理，故我们要把这些记载下来，留待后来的研究者进行参考。



小川队长到任后，生熟水烟一溜烟吞我前时，放话带全烟  
，为也这得一个，有到日本我下，”“且西说武德  
日本宪兵队长小川暴行录

“日本宪兵”到任后，到日本，”“善民此得我来  
的，”“且西说武德”“善民此得我来”

“日本宪兵”到任后，到日本，”“善民此得我来”

日寇统治时期，延县曾有一度驻过日本宪兵队。队长叫小川，他的部下还不到10人。别看他们人数不多，可是提起“日本宪兵”，人们都毛骨悚然。日本宪兵就是本土皇，他们为所欲为，无人敢于干涉。小川队长驯养着一群洋狗，用他们自己的手或语言指挥狗的行迹，叫谁啥就干啥。他每次出来游街串巷，洋狗就是他的随从。他往往摩过往行人开心取乐。比如看到某个妇女穿着打扮华丽，他便指挥洋狗扑上去和女人亲嘴，或是爬在背上抓扯并套前后后缠个不停，直至将这个女人吓得哭喊不能成声，小川才哈哈大笑地将狗收回。有时也同样戏弄一些老年人，凡是经他用洋狗戏弄过的人，虽说当场没有吓死，但过后也得大病一场，甚至精神失常。

小川虐人更为惨暴。一九三九年冬，县电讯所有个话务员叫王文，年龄不满三十岁，此人温和憨厚，不爱多说话，见人一面笑。与他接触过的人，对他都有好感，当时电讯所只有四个人，两个话务员，白日夜间轮替，有一线路工，还有一报务员。在一天夜晚，正赶王文值班，他当时也没委托一个顶班的人，便锁住门上街买吃喝走了。就在这时，宪兵队长小川要挂电话，一连几次无人接，小川发火了。第二天一早，将王文抓回宪兵队，经过简短的审问，便将王文的衣

服全部剥光，拉在井旁捆在一根木桩上，光着双脚站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土坑里，里边打满水结成冰，从井里再提出水，一桶一桶朝头往下浇，直至昏迷过去又拉到屋内，待苏醒过来发抖地打着牙呵。小川问：“冷吗？”回答：“……冷……”“没关系，给你烤烤”。说着便从灶内拉出一张烧红的铁锨，在浑身上下地烙，顿时皮焦肉烂，室内臭不可闻，又昏了过去，再用凉水喷过来，这时周身已全是水泡，小川又指使洋狗扑上，将水泡全给抓破，又问：“疼吗？”回答：“疼”，“没关系，有好药”，说后用盐粉在全身抹擦。毕后给穿上衣服，头上戴上黑面罩，着人抬到看守所，关押起来。电讯所的同事们，几次到监内探望，一直在昏迷状态，五、六日后才苏醒过来，再看周身已是体无完肤了，象是患了大麻疹般地瘫痪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在旁的人只能给喂些水和食物。其惨状目睹者无不伤心落泪。被关押了半年多，再无人提审或过问，直到第二年夏季，小川调离托县后，才释放出来。出狱后痴痴呆呆，成了残废人，又过了一年，就死去了。

# 日本投降后的托克托县

范若珍

## 一、迎接国军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驻扎在托县的日本军队和文职人员等，顿时慌作一团，从军营和其眷属的住宅里传出“呜呜”的哀嚎声。他们感到了自己的末日来临，耽心以往的暴行会遭到清算，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到家乡故土和亲人们相见……。

当时国民党军队马占山将军率的骑五、六师和肃宝山率的保安团，已兵临城下，包围了托县。城内外双方联络商定：一、让所有日本人安全撤离，双方不再付诸武力。二、不准伤害城内和沿途百姓。商定后的第二天凌晨，日军和文职人员眷属等，全部撤离了托县。当日午后，保安团和骑五、六师先后开入城内。

啊！八年的沦陷，终于盼出头了。人们欢呼胜利，热情迎接“国军”。抢先开入城内的是保安团，他们一进城便跋扈武扬威，面带凶像，令人见而生畏。他们并不询问百姓的疾苦，给予安慰，而是对接待人员百般挑剔，这也不对，那也不好，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的士兵走家串户进行抢劫，访查住过“土业组合”的人，逼要烟土，不到半天时间，个个所抢财物，均驮满马背。对接待他们的人员，偶有不属，便



横眉冷对并责骂：“哼，看看你们这些亡国奴头相……”：有的竟遭毒打。同天的下午，马占山将军率骑五、六师也开入城内。人们举旗列队到城外迎接，马将军下马步行入城内，笑容可掬地向人群招手致意。当得知保安团的抢劫行为，立即将该团武器及马匹全部收缴，并没收了抢劫财物。经过严厉训斥，才将武器、马匹发还。城内秩序从此也稳定下来。

不几天后，骑五、六师全开走了，城内只留保安团驻守，此时，新任县长庞炳带领一帮人到来。庞县长一到任，就着手县、乡机构的建立，还招聘了部分公职人员。刚把县政府的架子搭起，庞县长就被撤职了，任期仅一月有余。此时绥南专署已成立，专员由保安司令郭长清兼任。专署任命郭栋接任托县县长。郭到任后，重新又是一番安排，直到十一月间，县乡机构才都建立起来。

## 二、国民党开始征兵

将近年底，国民党补训三十一师进驻托县，任务是征训壮丁。该师师长名郭溪璜，来后不几天，郭师长就发出请帖，邀请县乡官员和地方士绅，光临赴宴。酒宴上，郭师长讲明其来托的任务。他说，补训三十一师今后长期驻托，一个师的兵源全从托县征训，请当地政府和乡绅、父老给予大力支持……。郭讲后，赴宴的各员纷纷表态，这个说：“任务光荣”，那个说：“义不容辞”，特别是大士绅李永清，首当其冲，表示支持。就在宴会上，为其亲孙子李泽林（小名老九）报名应征，获得全场热烈掌声，宴会尽欢而散。

会后分头行动，大肆宣传，全县城乡征兵开始了。应征

名额不限，多多益善。当时百姓们对此次征兵，真相不明，听了宣传认为：一、凡适龄者必须参加轮训；任何人不得推挪。二、不离本县受训五个月完事。三、李永清的孙子争先应征，必是大有好处。这次征兵没费多长时间，也没费多少周折，任务就完成了。

全师三个团，分三处集训。第一团设在县城，组训附近几个乡的青壮年；二团设在新营子村，组训东部几个乡的青壮年；三团设在老官营村，组训北部几个乡的青壮年。训练开始后，起先管理还不十分严格，星期天休息，士兵可以上街串串，个别人家有特殊情况，可请假回去看看。后阶段训练就紧张了，管理也越来越严，到了春节期间，任何人不准请假。到了正月十五，按民间传统习惯，这个节日要大放焰火，搞社火活动，出高跷、龙灯、狮子、花灯等。驻军三十一师当时也搞所谓“军民联欢”。由受训壮丁组织了几班高跷，上街表演。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尽管是搞军民联欢，可是这些应征青年，节日不能回家和亲人团圆，能不伤感吗？尽管表面上喜笑颜开，内心却是痛苦万状。军队扮演的高跷，同其他社火一样，走到各家商店铺户门前，围起来也唱些小曲，士兵们编唱《献上八杯茶》，用民间小调演唱，其唱词有“士兵离乡背井，思念父母亲，想念妻子娇娃，献上八杯茶，诉诉衷肠”，演唱中声声泪下，闻者无不感叹。郭师长听后，却大为恼火，但又不便出面制止，只有在背地里“歇斯底里”地发作而已。

正月十五过后，部队士气低落，军容涣散。这种情景郭师长预感到未来的不妙，于是急忙汇报上司，要求尽快处置。这期间管理得更严了。

到了清明节，受训期已满三月，还听不到放回的消息，管理反而更加严格了，士兵们在营房院内活动，一旁还有人监视。这样一来，有些较为敏感的人，已经预测到事情会有变化，背地里也嘁嘁喳喳地议论。这时有些士兵便急急忙忙给家里捎信、传话，让家里人尽快筹措钱财打点。随后便有一些士兵家属，登门邀请，今日请团长，明日叫连长，说是：“几个月来长官们劳心费神，家里人过意不去，请到家吃顿随茶便饭……”。这样殷勤地邀请，怎么不来，酒宴上又献出礼品，顺便肯求，对其应征子弟予以关照。长官们既得到好处，家属们的请求能不答应吗。这段时间，长官们应邀赴宴，东请西叫，实在忙个不了。有的耽心请不来，怕误了大事，便又三家、四家联合邀请。长官们的腰包很快地膨胀起来。据说燕山营乡有个叫柳金小的士兵，他是三门抱的个独生子，家境也比较富裕，这次光他一家就送给团长百两大烟土。这次行贿的都是比较富裕的农户，而大多数贫苦户却无能为力，只好听候命运的摆布。

一九四六年四月间的一天夜晚，师部突然下令，部队全部出发，要到外地植树，至于植树地点，没有宣布。出发前，先从各连队点名指定一些士兵，说是留下来另有任务，当时人们心里都清楚，留下来的任务，就是各自回家。随后大部队就出发了，在行军途中，突然从别处开来部队，将补训三十一师全部接收改编，在接交点名时，各连队均有缺额，回答说是开了小差，这样也就一报了之。部队改编后，不知开到了何处，而补训三十一师从此也就消声匿迹了。

补训三十一师开走后，子弟被征的户，有的咒骂，有的嚎哭，唯有子弟被留下的户，心里有数，不动声色。原来留

下来的壮丁都回家了。大绅士李永潜的孙子李泽林也安然返回。人们围着他问长问短，他吞吞吐吐地一会说是开了小差，一会又说是回来探亲，见此情景，人们心里更清楚了，都说：“原来如此”。

就在此期间，郭栋县长又被撤了，绥远省政府任命张淑良任县长，副县长王怡同时到任。张县长来后，将机构重新调整，原驻保安团改为保警队，各乡镇各增派一名指导员，县政府又增设了几个科室，到了六、七月间，全县各项工作，按部就班，逐渐恢复了常态。

### 三、抓兵

就在这期间，征兵任务又下达了。上次征兵欺骗了群众，这次再征兵就难了。政府失信于民，再讲的好听，也无人应征，尽管三令五申，也无济于事。上级则一再催逼，下级是一筹莫展，怎么办？最后使出绝招：“抓”。约在七月间的一天夜晚，全县秘密布置，配合接兵部队，统一行动时间，就在一个夜晚，全县城乡的青壮年，除了外出和闻风而逃者外，在家的大部分被抓获。被抓者，立即用绳捆绑在一起，防止逃跑。当晚就交给接兵部队，全部带走了。这次抓兵不少贫苦人家，造成家破人亡。如南街张德官一家四口，父亲卧病在床，母亲、妻子全靠德官一人外出揽工做活，养活一家。他被抓走后，父亲在悲痛之下病情加重，不几天就死了。又如，城西农民王板头一家五口，父母哥仨，从清河逃荒来托县，父亲携着放羊，哥仨给财主当长工，母亲是病残人。这次抓兵，老大和老三全被抓走，母亲终日痛哭不已，不久又得知老三死亡战场，立即气绝身亡。南门壕农

因事去世，被抓兵后，他的寡母母亲，看见儿子被抓，连鞋都顾不得穿，就追趕出去，两个女人连夜追了五、六十里，始终也没见到儿子，回来肩膀全磨破，袜和血肉连在一起。从此其寡母终日嚎啕痛哭，先流的是泪水，哭的成了血水，终于哭瞎了双眼，最后跳井而死。象这样的悲惨事件，仅在埕埭内就有这么多，在全县范围来说，恐怕有比这更为甚者。

#### 四、张淑良弃官而去

就在抓兵的当天夜晚，西北大风骤起，当时正赶上黄河猛涨，大风卷巨浪。一夜之间，将护城堤冲塌三分之二，眼看县城有被淹的危险。这下人们更慌了手脚，青壮年全被抓了兵，打坝是重活，老年人、妇女、儿童谁干得了，唉！真是祸不单行。当时不知是谁邀集了十来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们也不避回岗退兵的阻拦，向拥闾永昌政府。张县长闻知后，立即出来接见，想问问来意，再遣送些老人们，二话没说，将县长推推拉拉拖着就走。县长忙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口口声声请求县长到河神庙许愿，普救群生。县长说：“这是迷信，不警事”。老人们不听他的话，硬拖拉到了河神庙，强迫他跪在神前，又接着磕头。这样折腾了一气，才将县长放走。张县长回衙后，气得面色苍白，满脸泪痕地对同仁们说：“唉！我来托县干了些什么？这是当的什么县长？……”。过了几天，埕埭河水逐渐落下了，张淑良这位温顺善良的县长，竟弃官而去。张走后，副县长王怡接充县长。

这半年多的时间换了三任县长，大征兵，接连大抓兵，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 五、逃兵和群众对抗拔兵

在这期间，国民党部队中，士兵逃跑情况连连发生。省保安司令部接连不断将逃兵名册抄发给地方政府，三令五申催促缉捕归队。在当时，征兵、抓兵是百姓最怕的事情，无不想方设法躲避。因为当局规定公务人员和在校学生不应征，所以有些门路的人千方百计地搞一个挂名的公务人员证明。开来的证明，有司法机关的法警，有某机关的工勤，还有从部队开来证明的，这样就算有了护身符。无门路可找的，则是躲躲藏藏，时刻提防，甚至连家也不敢回，即使偷着回去一趟，也得家里人给放哨，以防不测。有的露宿沙窝树林，遇到情况便于逃跑，有的自行设置好躲身处，不易被人发觉；有的全村人串通一气，共同提防，一发现有办公人员或陌生人，不等他们进村，大家立刻躲藏；也有的自找对象，结成群伙，十人、八人不论干活、休息，常在一起，人人携带棍棒，遇到情况，共同以武力对抗。凡此种国民党当局也了如指掌，但亦无可奈何。

## 六、部队缉逃

有的部队派连队直接到地方分头缉逃。他们到了地方，先进行侦察，有了目标，便下手缉拿。当时也有不幸被抓获者，也有闻风跑掉的，还有逃跑被追赶击毙的。凡被抓获者，也都是九死一生。一九四七年春，一〇一师某连队抓获了几名逃兵，当时拉回县城，在衙门口邵家大院，将全连士兵集合围坐成大圆圈，然后将逃兵带入圈内，严刑拷打。打的死过去，用凉水喷醒再打，直至最后奄奄一息才算罢休。

围观的人无不胆战心惊，也许这是打一儆百，杀鸡让猴看的镇压手段吧。尽管如此，各部逃兵并未因之减少，相反跑的却是越来越多。部队直接抓兵，效果并不显著，一〇一师派一名副团长率领两个连队，分头在全县十一个乡（镇）盘旋半年之久，而抓获的逃兵屈指可数，甚至在缉逃的部队里，也不时出现士兵逃跑的情况，真是得不偿失。部队上层也深感他们的这种办法并不高明，因此在七、八月间，下令将缉逃部队全部撤回。

下来缉逃的部队，逃兵很少抓到，但地方百姓却遭了殃。他们每到一个村，成群结伙，少则十几人，有时集中二、三十人，所到之处大吃大喝，一住好几天。说实在的，对这伙人光吃喝也供养不起，加之他们不时地还在无理取闹、耍赖，大喊大叫，说什么：“交不出逃兵永远不离此地……”。有啥办法呢！只好向逃兵户集措一些钱财、烟土等，着人暗暗地塞给领兵官员，好话多讲，说是：“给弟兄们些烟火零用，不成敬意，逃兵之事肯求宽限时间……”。领兵官见钱高兴，喜笑颜开，提出的请求当然答应。这样总算是送他们起了身。再到另一村同样如此。就这样来来去去时达半年之久。其领兵官的腰包可真是满载了，但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与痛苦也可想而知了！

## 七、雇兵

缉逃命令连连下达，地方政府和乡镇，亦分头不断地下去缉捕。地方官员下去也同样借机捞些油水，加之群众时刻躲避或反抗，所以缉逃命令只是一纸空文。地方政府也无法可施，只能是一拖再拖，直到实在无法再拖的地步，各地才

又采取了新的应付办法。当时地方上有一些游手好闲，生活无着落的大烟鬼。其年龄多数在三十开外、四十岁上下，给这些人刮刮脸、剃剃头，就会显得年轻一些，送这些人给当兵还能凑合。但这些人必须花钱雇用。当时通行的价格是雇一个兵需花大烟土十两左右，折粮十石上下，其费用由壮丁户以人均摊。雇用的兵，均事先商定，必须是交部队验收后才能赚得这些款物。至于到了部队，干或逃，地方不加干涉。说来也怪，这些卖兵的人，他们既有胆量，又很灵巧，部队接收注册编入连队，未等官兵相识就跑回来了。下次再雇兵，还是这些人，他们的姓名每次变换。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一直就用这种办法应付国民党的拔兵。当时每隔两、三个月就得雇送一批，每批名额均在二百人上下。这种做法，地方上倒省事不少，但可苦了百姓，就此一项花费就无完无了，加之其他摊派均在耍个不停，逼得百姓们真没活头。

#### 八、石正中县长逃跑、扮演羊倌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王怡县长，以工作不力，被撤职调离，又派石正中来任县长。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军队溃败消息不时地传来。在托县周围也不断听到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全县所有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时刻在作逃跑准备。大约在八、九月间，突然接到情报，说在黑城东南一带，发现有解放军活动。闻讯后，石正中立即下令，集合保警队和全体公教人员，向北逃跑，一直跑到祝乐沁村。住了三、四天，又突然传来情报，说在察素齐一带发现解放军，当时紧急集合再向南逃。正赶



当晚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道路、荒滩、坑凹、圪塆全辨不清，人们跌跌撞撞连滚带爬，拼命地跑，整整跑了一夜，赶黎明才奔回县城。再看人们那种疲惫不堪的狼狈像，真是可怜又可笑。后经了解，情报完全是假的，是祝乐沁群众讨厌这帮人住下来坑害百姓，故假传情报，才将这帮人赶走。过了一个月左右，又有情报，说是解放军从和林向西进发。天刚亮，集合起来再向西逃，黄昏时辰，刚逃到二十四顷地附近，就和解放军相遇了。所有逃跑的人顿时各奔逃生，本来是一伙乌合之众，从未经见战场，就连保警开了几枪，也都扔掉武器，四散逃跑了。县长石正中当晚逃到一户农家，乞求扮作羊倌，躲了起来。接连托县解放四十八天，解放军走后，这位县长再没有回来。人们都说，这位县长来到托县除了逃跑啥也没干，还当了几天羊倌，所以人们称他为“苦尽忠”。

### 九、成立“清剿团”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解放军撤走后，省里又派李麟兆来任县长。据说此人曾在凉城、清河一带当过土匪，枪杆子不错，国民党要这种人当县长，也别有企图。当时国民党已知大势已去，但还要最后挣扎，幻想挽回败局。让李麟兆来是为了扩充军队。所以李来不久，就着手扩军。确定在全县成立两个“清剿团”，由他本人和潘恒万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连长、副官等人选也都配齐，只待招兵买马，可无人前来应征，直到一九四九年，招来的兵马还是寥寥无几。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和平解放，这两个有官无兵的“清剿团”，也随之散伙了。

## 十、路副团长坐镇催兵

一九四九年，李麟兆任县长期间，国民党军队征兵、缉逃的任务还是不断下达。李当时只顾忙于自搞扩军，对上级的征兵指示不予理睬。尽管上级三令五申，李却置若罔闻。上级见行文无效，于六、七月间，由一一一军派来一位路副团长带领一个排，驻于托县城内坐镇督催。但李仍不理睬。路曾几次要和县长面谈，这也难办到，致使这位副团长忍无可忍，大发雷霆，命令排长刘达小，领士兵到县政府军事科，将一名干事抓回团部当人质，实际也是给县长颜色看。李麟兆见此情景，为了缓和矛盾，这才面见路副团长，并答应在短期内给交送一批兵，这样才将人质放回。过了几天，河口唱戏，看戏的人不少，李麟兆见时机已到，亲自率领保警队将戏场包围，当场抓获二百多人，带回县城。经过审核，有自带护身符的，有任保甲长的，还有一些头面人物出面讲情的，对这些人全释放了。最后剩下一百多人，注册交给路副团长，算是给圆了面子。又过不久，绥远省和平解放，这位路副团长，也就不辞而别了。

## 十一、要粮

要粮是国民党的一大苛政。经过日寇八年摧残盘剥，农民已濒于破产。国民党来后，并没有给以休养生息之机。要粮是它的当务之急，比之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

每年秋征之前，省里下达“田赋征实”（即公粮）、“随赋征购”（即军粮）和“军用马料”三项任务。县里下达任务时，又加一码叫做“地方附加”，以解决地方军警和

公教人员之用。到了乡镇再加一码，叫做“机动数”，是为有些倒累户，交纳不起，拖累整个任务完不成，以“机动数”来弥补。最后到了基层保甲的加码，其名目就更繁多了，什么保甲摊派、乡镇自卫队给养、接待过往官员人吃、马喂需用等等。所有这些项目，其中“田赋征实”“地方附加”、“机动粮”等都是无偿白要，“随赋征购”及“军用马料”名义上给钱，但在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各级官员层层挪用，屯积居奇，从中得利，等发到县乡，已成废纸。尤其残酷的是：农民的主管衙门是保甲，保甲的帐目从来是统一计数向农民摊派的，每户农民所有各项负担，都累在一起计算，究竟应该负担多少，这一点始终是麻里麻糊，谁也说不清。因为已有的项目如此繁多，而未来的花销谁也难以预料。所以农民的交纳是没完没了，官府催逼也无休止。特别是每年到了征粮季节，县乡各机关和地方军警通力配合，抽调大批人员下乡催粮，催粮官员有时集合成伙结群猛突，有时三三两两分片分组。催要手段：软磨、硬逼、捆绑、吊打，十分残忍。对待一些交纳迟缓的地方，催粮官则带领武装军警和随从人员，跃武扬威，如狼似虎拥入村内。保甲人员立即东传西叫，喊骂毒打，顿时哭喊哀告之声到处皆闻。群众说他们活象“官土匪”，又是“催命鬼”，恐怖笼罩了农村遍地。有的催粮官不仅残暴凶狠，还胡作非为。四七年冬县警察局一位叫楚仪亭的科长，派到黑城乡（维新乡）催粮，手持棍棒，只要发现某户的欠粮尚未交清，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顿毒打。到了晚间，还要女人陪他作伴，招待粉头的卷烟、鸦片等，还得供应。有一次他在黑城大南门催粮，将一个农民打的当时昏迷过去。这个农民的妻

子，在气愤之下，不顾一切地扑上和他拼命。一旁围观的群众出于义愤，也都呐喊助威，楚见事不妙，拔腿就跑。这一妇女和群众尾追不放，楚被逼难逃，便爬上了三丈多高的古城墙跳了下去，这才摆脱了群众的追赶。两天后，他打听到这一农民苏醒过来安然无事，才又返回黑城。从此打人的手段稍有收敛，但晚间仍是要女人伴他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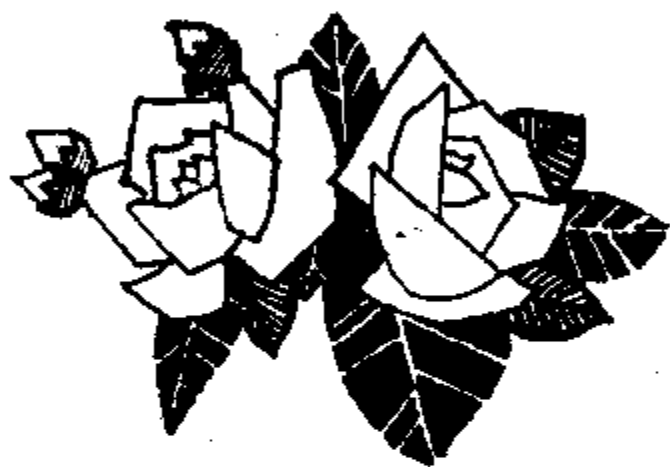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催逼，仍是满足不了国民党的需求。农民是真的抗粮不交吗？不是的。在那时，凡到过农村，去一些贫苦农民家里看一看，就会一目了然。别的不讲，就从农民屋内和男女穿着，就会清楚。当时大部分贫苦农民土炕无席，全家有一条被子的也很少。男女人能穿上打补丁的衣服，就算象样的好人家了。有的人家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围上块麻袋片子下不了炕。一家娘儿几个轮着穿一条裤子，谁下地干活谁穿，五、六岁的孩子冬天还光着屁股。男人一条破皮裤，四季翻着穿。这种情景，在农村到处可见。要粮官员遇到这样的人家，有些心肠软的，就悄悄离去。有的则不然，还要到处搜翻，那怕是发现有三、二升也要抢去。乡里分配时，不是有“机动数”吗？象这样的人家还不算倒累户吗？其实他们分配时是那样讲的，但在催要时就顾不到这么许多了。

国民党要粮，成为农民严重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负担不公。县乡每年层层下达任务时，多为地方乡绅大户把持，大量占有土地的地主，负担反而少，主要担子压在地少的小户肩上。如燕山营村，有鲁、张、杨三家乡绅大户，其权势不相上下，互不相让。三家轮流执政，每年一换。他们不仅操纵本村，全乡也得听他几份，其他地方的乡绅，虽不

象燕山营那样多，但也不乏其人。当时上级规定每乡（镇）民选一名副乡长。这一名额，当然是乡绅的席位，至于保甲长的人选，多数也由他们指定，所以乡里行使一切，如果违背了他们的意愿，那是难以通行的。

在那个年月里，每年分摊粮食任务，多数的地方都是按地亩均摊，这就很不公平。一、乡绅大户报耕地不实，都有隐瞒黑地，当地农民也都清楚，但谁敢出面主持丈量呢？二、土地优劣不等，产量差距很大，而乡绅们占有土地多数是优等好地，以亩均摊则优劣不分，群众对此称为“哭拉笑”。对此也曾有人提过意见，反驳者说：“土地是同样的，不多上肥怨谁，不下辛苦务艺又怨谁”？说到了，还得以亩均摊。再从交纳粮来说，县乡下达的征粮任务和保甲的各项摊派，不是分户立帐，单独考核，而是混同一起，赶年终统一算帐，这样乡绅大户便有机可趁。比如所有县乡办公人员下去，或是过往的军警官员，他们到了农村，都是安排在乡绅大户家里接待，吃喝由他们支付。官员走后，他们便向保甲报一笔帐，总共费用多少，全由他们自报。其中有无谎报、捏造，别人很难得知，甚至有些官员路过进去串个门坐一会，走后也要报一笔帐。保甲会计按其所报一切，全部计价折成粮食，收入帐内。到了年终决算时，富裕大户就此一项垫支，就可抵偿全年征粮任务，甚至有的还有超余。所以每到征粮季节，只能见到一般农民一次又一次地交纳，却很少能见到从乡绅大户的粮仓里拉走颗粒。有的人对此也产生怀疑，找保甲会计查看帐目，但看后也无话可说。所以在那个年月里，乡绅老财粮满仓，也无人敢动颗粒，贫苦农民只留三升二升也不许可！

• 上述是当年见闻的回忆，所述情节，难免遗漏或有谬误，望知情者予以改正。



## 呼和浩特药行史话

张 杰

呼和浩特的药行，过去被列为归化城十五大社以外的三十小社的最末位。因为在一九二一年京绥铁路通车之前，北京的“京药铺”和“京药房”尚未来此开设。本地固有的药铺和药房，不论“河南武安帮”和山西太谷祁县和大同人为主的“山西帮”药庄，全是古旧阴暗的门面，“黑七八旧”的柜台，与一般行社比较相形见拙。并且走外藩蒙古的“集锦社”所属的“通事行”，上自“三大号”下至一般的堂名，亦兼营推销草药，和收购外蒙与新疆的珍贵药材；特别是全国最大的归化城鹿茸市场，以及托克托县河口镇的“甘草码头”，前者由“三大号”和其他“店家”操纵，后者由当地专门的“草店”把持。本应该归于药行的生意，被别的行社抢走，于是单纯的药铺和药庄，便不为“外行”所注目。其实药行的门类很多，涉及面极广，它虽不象炭行、粮行关系民生日常必需，也不象钱铺、货店可以波动整个街面，但它能给医疗卫生提供物资条件，同样是人类社会不能离开的一种行业。

我于一九三四年春天到归化城大南街广巨药房学徒，先在后厂推“药碾子”。在师兄们的带动下，练习对各种草药的加工炮制和制造丸散膏丹，继在前柜拉“药斗子”接待顾客。后来派出到新旧两城及乌盟所属的各旗县“上街”跑

买卖，并入乌拉山“出场”采购生药和往河北安国县（古称祁州）“当客”。后因药材码头迁移到天津，我便前去天津搞采购业务。由于勤勤恳恳替财东效力，也为自己的前途兢兢业业卖劲，所以由普通的小伙计，一步一步的升级，一九四二年即成为顶八厘“生意”的当家掌柜。解放初期积极拥护党对工商业的改造政策。一九五六年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被党提拔为呼和浩特国药总店经理。一九五九年与市医药公司合并后，专门从事中药工作。现在年近古稀，精力尚未衰竭，仍在呼和浩特医药分公司贸易中心服务。为了响应政协、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抢救文史资料的号召，愿把自己半世纪的经历，和听老掌柜们传说，并且经过向退休的老职工调查，跟研究地方历史的同志讨论，按照以下几个题目，写成这篇《呼和浩特地区药行史话》。由于我没有赶上归化城的“西口商埠”繁荣时代，因而遗漏不实之处必然存在，希望知情者予以赐教补正。

### （一）药行在归绥特别发达

清朝的康熙皇帝征平噶尔丹汗的叛乱，内外蒙古出现了安定的局面。雍正和乾隆皇帝连续出兵天山南北，摧毁那里的封建割据，完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给农牧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呼和浩特的新城落成之后，毗连察哈尔部的张家口和土默特的归化城，这两个由都统统治的内属蒙古的城市，便成为中原沟通西北边疆的商品集散地。尤其西口归化城比东口张家口的“探投”还要浩瀚遥远。它不仅接近外蒙六大行政区域的五大区域，还通过“前营”乌里雅苏台城、后营科



布多城，接连新疆的奇台（古城子）、乌鲁木齐（红庙子）和伊犁等城。出国经中亚细亚，抵达俄国的毛斯圪瓦（莫斯科），成为丝茶驼路的启运“内陆码头”。这样百业具兴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外蒙封锁边境，新疆省政府主席柏增新被刺，战乱迭起时，共经历了二百年。

这一时期，对药行的发展来说，也具备了优越的条件，它既有推销一般药品的广大市场，又有收购珍贵药材的辽阔产区。乾隆初期归化城周围的土默川和察哈尔左翼四旗的山区，就由半农半牧社会完全进入农业社会。行政上增设到七个厅（等于县），定居与流动的农民达到二十多万。小城市和较大的村镇纷纷开设了小药铺，并栽起给牲畜治病的兽医“桩子”。他们出售和消耗的药材，都向归化城的药行购买，连好几百走乡串村摇“响环”的卖药看病先生所用药品，亦来自归化城药行。同时清朝提倡喇嘛教，数以千计的召庙星罗棋布到大漠南北草原，召庙跟后来的天主教堂与耶稣教堂一样，都给信徒们治疗疾病。这些蒙医除从西藏购买藏药，也需要中原地区的大量药材。所以走外蒙的、新疆的大小“通事行”全由归化城贩药，总销售量之多，和总交易额之大，可以说无法进行统计。

再就归化城跑南北东西四路的商运驼队观察，粗略估算至少有五百顶“房子”，所用的药品亦来自归化城的药行。按每顶帐房由二百峰骆驼和十二个人组成，共合十万峰骆驼和六千多职工。十二个人里边有一个领房子的“把儿头”，一个跟房子的“笔克齐”（先生）和十个拉驼的驼工，其中的那个“笔克齐”担任会计而外，还兼穿牛皮靴的医生，稍微懂得一些医学，会给骆驼扎针灌药。加上随房子行走食宿的货

主掌柜，和“小堂名”的单帮客商，每顶房子实际上有十五、六人。此外象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还有专跑库伦和锡林郭勒盟的“老信车”队“房子”。一个车工赶着十辆牛车，每顶房子的人数和驼队的“房子”差不许多。所有这些终年走草地的旅行者，为了保障来往途中的人畜安全，都得和归化城的药行打交道，购买以备急救的草药和丸散膏丹。

归化城沟通外蒙、新疆，接近乌、伊两盟和阿拉善旗，这些地方都是出产贵重药材的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声誉。外蒙的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以及新疆天山以北，森林的面积很大，几个少数民族仍处于狩猎时代，主要依靠捕捉野兽为生，其中的梅花鹿、马鹿、獐子（麝狗）和羚羊，尤为稀世的珍宝；这些罕见的出产大部为来自归化城“西口商”收走。“西口商”还通过“俄商”和“缠商”（维吾尔族的缠头回回商人），把西伯利亚与天山南路的鹿茸、麝香与羚羊角倒弄到自己手中。他们集中起来带回归化城，然后分散于全国各地，虽然多由“三大号”和其他“店家”操纵，但当地的药行能廉价买到好药，降低制造丸散丹膏的成本，从而提高了药品的质量。至于内蒙的伊克昭盟和阿拉善旗，由于处于毛乌素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地带，完全是黄沙土质，故盛产甘草、苁蓉、锁阳、艮柴胡等药材；乌盟的乌拉山和土旗的大青山品种达二百种以上，常用的亦有一百二十余种，亦是出产黄芪、黄芩、党参等的杂药材产品。此种所谓的“下路货”，都是由当地收购起来运往祁州。在每年两次药王庙会上，和那里由全国各地集中去的所谓“上路货”，同样被各地买客所重视；甘草被河口镇的“甘草码头”把持，其他连同宁夏的枸杞，多由归化城的药行“设场”或派人收

购运到祁州进行交易获利。枸杞又名“红宝”，也叫“红老虎”。此品搞好可以大获利润，否则如色泽变黑销不出去称为被“红老虎”咬手，造成交易亏本。

由于上述的种种客观原因和本身的许多专业功能，在归化城从事药行生意，可以说是买卖兴隆，财源茂盛。只要开设了药铺，就轻易倒闭不了，资金少小做，资金多大做。既可能升级为制造成药的药房，也可进而变为搞批发的大药庄或药店。“通事行”和河口镇的“草店”仅能把持珍贵药材和甘草的交易，不可能代替药行。同时他们也拦不住药行去收购倒卖，所以归化城药行中的多年老字号都非常殷实，正是此地人所说的“阳沟沿的鸭子，皮毛不好肚囊肥”。一九五六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药行定股资金占全市定股资金的五分之一，可见这一“熬不熟煮不烂”的行业，积蓄了多么大的经济力量。

## （二）药行的特殊性和种类

药行和其他行业相比较，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它除了受通常的传统铺规约束，本身有很大的伸缩力。这主要是药行的利润很大，故有“黄金有价药无价”的说法。从事药行买卖，必须保持字号的声誉，和遵照老掌柜们强调“商德”的教导，不能象走江湖“耍把戏”的人用假药骗人。认为“黄金有价药无价”和“除过打劫便是卖药”，可是一捆不太值钱的野草，经过加工炮炼切碎，装入药柜的抽斗里边，用戥子分为小撮之后，便会身价几倍。代销和自制丸散膏丹，也比“四六饭铺对半店”赚钱。一般行业讲究“薄利多销”，在药行里边尤其是做门柜生意，在旧社会很难做到排队买

药，关键在于服务态度的好坏，加工炮制的如何，与同行之间的价格相比权衡掌握，来招引顾客。利润之大是事实，并不象传说的“三天不开市，开市顶三天”。所以药行的经营者，但能安分守己持之以恒，就可日积月累充实资本，往大扩展营业。全国各地的药行都是这般经营作风，而归化城的药行亦不例外，连以后的西药行也是如此性质。

尽管药行的名目很多，有的是三个字号，有的叫药房和堂。实质上是三种类型，可以区分为小规模药铺，中等规模的药房，大规模的药庄或药店。开设药铺是从事药行买卖的起步，这里先谈一谈药铺；药铺通常称堂，致力于门市栏柜的营业，门口挂着膏药丸药和草叶的幌子，里边除了站栏柜的大小伙计，还有“监堂的掌柜”，为了聘请名医进行门诊，称为“坐堂先生”。有些药铺志向很大，一开始就起了三个字号，其实仅仅是药庄和药店的分销处，也在柜前树立“本号自办川广云贵地道生熟药材另整批发”的“通天招牌”。开设药铺比较容易，用不了多大资本，只要租赁几间门面，把药柜安装起来，用瓶瓶盒盒罐罐摆满货架，有一个“懂行人”带着两三个徒弟或外行人就能开业。药斗子装不满都无妨，如果短缺的话，临时去大药庄赊购记在帐上，可以到期结算。所以药铺可大可小，有东家投资的财伙班，也有合股的伙计班，还有家庭班。一但开张就能维持住几个伙计们的生活费用。粗通医道的人，便可“悬壶卖药”。另有略懂医道到乡下行医卖药，身背药包走家串户也是一种类型，亦能度口维生。所以发展成药庄和药店，也不肯放弃药铺栏柜。一般都是由药铺起家，一直保持着当初的药铺堂名，以表示年代古老和声誉远著。如北京的同仁堂、广州的保滋堂、佛山

的仁和堂和归化城的永合堂等。

药铺在旧社会可以说是初级医务人员的培训所，想吃药行这一碗饭，必须先从小药铺开始。一个心灵眼活的学徒，拉过三年“药斗子”，就可把《本草》和许多现成的“汤头”完全背会。那个“坐堂”掌柜，专门按照药方查看抓出的药材，是否相反相畏和妊娠禁忌，告给学徒注意和警惕。至于“坐堂”先生，更是学徒们的不过门师傅，除了观察患者走进药铺，看“坐堂先生”如何“望闻问切”，并且在闲暇的时候，学徒一方面给点烟端茶，一方面也能听到“坐堂先生”许多经验之谈。说话的人无心，听话的人有意，日久天长以后，就积累成临床医疗的宝贵知识。所以住过药铺的人，等于半个先生，他们一旦行医，和祖传的医生均谓之“门里出身”。他们经过“监堂掌柜”的当面指点，和“坐堂先生”的“潜移默化”，除了顾客上门问病求药，能够对答得体，将所需药品卖出，不但不把买主呛走，并受到好评。而且离开药行以后，也能摇起“响环”到土默川和后山一带充当“种花先生”一类的“吃十方”的郎中。家有四五十口，一家人能过温饱生活，不象一般买卖人“下了架子”，那样穷困潦倒难维生计。

从来医药不能分离，尤其医生和药铺更要紧密结合在一起。医生依靠药铺出名，药铺又靠医生牟利。医生到药铺担任“坐堂先生”就等于取得药行的承认。在归化城如果能去大药铺坐堂，声誉就越发提高。药铺有了红医在里边看病，前来抓药的人就会增多。医师问患者收取门诊和出诊的“脉礼”而外，开出处方药铺还给“抽头”，每一处方一至二角算在药价里边。一般的药铺都认识有名的几个医生的笔迹，并且处

方上所列的药品，常用别名来代替，如当归别名文无，川芎别名香果，你家坐堂先生开出的处方，他家一看就说无货，叫到你家去抓，否则跑遍全城也抓不到这几种缺货。此一公开的秘密，按照“行规”都得遵守，这样医师得到小惠，药铺就跟着赚了大钱。

代表药行的中型企业，便是药房。因为药房在前柜之外还有后厂，很可以定名为药坊。药房除了卖药也能制药，由于不论从祁州贩回的“上路货”，还是在本地收回的“下路货”，都是成捆成块的“整件”，必须经过加工切制成薄片和磨成碎末，才能经过“药茶壶”的煎熬，发挥出药材的功效。所以需要经过分门别类的加工，方敢装进药斗子里边出售。例如生地变成熟地，要“遵古炮制”，必须用黄酒九蒸九晒才行；槟榔先得用水泡几十天，泡好放在铡药刀上面，讲究每个要切百八十片。药价已经很贵，如果偷工减料那就良心要受谴责。旧社会的人很迷信因果报应，认为“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对于制药的工序非常认真，不敢弄虚作假。患者不一定完全服用汤剂，有时也要服丸散膏丹，在制造的时候越发得细致而不能马虎。尤其著名药铺药房，都有自己独创的名牌成药，象归化城牛桥广兴泰的夺命回生散；小召半道街永合堂的海马种玉丸和参茸三肾丸等，更得精工研制，恐怕坏了祖传的牌号。制药的时候，“工把子”出身的顶生意掌柜，在一旁监督指导，进行严格验收。学徒粗心大意，雇佣的工人敷衍塞责，都要辞退和开除。住药铺能学习医疗，住药房能掌握技术，在后厂劳动三年，再去前柜站立三年，经五六年实践，才可培养成经营药行的中级业务人员。许多药房多在临近的药材产地设场收购，“出场”

的学徒加“坐场”的掌柜，还能学会采药，如进乌拉山或牧区产地还能学会蒙语。凡在大中型的药房药店出身的人，都比较全面，而且可以当单干的“药贩子”，如领上本钱亦可另开设一号。

经营药庄必须有比较雄厚的资本，才能从事批发业务。有的以药铺药房做基础，有的搞囤积居奇进行“暗房子”交易；有的则在各地广设网点，便利周转调拨；有的药庄东家兼营绸缎、牲畜，资本就越发雄厚。清时归化城的药庄，在本城和土默川批发量很少，因为多数药铺药房，都到祁州和临近的药材产地直接采购。大宗的药材主要依靠有“通事行”的商贩，向外蒙、新疆和乌盟各旗推销，在纯游牧区里边是由召庙的喇嘛“蒙医”治病，到五台山朝拜章嘉活佛的喇嘛，路过归化城游览各召时亦顺便到药庄购药。所以在归化城经营药庄，必须培养一两个能说蒙语和会写藏字的伙计，以接待草原上来的顾客，并在大药包上用藏字批注。搞批发业务过去多半不是现钱交易，在归化城内是“月月骡子四季标”时付款。对于走“外路”和“西路”的客商，春天把货物购走，到冬天回来结算，谓之“对年期”交钱。做这种业务虽然赚取利润较大，但危险性不小，用“西口商埠”的术语来说这就叫做“支垫”，所以归化城的庄口和店家，必须有两三付本钱。庄口和店家用“支垫”扩大业务，也跟着“支垫”常亏老本。遇到大堂名的掌柜死亡或时局发生变乱，就要变成收不回的“丢帐”。故搞批发业务，特别是药庄往往会遇到闪失，不如单纯的药铺，与靠门市交易比较安全稳妥。

归化城的整个药行中，以河南“武安帮”最为严谨，他

们亲连亲友连友所开的字号，除武安人而外，几乎没有外县人。“武安帮”还有一个规矩，就是三年轮班回家时必须先去财东家报到，然后才许回自己家中探亲。财东派帐房先生用好酒好肉招待，他们询问柜事并听取反映，坐在河南武安县就可根据好多人的“汇报”，知道归化城“城柜”上的一切，使“城柜”的当家掌柜受监督约制不敢“坑东杀伙”。所以“武安帮”的药行字号，能维持好几百年而不改组。发现特殊经营人才，不使一槽拴两匹骏马，即给另放本钱，开辟新的分号，所以“联号”和“分号”遍及华北、东北和西北各地。“山西帮”的药行，不论大小多由山西的“杂八处”人组成，如业务搞得好，每三年算帐一次非常隆重，叫做“开股子分红”，给人员提升生意，对小伙计赠送“喜钱”。往往于“三年一算帐”以后，财东把所有顶生意者完全清退，用所谓“大下事”的办法，另选贤能重组机构。被财东“下了号”的掌柜，或是自命不凡的伙计，有些从苦药中看出甜头的资本家，亦能投放本钱另立企业，只要信用好，同行都敢跟共事。所以从老号出来的人，不断开设新号，同时财东的不肖子孙将祖业“踢腾”干净，也把字号让给伙计或者外人继续经营。因而“山西帮”的许多新号，差不多都冠以老号的首字，而不少的老号在“牌匾”上增加了“新记”或者“典记”使人知道来龙去脉，并显示源远流长。

### （三）清朝时的归化城药行

归化城在明朝正德、嘉靖、隆庆三朝（一五〇六年至一五七二年）还没有建立召庙城池，而处于土默特部阿勒坦汗



的大板申时代，仍是从山西北部虏来或投来的汉族军民里边，发现有医病技术的人给蒙古族的封建领主看病治病，并想方设法从右卫杀虎口和偏关水泉营等地往来“掏换”各种需要的药材。自古迄今的动乱中，敌我双方都不虐待被俘的医药人员。蒙古族历代的统治者，对异民族的工匠和有技艺的人都非常重视。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尤其对这些人善于安置与使用。特别是隆庆四年（一五七〇年）阿勒坦汗跟明朝和好，被封为顺义王与山西的“通事行”在杀虎口等处互市。万历九年（一五八一年）三娘子在大召、小召和舍利图召北面修起归化城，不久被封为忠顺夫人，在经济文化上和中原地区进一步沟通交流。不难想象，好几代顺义王的官庭里边，必然有类似“太医”的设置。归化城内和南关一带也会有汉族人开的药铺。到了崇祯五年（一六三二年）受到察哈尔的林丹汗和清太宗皇太极的两次焚烧，把不少建筑破坏，文献对明朝的事情记载很少，故连痕迹也寻找不见，只好用逻辑来推想判断。因此，关于药行在归化城的沿革，只能从清朝定都北京以后谈起。

清初顺治至康熙前期（一六四四至一六九二年）归化城仍保持着明朝时代的格局。南门在现今人民电影院那条街的巷口稍南，九龙湾和四眼井巷以北，包括在叫做“外罗城”的南门瓮城之中。城里边设有土默特部左右两翼都统的衙门和一些蒙古军官家属，从杀虎口搬来的小商小贩在城南关帝庙和大召小召附近设有简陋门面和摆着小摊。据说这一期间即有一个河南武安人，在大召前的玉泉井旁边悬壶行医卖药。起初连药柜都没有，是用一块大布钉在墙上，缝着许多开口的小布袋装药，逐步才安置起药斗子，成为一个行医带

卖药的小药铺。此铺就是一直维持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的同泰永。该号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为归化城最老的一个药铺。“老城”南门的“外罗城”里，有一个山西人开的广德堂，象甘肃凉州(武威)卖“蛤蟆膏”的药房，在柜台上摆铜制青蛙一样，这家的柜台上也摆着一个代表商标的木制梅花小鹿，听老年人们口传，该号和同泰永的成立年代差不多。在白俄军队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农历大年三十攻入库伦那年，驻在归化城的蔡成勋第一师的旅长杨以来，听见京绥路快要修成，为给他们的“河北帮”同乡修盖门面，派兵把“老城”拆改为大北街时，广德堂遭到拆除，以后没有再租门面恢复营业。

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清圣祖玄烨部署征讨“新疆蒙古”噶尔丹汗的战争，派驻山西右玉蒲州八旗劲旅前来加强归化城的城防，强迫六个召的喇嘛配合士兵把“老城”扩大了东西南三面，原先的南门楼变为当中的鼓楼，另在大什字修起新的南门。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清圣祖御驾视征噶尔丹汗，曾驻蹕于归化城的小召这年，从归化城出发的伯爵大将军费扬古指挥的军队，在库伦南边的昭莫多，把噶尔丹汗的军队打跨，统一了内外蒙古，杀虎口的“西口商埠”开始向归化城转移。除了小召的活佛托音二世，因随军出征有功，凭藉“把萨克喇嘛”的权势，把门前的半道街辟为闹市，大召前也变为繁华区域，大召与舍利图召中间，亦发展为大南街。特别是城北的扎达海河上架起一座庆凯桥，河西的北茶坊关帝庙附近，成了皮毛、牲畜店的集中区域，河东清真大寺门前的羊岗子一带，成为店铺栉比的百货商场。就在十八世纪初的康熙后期和雍正年间(一七〇二年

至一七三五年)这一阶段,药行随着其他行业都大大兴旺起来,首先是大同的大兴店在小召前投资开设了永合堂药铺,接着是河南武安县的大财主徐家,在小召两边通往舍利图召的圪料街口路北,也就是后来归化城商务总会斜对面,投资开设了元泰和药庄。并有号称“方百万”的河南武安方家,在大召前的玉泉井东边,投资开设了归化城实力相当雄厚的药庄德泰玉。当光绪年间庆凯桥由现今的天主教堂门前,固定到现今的公共汽车站两边以后,有一个河南的马贩子创立了归化城“北头起”最富有的广兴泰药房。

永合堂在小召前的半道街,足有两个半世纪以上的历史。它的发展是与大盛魁有密切相联的关系,在清末光绪年间,有大盛魁的经理祁县人李顺廷,给投资并进行改组,实力更加雄厚,掌柜们尽成了太原“府十县”人,市面上的声誉越发增强。小召前的街基逐年增高,他的药铺门面从未改修,于是柜台下凹有一米多深,故称为“圪洞子”栏柜。永合堂药铺,后来因制造海马种玉丸和参茸三肾丸驰名全国各地,由药房变为药庄堆栈,共有三处院落,后门开在西边的死胡同里边,这条胡同也就成了永合堂巷,在大青山前和山后,人们都知道归化城有个“圪洞子”栏柜“药铺”,它代售太谷广升普的定坤丹和龟灵集。每丸定坤丹在抗战以前定价五元现洋,可获二成利润,用者必须叫到“圪洞子”栏柜去买,才认为是真货。永合堂在包头发展为水旱码头之后,去包头成立了分号,包头的永合堂,亦执包头药铺药房的牛耳。到民国二十六年有个寿阳掌柜王如山,从永合堂出来,领了祁县乔家大德粮店和天亨永钱庄的本钱,在大南街开设了永龄堂。相继有个外号“杨疯子”的祁县掌柜杨昌

隆和孟锦章，从永合堂出来，靠“人缘”众家给集股投资，在大北街开设了永和堂。“杨疯子”住过大的“班道”，对商界事物多经广见，各行各业办理“柜事”时都请“杨疯子”去当局外的公证人。他能言会道，拳高量雅，到解放前夕，他已上了年纪，还是归化城商界的最活跃人物。这个企业到五二年以后，衰落下来，推让给几个伙计改名为广德堂。

“山西帮”永合堂的声势，既然如此显赫，“河南武安方家”和徐家的元泰和与德泰玉也不简单，其中的德泰玉不是通过“山西帮”的“通事行”往外蒙售药，而是在库伦设有分号，发展恰克图和买卖城等地的生意。外蒙几次事变和封锁边境以后，连归化城有名的“三大号”都把财产丢净先后倒闭。“南北两头起”所有“外路”商号的“城柜”均受到“相与家”与自己派遣的商队牵连而歇业，唯独德泰玉没有亏了“老本”，在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它的资财仍占全药行的三分之一强。河南武安徐家的元泰和是往“西路”发展，在新疆的古城子(奇台县)设有分庄。古城子的元泰和，由于从归化城分支，亦加入该地“山西会馆”的“古丰社”。“古丰社”每年把客死古城子的“山西帮”商人灵柩由骆驼队往归化城运送，先停放到“代州坟”，让尸主去认领，多年来就是由圪料街的元泰和“城柜”经管此事。至于创立牛桥街广兴泰药庄的那个河南“马贩子”。他来到山西口外，一看归化城是个好地方，便把老婆娃娃带出在此安家落户。他光从归化城的同知衙门领了“牙贴”，当了牛桥的“桥牙子”，开始接交往河南贩马的客人。据说牛桥广隆马店巷那个广隆马店，也跟广兴泰药庄很有关连。他由贩马和“跑桥”发财以后，武安县的同乡就叫他开设药铺，他发现“山西帮”跟太谷广升誉有瓜葛

的“广字号”药庄，已经大搞批发业务，便把自己的药铺叫成广兴泰，牌匾上加注了“中州”两字。广兴泰制造的夺命回生散是很有疗效的小儿急救药，为了扩大此药的制造，吸收进好几个由山西来此地居住多年的本地人。广兴泰财东的后代很有开拓精神，据说大少财东并没扔掉“跑桥”的马鞭，仍接纳河南的贩马客人。二少财东主持药庄柜务，派儿子张景鳌去新疆贩药和推销夺命回生散，以后在乌鲁木齐设立了广兴泰分号。总号与分号之间互通信息，并收购倒贩新疆的贵重皮毛药材，于是积累了不少财产，购买了牛桥通至城隍庙街的一片房院。留在归化城这一支，由于钱多的没有花处，在民国年间的老东家象古代的帝王一样，生前就给自己营建葬墓。经常坐着自备轿车到攸攸板申附近的祖坟上查看，为了让工人把营生做好，用“烧麦”和“草纸糕”犒劳石匠。在广兴泰栏柜的隔壁还有一个名叫德义和的小药铺，门面和广兴泰的牌匾一样陈旧，和广兴泰并列在一起好几百年，我在解放前没有打听，现在已经无从调查，一定有特殊吸引顾客和“相与”的地方，这也是归化城药行在清一代的一个奇迹。

清朝雍正年间和乾隆前期，外蒙及新疆都置于有效管辖区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年），土默特左右两翼合并为一旗，由绥远城将军兼代了从前的两个蒙族都统，全旗事务由一个满族副都统管辖。从此归化城的老城以内，开始有了商店和满族住户。继二十六年由杀虎关分支出归化关，在城内先后设立了收税大厅和皮市与“驼桥”以后，原先“山西帮”做“暗房子”生意的“广字号”药庄，也在老城中修盖起门市栏柜。最早是广仁号，其次是广恒号和广生号，称为“三大广字号”药庄。后来广恒号的大同籍掌柜刘鹤龄

出来，开了广元恒，成了“四大广字号”。主要是向“通事行”批发运往外蒙新疆的大宗药材。光绪年间（一八七六年至一九〇三年）广仁号的财东祁县人王士安，把按“股子”开出的红利购买了公主府的好几顷“四村水地”，成了城东黑沙图村的大地主。广恒号的资本为四大广字号之冠，自己组织有往外蒙和新疆运货的驼队。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以后西北回民起义，战争波及前后两营和库伦，广恒号的财产损失较少，当家掌柜胡载之认为是“八洞神仙”中的吕洞宾在暗中保佑。从此往小收缩，不再养驼，把原先在大盛魁东北饲养骆驼的自置场院，许愿修建了吕祖庙，并盖起了戏台。从此以后，大东街通往老龙滩（现人民公园）的那条巷子，就叫成了吕祖庙街。其后广恒号的二三掌柜大同人李玺和平定州人张映昌，反对当家掌柜胡载之和财东消极保守，两个人继续出来用五千两本钱，在楼儿巷南（现冷饮食品门市部）开了和合堂药铺。由于是广恒号出来的人，在街面上周转的非常活跃。在和合堂以前，这里曾有过一个于道光年间从太原新南门外移来的半半堂，意思是一半行善一半积德，门外吊着一个煎药砂壶，栽着一根雕刻着药葫芦的石椿，椿上凿有四个窟窿，以备抓药的乡下人拴系毛驴，所收药费相当低廉。创业者为阳曲县人李凤林，光绪年间歇业之后，房主把地盘租给和合堂，现今在小北街行医的李诚隆，便是半半堂的后代。广生号的情况，只知出来的人，在北门外的羊岗子，开设了春林药房。广元恒的财主兼“当家”掌柜，在光绪年间，传到他儿子刘建手里，由于在外蒙丢帐而欠祁州药栈的钱需要归还，把所置的栏柜和仓库卖掉，也移到北门外羊岗子。原在北门里的地址，先改为“小班馆子”荣生元，后

又改为祥源通绸缎庄，即现今呼和浩特第一门市部那个地方。仓库占亚细亚煤油公司，目前成电影院街东口路北的旅馆。

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新城（绥远城）建成以后，在鼓楼南街就有了礼仁堂药铺，不悉是山西人还是河南人所开。该号发展以后，创制出一种名叫“九转胆南星”的名药，质量很高，在全国打开销路，每年运到祁州以后有多少能卖多少。尤其该号跟满族人打交道，故与将军衙门的“户司正堂”和“兵司正堂”以及“葛兰达”（协领）们，发生了密切关系；清朝时有一年发生时疫，将军衙门通令归绥道五厅（县）的人民专用该号的汤剂预防传染，越发赚了一笔大钱。后来财东的后代吸食鸦片，守不住祖业，将财股抽走，伙计们接办改为聚仁堂后，因业务不多，迁到南头占着一间门脸的小药铺，维持了几年便倒闭了。原巨仁堂地址，因房东凉城人刘和义有医学才能，解放前接办开设了保元堂。除此而外在鼓楼东南拐角有一个不著名的小药铺是大同人所开，跟绥远厅（又称“粮饷府”）的大同籍“掌案”（等于科长）们来往，此一小药铺歇业后，由满族人姓温的开了普太和药铺。至于托克托县和河口镇的药铺药房和药庄，在托城为弓家的仁和堂，在河口为福恒益。福恒益于民国十五年由掌柜阎秉全搬到后套陕坝镇后，河口即没有了药铺。从福恒益出来的另一掌柜池真，在托城开设了万庆堂。

清初康熙年间，归化城的药庄家数很少，从民国年间前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〇年）由原来的行社改为同业公会，“药行社”的傢具都送到小东街关帝庙的“醇厚社”代为保管。从这一现实看，药行和纸马栏柜、绸缎布铺以及干果摊贩，都归最早的总行社“醇厚社”领导。雍正年间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津，号

召归化城商人，仿照京都成立十二行社，并成立总领导机构“乡耆府”后，药行才慢慢由“醇厚社”分出。在舍利图召的三贤庙旁边，大南街东升店后门以东先盖一个很小的药王庙。新城绥远城建成后，为了迎接北京的六部和理藩院的大官与山西巡抚，在南关（现内蒙医院一带）建立一座新旧两城最雄伟的关帝庙作为茶坊。庙前戏楼，在新旧两城的戏楼中，也居首位。“药行社”嫌旧庙简陋，便在新城南关关帝庙背后，盖了与关帝庙同样高大的新药王庙，连同关帝庙前的观音庙，树立着同样高的六条大旗杆，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圣诞正日前后，请最好的戏班，借关帝庙最讲究的戏台唱戏三天，以显示药行肥的往出流油的气派。

#### （四）民国时的归化城药行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以前的归化城的药行，基本上仍维持着清朝时的状态。其实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岁次辛丑）“辛丑条约”订立，归化城列为对外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这里的各行各业已经受到天津洋行买办的威胁，不过人们尚未察觉。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称帝宣布独立，派兵驱逐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时，打死归化城“三大号”中元盛德的店伙八十余人。接着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四月派兵南下侵略，一度占领百灵庙滂江，几乎攻入归化城和张家口。先后给敲了两次警钟，财迷心窍的各行各业商人仍不醒悟。药行的药铺、药店、药房和药庄，还是往大发展。我住的那个 大南街广巨药房，就是在民国二年三月时局吃紧的情况下，由牛桥街广兴泰药庄出来的两个本城人冯通与牛尚发，并向祁县的刘福仁招股集资开设。冯通的二哥冯发从隆昌洋行出来，也给垫入资



本，后来冯氏“三乐堂”就成了广巨药房的独家财东。该号多年来以经销广东的各种丸散膏丹较为驰名。到日伪时期还苦心钻研出一种八仙戒烟丸，比林则徐配方的“林文公戒烟丸”还有疗效，故销量很大，业务颇为活跃，人们称“冯家药铺”。至于老城内的四大“广字号”依然是叫小伙计们用“二人杠子”抬着骆驼装载的整件货往北沙梁的玉盛德、巨盛德和富盛德“三大通事”等家发运。当广巨药房成立时，归化城的药行，除了上述的而外，大西街龙门店巷口对面，有一个姓杜的开的同和堂药铺。小南街路东有忻县人开的聚宝兴，大召前路北后来变成吕公道刀剪铺的那个地方，有大同人“展包李”开的药铺。通顺街有忻县崞县人开的太和堂与德和堂，北门外礼拜寺巷还有福昌和药庄，“羊岗子”街由广源恒后变为永春堂等等。可以说药行的“幌子”挂遍了归化城的各个角落，须知那时的归化城，仅仅是一个只有五六万人口的小城市。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即马福祥接任绥远都统那一年，外蒙和归化城都受到重大冲击，对于原先的各行来说，可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年的二月七日夜晚（春节除夕），驻守库伦的“皖军”高在田的军队，受日本支持的白俄恩琴包围，仓惶从库伦东西两城撤退，除逃往恰克图的商民，经苏联红军保护，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回到内地，呆在库伦不动和随“皖军”经乌里雅苏台往包头跑的商民，几乎全被库伦街上的本地流氓乘火打劫屠杀，或者在雪深三尺的四、五千里途中冻饿而死。同治年间新疆回民继陕甘回民起事，攻破乌里雅苏台，并一度包围科布多和库伦，归化城的商号受到的损失，要比此次外蒙事变惨重十倍。但左宗棠的军队终于把西北平定，将俄兵从伊犁赶走，故归化城的药行又继续发

达了半个世纪，并遇到光绪年间的空前繁荣。可是从这次库伦发生暴乱，即从民国十年以后，便每况愈下。首先是老城里的“三大广字号”药庄，随着城外的“三大号”与“三大通事”相继歇业，其他各家也远不如先前。因药行有本小利大的特殊性，多数尚能支撑住门面。先是归化城的“乡耆府”于民国成立后改为商务总会，从三贤庙迁到圪料街，民国三年三贤庙成立了女子小学堂，将药行的旧庙拆除，把神像送到新城南关的新庙保存。到民国九年蔡成勋拆除新城南关的庙宇时，药行的新庙也被夷为平地。药王爷爷没有安置的地方，就近搬到新城东门外奶奶庙的东房寄宿，和子孙娘娘做了伙伴。于是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的唱戏，改为四月十八前去烧香敬纸。从这一点上来看，也象征出归化城原有药行的日趋没落。

京绥铁路也是在民国十年修成，当这年五月一日第一列客车开近归绥车站，东来的“河北帮”各行各业便开始占领了归化城的大北街和大南街。他们事先用高价购买地皮，或向召庙租赁房屋，把山西式的古老店铺，改建成北京和天津型的“洋式样”门面。在新兴的大北街上就出现了南山堂，定州（距祁州六十里）谢家济仁堂分号怀仁堂，相继开设了北京同仁堂财东乐家老辅的宏达堂，以及“东路人”军医官芦耀华所经营的达生堂。这五家都叫做“京药庄”，门柜全是金碧辉煌，亮晶晶地放出异彩，后来还在大什字路西有从济仁堂出来的伙计陈子源、罗静庵开设了一家庆春堂，原先山西河南老药铺栏柜，就越显得黯然无光。这些“京药铺”非常注重装璜，把珍贵药材都用锦匣放入玻璃橱窗，象大召前卖膏药的“王一贴”，将老虎标本陈列在柜上，他们卖汤剂不是

混包在一起，而是每一位子都包成小包，附有按《本草纲要》所印的图纸，然后再包成大包出售，用印工精致的大包装纸包好，捎带一个竹圈沙布过滤器，这样便于按处方检查药品，并表示热心为患者服务。尤其是济仁堂老掌柜谢介卿，特别重视宣传，他出钱雇人用铁皮空心印板在大青山前后的各个农村中大刷广告。一出凉城的西沟门，进入土默川以后，就看见每个村庄的大庙和戏台墙上，都印着“济仁堂京药庄开设归化城大北街路西”的醒目黑字。在人们的印象中，渐渐模糊了小召前的“圪洞药铺”永合堂。

谢介卿原在祁州行医，二儿子谢重武住过北京的济仁堂，出来后他在火车未通以前就来到了归化城。先在小东街开设了济仁堂，依靠父亲看病的名誉，以北京“京药庄”的经营做法使业务扩大起来。后来硬出大价租到大什字附近回民万胜永酱牛肉铺隔壁那个地方，不多几年又分支出怀仁堂。谢家共有五个儿子，老在原籍务农，二儿子主持济仁堂的全盘，三儿子经管怀仁堂，四儿子到包头西前街也创立了济仁堂，因加宽马路该号建筑被拆后，回到城柜专门担任“跑外”。我们由济仁堂一家，就可以看见“河北帮”的“京药庄”势不可挡，使得“山西帮”和“河南帮”的老药铺药庄，感到后来居上者的咄咄逼人，于是也注意了修理门面，并改进经营做法，把混包抓药改为分包另装的小包抓药，附上了每个品种的图案小票。这一时期归化城老药行出来的伙计，在火车站有大同人开设的行医代卖药的仁育堂和武安人开设的家庭户益生药房，通顺街继太和堂、德和堂之后，出现了本地的儒医王子良开的益元药房。在北门外牛桥街续有永和堂出来的人，与广元恒合作，重新改组开设了

永春堂药庄，兼售蒙药，并制作蒙药丸散，接待牧区来的蒙医大夫，将蒙药的业务继承下来，一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被日寇占领以后，在小召前牌楼东出现了异军突起的河南“武安帮”的春和玉。该号在全国各地有好多分号，完全按京药庄的方式经营管理，在京绥线的张家口、大同、集宁、归绥、包头等城镇遍设网点。归绥的春和玉，除了在小召前企图和“山西帮”的永合堂抗衡，并在大北街与河北帮的济仁堂竞赛，南山堂移到火车站，缩小成一间门面的柜台，春和玉的分号便占了原先南山堂的那个地方。

京绥线通车前后，归化城又有了西医和他们开设的共和、首善、清晓、协和、塞北等小型医院。设备完善和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公教医院，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就已建成。这些西医和医院，不仅顶了从前的药铺“坐堂先生”，而且伴随着京药庄，出现了西药房。西药经过进步的科学研究，有好多都超过了中药用成方炮炼配制的丸散膏丹。那时花柳病特别流行，军政界和浪荡子弟患者尤多，只要打几针德国贝尔药厂出产的狮牌“六〇六”，可以说立杆见影药到病除。每针“六〇六”的售价，和每丸定坤丹差不多。其他西药用“洋码”吓人，在那时开西药房比中药铺还要赚钱。有包头人刘慎行和刘慎身，因为信耶稣在大西街开设了新民大药房，弟兄二人均有西医技术，故行医兼售西药，业务可以说蒸蒸日上，没有几年功夫，便在大北街东马道巷出资创建了礼拜堂。除新民大药房外，在归化城先出售西药的，是“河北帮”在大北街开设的中西大药房（包头后套亦有分号），相继开设的还有美利斯、利民、纯德、中美等家。此外在小东街的西瀛药房，出售平热散和一粒丹等，后来有本地

的中医朱英，在小南街开设吉林药房，原为中药铺，以后也兼售西药。其他许多中药铺，此时亦兼售阿斯匹林、镇痛片和磺胺（马达片）一类的西药。并且南方的中成药开始致力于广告和包装，象缅甸华侨胡文虎永安堂的万金油与八卦丹，以及鹤鹑菜和其他名牌“西式药”也成了中药铺的畅销商品。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以前，中国民族资本家和代表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家之间，斗争的非常剧烈，归化城的“西口商埠”中的“山西帮”和河北帮互相倾轧的特别厉害。可是在沦陷于日寇八年，和被国民党继续统治四年期间，不论是“山西帮”和“河北帮”，都遭了倒霉的厄运。拿药行来说，由于日本人不知底细，没有象对皮毛、粮食、百货那样进行组合统治。京绥路虽没中断，但是以南口车站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国度”。东面是“华北政务委员会”所辖地区，西面是“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行政范围，前者周使“联合准备银行”钞，后者周使“蒙疆银行”票，由于币值不同，从银行和邮局都不能汇兑，只能通过两地的客商私自兑换。华北最大的药材集散地，在京汉铁路定县东六十里的祁州，那一带是八路军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日寇经常进行扫荡，故祁州的大药栈多转移到了天津。那时必须有华北“经济监视署”的许可证明，才能由铁路把药材运往“蒙疆地区”，迫使许多商客买通张家口的日商“三昌洋行”，先把商品运到张家口的栈房，然后再起票重装火车运回“厚和浩特”，也要取得许可证或以日本洋行的名义，才能办通全部运货手续。这样非一般药行的“老古板人”所能做到，所以就过去的规矩打乱，造成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同时出现了提包背兜的跑单帮药贩子，如北京德寿堂的牛黄解毒丸、雅

观斋的保赤万应散、太谷广升誉与广升远的定坤丹和龟灵集、广州广芝馆和保滋堂的名牌成药，全成了鱼目混珠的假货。

日寇投降，国民党统治下的那四年，物价一日三涨，卖出药品收回“纸票子”，当天就得换成布匹和米面、砖茶等，加之国民党反动派抓兵，小伙计都得到军政文教机关“顶名”，所有行业都不好经营，字号纷纷倒闭，药行经此跌打损伤，也已外强中干。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已经气息奄奄。归绥新旧两城的山西、河南、河北、本地四大帮，尚保存下二十五家。归化城的“药行社”，于抗日战争以前改为“中药同业公会”后，先在大南街大同源军衣庄的楼上办公，到日伪时期移到小召院内再没有移动。当时由济仁堂的帐房先生王裕民兼任文书，到国民党回来后，行业组织为理监事，设有理事长一人、理事三人、监事一人，这些人由行业推选均为兼职，日常事务由文书办理。

### （五）归绥解放前的中医师

归化城曾经是商务繁盛之区，也为人才荟萃之地，加之当地药行发达，各方流寓寄居者很多，所以在清朝统治期间，可以说世代有名医。在咸丰、同治以前，已无法查考，光绪以后尚能知道一些梗概。本世纪初的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前，据说最驰名的为“沙锅子王先生”和“展包儿李先生”。“沙锅王”系寿阳人，是从永合堂出来开设永龄堂的王如山掌柜的父亲，因为行医发财成了大召前德泰玉药庄的房东。“展包儿李”系大同人，是从广恒号出来开设和合堂的李玺掌柜的哥哥，他在大召西仓东口开的药铺，民国初歇业。“沙锅子王”和“展包儿李”都是门里

出身。“沙锅子王”非常胆大，敢加大药剂，故用沙锅煎药，据说用一两服即可把病治好。“展包儿李”除了善于切脉开方，尤精于针灸，把针包展开即可手到病除，遂有“展包儿李”的外号。

清朝时给官人及其眷属看病的，老百姓尊称为“太医”，他们捐有顶戴，出门可以坐轿来往新旧两城七大衙门，有的乘“红拖呢”轿车，以区别乘“绿拖呢”或“蓝拖呢”轿车的庶民百姓。属于这一方面的医师，有广仁号财东并在里边坐堂的祁县人王士安，不仅医技高超，本人亦善保养身体，满面红光活了八十多岁，民国初年才无疾而亡。此外在五塔寺召附近的新召滩，还有一个乳名“二毛”的张先生，当时亦负盛誉。当然这些医师是给文武官吏和富户巨商服务，普通人邀请不起，不用说酬谢先生，连轿夫和车夫都无法支应。光绪初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为了预防天花，在太原招考秀才，成立了施种牛痘的技术人员培训所。归绥道台衙门亦设置了牛痘局，为内蒙西部最早的卫生防治机关。由左云县人赵赞和他的儿子赵子魁相继担任局长，直到民国以后结束。赵赞兄弟六人都是秀才，人们称他为赵四先生，赵四先生于每年春天给土默川各村儿童施种牛痘，种痘完毕，也被衙门和商号请去看病。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有变法维新的思想萌芽，他的侄儿子赵子和后来加入同盟会，他给贫苦人家看病不要脉礼，只收一包当时不值钱的“九六饽饽”。

民国以后归绥新旧两城大都是住过药铺的出来行医，人们知道根底，故容易成为“红医”。如沦陷期间从小南街巨宝兴住药铺出来，在广聚药房坐堂的忻州人宿华庭，和在牛

桥街永春堂坐堂主治小儿科的大同人朱静川，还有在礼拜寺巷福长和药铺坐堂的黄惠卿大夫等都是人们交口赞誉的医生。由于民国元年张绍曾的“二十镇”与蔡成勋的“第一师”在归绥先后驻守，有几个医官看见归绥很好，部队开发时没有跟随，留下来给人看病。他们原籍直鲁豫三省，并懂得用中西结合的办法施诊，很受新兴起的“河北帮”商号捧敬，当地人也就信赖起来。在新城有著名的冯书忱大夫和“老方先生”与“小方先生”。冯书忱通称冯医官，后来在绥远都统署和省政府的各厅处中有很高的威信，还在绥远中山学院和农科职业学校担任校医。老少两位方先生，也是从部队下来，旧城的商民有“非到新城把方先生父子请来，病人方能得救”的说法。在旧城活跃的有两个芦先生，都参加过“第一师”，芦耀华开了达生堂京药庄，亲自在里边坐堂，芦子裔在小西街翠花宫巷巷口门诊，四合头砖瓦院中挂满了油漆和绸缎牌匾。后来冯玉祥的“国民军”，李守信的“蒙古军”和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均有军医官改为中医师，在地方上行医看病。象解放后任过呼市郊区医院院长的邢鸿图，为河北蔚县人，他就是从“国民军”下来的，曾在席勒图召西边的东鞋袜巷开过黎明药房。

抗日战争前后，归绥还涌现出好几个有名的儒医，其中包括王子良、安兆麟、刘和义以及张昌山等。王子良出身于归化城“两家半人家”人家中，祖居大厅巷。在归化关“顶户部衙门”的王氏“五福堂”（两家人家指大盛魁和“通事行”的“集锦社”），他从古书香院考中秀才，以后担任塾师，在大驼商胡老五家中设馆时，即刻苦钻研医书，经过多年学习后，在通顺街开设益元药房行医。他处方稳健，



很受归绥老一代地方士绅的推崇。古香书院改为归绥中学堂，在乙班和丙班中又出了两个儒医，即安兆麟和刘和义。安兆麟字玉山，城东朱亥村人，医学造诣很深，他曾参加过《绥远通志》撰搞，其中叙述当地药物的《野产》篇，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很有学术价值。刘和义是凉城人，大学毕业后，曾任过包头和绥远第二中学校长，其后他以新城聚仁堂的房东，把聚仁堂改组为保元堂并任坐堂先生。新城满族人很信任他，称他为“众家生佛”，现刘老年过九旬，身体仍然健康。文革时刘老写了一本有关儿科的专著，结果把原稿丢失，为了弥补一些损失，现仍用发抖的手继续补写。还有山西右玉杀虎口世代书香家中出身的张品山，也是归绥中学的学生，三十年代他从绥中毕业，到北京给大名医施今墨为徒，他敢于用大剂量治病。和当年的“沙锅子王”一样，在好多医生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情势下，他医治了不少棘手疾病，故名声远扬，门庭若市。惜染上吸毒嗜好，由鸦片升级为料面，没有活到解放，不到五十岁即行死去。

归化城东三富村的正骨李家，不仅在土默川远近闻名，他家的接骨药，在民国十七年前还远销外蒙新疆。李家原籍山西祁县，来到三富村已经八代，起初以祖传秘方配售丸药。民国年间到了六代李枝手里，更集中了正骨技术的大成。十年动乱期间，他被赶回八拜公社三富大队老家。因他的医疗技术已成权威，所以患者都跟了前去，一时八拜公社和三富大队，都开了正骨医院。现在李家有三代近二十人担任正骨医师，成了内蒙地区的“正骨世家”。在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亦世代有名医，托城弓家仁和堂有个弓子丙，他用一付桂枝汤加减，解放前在东川后套，治好成千上万的伤病。

患者。归化城万明堂李家的兽医，在“北头起”的羊马店，城周围的羊驼户，以及郊区的农村中，颇有盛名。万明堂的徒弟郑清泉，曾任傅作义长官部的中校兽医官，解放后被内蒙农学院聘为讲师。万明堂的后代李安帮，接受了祖先的衣钵，现为呼市兽疫防治站站长和内蒙政协委员。此外还有所谓的杂医，但亦能治疗百病，如号兵出身的湖南人朱葵，除三个儿子是归绥的西医，本人亦善于医治疔症。在四照井巷皮坊中，当过篾匠的左云人钱威，在永和堂坐堂主治儿科很有把握。从清朝到民国，归化城还有一个经常治小儿病的邓老奶奶，不是这个老奶奶活了好几百岁，而是媳妇接替婆婆，代代相传，为小儿医病。解放以后，普建了妇幼保健站，邓老奶奶才从此传脱。

呼和浩特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少数民族的中医亦大有人在。象解放前蒙古族在归绥南区行医的云塔木格“格先生”，现任白庙子卫生院院长。回民中有在归绥中学担任多年“号房头”后来看病的麻勋先生，新城满族人中有在职业学校管理过图书后来行医的于文华大夫等。他们的医学水平都不在汉族中医以下，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多叙述。旧社会的医生是替有权有钱的人效劳的，尤其是名医，很能赚钱，人们称之为“袖统黄金”。除脉礼而外，四大节的馈送亦多，由于赚钱容易，生活优裕，一但疏于家教就可能导致子孙们馋吃懒做，最后腐化堕落。有好多名医有鉴于此，常告诫后代和晚辈，注重节约，甚至将医术代代传授下来。安兆麟大夫的儿子安启元，便是子承父业，学得医术，为郊区的农民病患者辛勤服务。还有许多名医，在授徒时，重视医德教育，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对贫苦病人施医舍药，普救患

者，为广大群众所称誉。



## 归绥市的粮店行业

赵 萃

公元一九三六年我刚十七岁，就来归绥进粮店当了小小。那时，归绥市有十三家粮店。天荣店（南柴火市街现粮食加工厂）、西圣店（小召前半道街现度量衡厂）、德兴店（上栅子街现土产公司）三家开业最早。其中天荣店据说已有二百多年历史，西圣店、德兴店次之，其他九家则都是民国前后才开业的。

大德长店（西五十家街现木器厂）原在武川县开设，后因土匪刁抢不能经营而迁来归绥。该店与德兴店都是山西祁县乔家的独资。提起祁县乔家，这是明清两代全国有名的大财主，慈禧太后为募集国帑邀请全国富户入宫赴宴，请贴上就有乔家。因此大德长和德兴店，赚下银子留作厚成，赔了由乔家往来拨兑，在归绥市上，信誉很高。

源丰店（西五十家街路北）的财东是阎锡山。经理李春美，山西省定襄县人，他曾给阎锡山赶过轿车子，人们背后都叫他“老车官”。李春美自当经理后，也摆起派头，坐上轿车，进出官府，和一些达官贵人交往上了。李春美当经理不在行，从西圣店请了一位大掌柜的，名叫李成。源丰店的经营范围大，京绥铁路沿线分设了好几处支店，而李成这位大掌柜却胆子小，生怕亏了本交待不了东家，成天愁眉苦脸，索性就愁死了。李春美又从德丰店请来了一位二掌柜的，名

叫杜连汉，是当地坝口子村人。杜连汉为人胸怀宽阔，精明能干，还练就一手好算盘，在十二家粮店里，是拔尖的顶头柜先生。他在源丰店还培养出好几位能干的先生来，出名的有“郝、谭、宁、范、周”五位，即郝锡庚、谭喜、宁保安、范玉树、周作孝。此外还有一位石先生，名石昆，字仲玉，脑筋特别灵敏。晚上结帐时，他偶因事离开帐桌，报帐先生不用停歇，继续报数，他能将漏了的十几个数随听随在“脑瓜”里加在一起，分厘不差地补上，人称他是“一掌经”，真能和现在的电子计算机相比。这家粮店，因带有官方性质，于一九三七年日寇占领归绥后倒闭了。

义丰店（半道街现晋剧团北）是本地贺秉温、翟世华、德恒永和公喇嘛村义和泉共同合资经营。贺秉温、翟世华都是本市的名人物。贺秉温向粮业投资，是为了竞选商务会长，好作跳板再往上爬。义丰店原来的老掌柜是周达德，后来店名改为义丰和店，当家掌柜换为张殿兰（山西崞县人），二掌柜是张汉臣，三掌柜张懋廉（山西定襄县人）。斗头儿王来治去世后，是杨道岐，全店一百人左右，有柜房、斗房、大厨房、库房、下夜房、磨房、看圈房等，规模不小。

西圣店（小召前半道街现度量衡厂）股东是崞县张家。老掌柜是康如松，二掌柜是尹珍，三掌柜是金效宽。斗头儿是段梅。

裕源公店（南柴火市街小学校对门），财东是山西定襄县杨九旭。该店大门盖得挺神气，本行业的人们给编了个顺口溜：“裕源公，报的凶，大门盖下警察厅，掌柜的是阎铨，郭鸷，于庆龙，后边还跟了个拐喜红（姓张，名正礼，乳名喜红，是斗房大头儿）”。

源丰店（南柴火市现呼南袜厂厂址）是山西忻县聚洪钧的独资，德丰店（平遥街警团团团址）的财东是街县城关麻金忠，天荣店（南柴火市现粮食加工厂）的财东是山西五台县杨文康，兴和店（东五十家街路南现土产总局货栈）的财东是山西忻县部落村胡小铺，天源益店（通顺东街现金属结构厂），此外还有丰圣店（通顺南街）财东是大同人，因蹶行情没猜准，开业不久即倒闭，人伙解散。

粮店的经理是资方的全权代表，二掌柜协助经理办事。对外一切经营交易，对内安排使用财会人员、上街人员，以及掌握市场粮食动态和粮价信息，对经营作出决策，这都是经理和二掌柜的权责。出名的经理，不仅有源丰店的杜连汉，还有义丰店的张达德，他有一套用人的本事，从他手里培养出不少人才，以后担当了别的粮店经理，尤其是他能以德待人，伺候他的人多么累也情愿，对他都有口皆碑，没有说他懒的。

粮店的斗头儿，是粮店半扇大门，粮店经营的好坏，一半在于斗头儿的能量，卖粮车来多来少，买卖兴隆与否，和斗头儿有没有本事，紧密相关。大德店的粮头张三，把武川的粮户迷拢住了，这个粮圪洞的柴粮车，多到大德店来，大德店跟张三沾了光。粮头儿每当粮车上市的时候，便忙的不得了，站在院当中，哪一车粮都由他检定质量，不用仪器化验，就凭眼、嘴、手三相硬功夫，便可评定，很有把握。譬如看小麦含粉量多少，只用牙齿咬开，就知每斗能磨几斤面粉，十分准确。如小麦咬开是青茬，那便是压青地产的。看莠麦是用指甲往开掐，成熟的莠麦一掐便开，含粉饱满，出成率高；不成熟的，掐后扁而不开，这样的莠麦，皮厚面少。

看糠，谷、黍类粮食，捏一撮放在手心里，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去推，将壳推脱后，看米粒是否饱满，就知道每斗能出几斤米。手指没有功夫的人推不开，这也是一种技术。

上市的粮食，很大一部分要卖给陆陈行，陆陈行的掌柜们来选购粮食，粮头就给仲裁作价。凡是定了价的粮食，有了买主，马上过斗，店院里经常有七、八个过斗的。过斗的时候，摸斗的要用唱声数斗数。各唱各的调儿，各计各的数，真是热闹极了。在兴和店有两位会唱的摸斗小伙子，一个叫李贵兰，一个叫李存巨。有时两人同时摸斗，李贵兰唱山西梆子的音调，学的是十三旦的弯子，他在店院过斗唱数，柜房里听的十分好听，真象十三旦唱的一样。李存巨又比李贵兰会唱，他有时唱大戏的声调，有时也唱民间小调，当他摸斗摸得紧张的时候，速度加快了，唱声也缩短了，递斗换数时，又用刁小弯的声调，嘴更巧，调子更好听。有时在过斗的车跟前，围了好多人听他唱数，只顾听他的唱声，把自己的粮食数量也忘了。

粮头儿每天晚上要到柜上滤帐，防止差错，这也得有硬功夫。兴和店的站院粮头儿赵景龙，像貌丑陋，擦牙、板脸、矮个儿，但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兴和店的柴粮车又多，每当冬季，上市粮车在店院里屯的三层三圈。从早晨开始过斗，中午吃饭不过30分钟，吃完不能休息，马上再过，一直过到晚六点钟才停斗。一天过四、五百石粮食，逐日如此。赵景龙头儿，每晚到柜上滤帐的时候，能把一天粮车所装的粮食品名、数量和每个粮户的姓名，都回忆起来，万一有点差错，一眼就能盯出来，真是过目不忘。这正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粮店上街的人员，是经理的耳目和帮手。每天打发他们到市面上推销些粮食和油料，同时，了解市场的物价变化，逐日回来向经理、粮头汇报，所以粮店对商品物价信息特别灵通。粮店上街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十分辛苦，上街做买卖都是步行，一天跑路没数，尤其是粮食起了行情的时候，慢些的自行车也追不上去，由新城到旧城，从旧城到新城十里之遥，一天数趟往返，走动如风，不卷不困。大德长店上街的赵尔禄，年轻精干，就是出了名的机灵鬼兼飞毛腿。

粮店记帐先生，和别的行道不同，没有过硬的功夫，担当不了粮食的记帐任务。一过八月十五中秋节，柴粮车要开始上市，店掌柜就得安排帐桌上的记帐先生。冬季收粮时期的记帐人员，需要三把好手。第一把是顶头柜的大先生，他是复核付款的总会计，登记日记帐一要准，二要快，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顶风”，即要有识别骗子手的眼力，如有骗子手冒充卖粮户来领钱，他能用几句诈语就把骗子揭穿，防止冒名骗领。第二把手是写小帐的先生。小帐以柴粮户立户，每个柴粮户应领粮款、零星支取、买货吃饭开支、支后余额等项一笔笔都得记清算准。冬季业务忙的时候，使钱的粮户挤在一起，记小帐的一笔一笔记，忙得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这就看他本领如何了。如义丰店李茂才先生写小帐，他的记忆力特别强。过去人们说，数字好记，姓名难想。因为取钱的人太多，站柜先生一声接一声的直喊，如果先记姓名，误过钱数就容易出错。所以记帐的方法是先记支取款额，然后再补录姓名。李茂才先生能够记十户支款额而后补录十个户头的姓名，一字不错。一九三六年他才二十五岁，到晚六点结帐，很快就准确地结清当天的收入、支出及



金额，和店柜的结存数对照完全相符，分文不差。吃完晚饭还不误到财神殿院看戏。第三把手是写粮帐的先生。粮行写粮帐最劳碌、最费脑筋。过去粮店过斗，没有收粮手续，摸斗的凭记忆力，过完数上柜台报帐。报帐人在窗外报，写帐先生屋内接应，报完写帐要一季不差。每当冬季，摸斗的人多，记粮帐的只有一人，不管一天集多少粮食，就只他一人执笔，当摸斗的过完斗以后，都来报帐，有的好几个摸斗的挤在一起报，粮食的品种、价格、卖主的姓名等都得记清。一天从早到晚不能离岗位，连尿尿的功夫也没有。有些年轻的先生，因此而得痔疮少亡，呜呼哀哉。但是从这个坚强的岗位上，也锻炼出不少人才。据说，兴和店开市的那天（新成立的字号开业，叫开市）集粮车特别多，店院里放不下，后来的粮车都停在新召滩（即五塔寺召的前边）。当时本行记粮帐的老先生们，虽有能力，但无精力，都不敢担任。这时该店有一位刚培养写流水的小后生，名叫杨俊亭，他出于年轻，有勇气，便毛遂自荐，愿充此任。粮行的老规矩是开市这天，十二家粮店的掌柜、先生、摸斗、粮头儿都要来支援工作，这时，有些老掌柜们就有些犹心。因写粮帐不是玩的，一但拿不下来，中途失败，再请别人，那就耽误大事了，于是犹豫不决，但也有知根的人说，杨俊亭虽然年轻，可是写算熟练自如，不妨试试，万一拿不下来，有那么多老先生也能接应胜任。最后还是让杨俊亭去上阵。杨俊亭不但珠算熟练，还有一笔飞写，这一天兴和店集了一千六百石粮食，在粮店行业是有史以来最高记录。不知小杨写了多少字，用了多少墨，光毛笔就磨秃了十几支，这下轰动了市面。据说第二年就领了一副本钱（资金），在西五十家街开

设了一家粮店——阜丰店。

源丰店的周作孝先生也是著名写粮帐的能手。他原是德丰店的小小，后跟杜连汉老先生到了源丰粮店。他也是一笔飞写，拿起笔来，笔不离帐，帐不离笔，写下的字迹，就象一条线从头至尾连在一起，十分流利。一天柴四、五百石粮食，如同玩耍一样。那么多的数字，他一点也不见的忙。还有一位名弓守先，是义丰店的年轻的先生。此人多才、多艺，不仅写粮帐，站头柜也是一把好手，而且爱好学习古典文学、历史，知识丰富，还有一笔好染。

粮店虽然家数不多，但它是一大行业，店院宽阔，规模甚大，当冬季粮车上市的时候，一般后院都能容纳百辆以上。来自前山、后山的粮车络绎不绝，象流水似的。郊区的粮食多是粗粮（糜、谷、黍、高粱），后山盛产细粮（小麦、莜麦、胡麻、菜籽）。这些粮食的产区，有武川、四子王旗、达茂联合旗等地，武川占多数。

粮店的粮食仓库，都在一百间以上，每个单间粮仓，能储存粮食一百七十石，双间大仓能储存四、五百石。冬季五个月能储存两万石左右（包括客贮粮食）。粮仓都是按千字文编号，一仓一字，如：“天、地、元、黄、宇、宙、洪、荒……”等。

粮店在业务经营上，一般都掌握季节，秋收时购积粮食，待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投放市场。一九二四年平绥铁路通车之前，粮店营业比较稳定，一般采取薄利多销原则，每斗赚上三分五分钱就算不错了。通车以后，粮食可以运销到外省市，粮店行业有了发展，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这个时期，是粮店行业的兴旺时期，小麦、油粮大部分输往

天津和北京地区，粗粮输往南方省市（有输到无锡市和蚌埠市的）。粮食行业非常活跃，后来归绥又增设了几家粮栈，半道街的济通粮栈、西五十家街的公记粮栈，车站有天亨粮栈，这几家粮栈专搞代外省市采购粮食，办理托运手续，往外省市运输粮食的业务。

一九三六年归绥市的粮店搞过一回粮盘交易，一笔买卖就在三百石、五百石以上，做成批交易。大商业的老板们都来瞅行情，实际上是买空卖空，图取暴利，想发横财，结果十家就有九户赔了钱。赔钱的都是卖空的，他们还是按照以往的老规律，每年到秋收时期，粮食行情一定要落价，所以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春夏青黄不接时，大量高价卖出，以为待到秋后用低价收购，这不是稳赚吗？那料到这年的秋季粮食不但没有落价，反而行情猛涨，这一下把一些卖空的人家，就象那鸭子的嘴，捏扁了。为什么粮食会后涨呢？其原因有二：一是这年有的省市粮食欠收，外地客商纷纷来绥采购；二是绝大多数的卖空人家，也要抢着买粮，以补卖空之数。这些卖空的人家，他们卖下的亏空还补不起来，那有粮食再外销呢？所以秋后粮食价格猛涨，影响到市场百物高昂。

这年十二家粮店就有十家亏钱，亏钱的原因，怨他们没瞅准行情，换句话说，也就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的变化，违反了客观规律的原因。唯有南柴火市街的聚丰粮店这一年是大大地赚钱。聚丰粮店的副经理（二掌柜）武则赋，他充分地估计了周围省市的年景，调查了旱涝自然灾害，估计秋后必然出现粮食紧俏的形势，所以他在青黄不接时大量地定购，果然到秋后粮食上涨，外来客商定货，他可以说是做了霸盘买卖了。人们夸奖武则赋说：“武则赋，真能干，粮食

买下几千石，现洋（银币）赚下好几万（聚丰店这一年约赚七万元）。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入侵中国，粮行走了下坡路。农村的粮食大都交了官粮，送往公家的粮库，能上市的很少。日本鬼子组织了粮业组合，来管理粮店。粮业组合和行社不同，过去粮行归“聚锦社”，统属于市商务总会之下，由各家粮店轮流执事，每年轮换一家，其任务是支应官差，也就是应付公家的摊派，没有专设机构，也没有专职人员。粮业组合则是日本人组成的机构，掌权的是日本人，主事的有个姓申的，不知叫什么名，人们都称“申主任”，虽然有个粮店经理张殿兰，名义上是组合长，实际上没有权。这个组织控制粮店自由贸易，对集余粮食进行监督。粮食行业，日趋萧条。

在日伪时期，汉奸特务十分猖狂。这些狗特务们在地方上进行敲诈勒索，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尤其是当地那三大特务，十分凶恶，他们是：张桂枝、冀西峰、白玉。白玉是本市的回民，张是山西忻县人，冀是山西崞县人（现改原平县）。这三大特务小字号他们看不起，专吃大食，到大字号敲诈，差不多三天两去，粮店是他们索取财物的总地方，特务一来，不是吸大烟，就是打麻将，名义是借钱打牌，赢了也不还，输了更有理，精吃白拿说贫话，掌柜的见了比鬼还怕。德丰店的经理傅崑山，无辜被害。他们借口说傅崑山通八路军，把老头抓到新城日本宪兵队，拷打折磨，死的十分凄惨。兴和店的张喜槐掌柜，也是被特务陷害而死的。死了傅崑山，惊死了张殿兰（义丰店经理）。在日伪时期，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人们欢天喜地，以为粮店又能

经营了。有的增加了人员，有的增加了资金，另外还新开业几家。新粮店有南柴火市街义和粮店，经理是曹文魁，柜上的掌柜的是刘国梁；通顺南街广和公粮店，经理是杨增；通顺西街还开设了两家粮店，路北是福源公店，路南是德生粮店；文庙街新开了德和粮店。后来开设的这几家规模不大，人员也没有那么多，大多数是小型集股经营。

国民党来了，人民更遭殃。反动派进城后，到处抓兵。有钱的以马代丁，没钱的抓去当兵。粮店的年轻人为了逃避兵役，给国民党的军队里、政府里花上钱，买上一套军装，登记上名单，顶不上名的，成天提心吊胆，无处躲藏。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腐败无能，经济恐慌，货币贬值，物价高涨，法币改为金元券，最后终于完蛋。这个时期，粮店的店员们赚下的工资不敢要钱。上午开支的钱，下午就能亏一半（物价猛涨）。所以卖粮的赚粮，卖面的要面，其他行业都也一样。

国民党统治时期，粮店共同组织了粮业公会，公推会长，先是孟维俊，后来常见大德长店的陈辉跑前跑后的。公会的任务，本来是代表粮店，对外联络，实际上也成了支差单位，没起积极作用。

再谈谈粮店店员们在旧社会的生活情况。粮店和陆陈行都是受苦行当，人们常说：“土钵粮店、陆陈行，撂不了苦，吃不饱”。因为粮店吃得不好，天每早晚两顿饭，炒面、稀粥，稀粥、炒面，中午一顿，莜面、荞面、豆面，循环周转。工资一年十二元，一天平均三分三，连自己的穿衣费都不够。在吃饭的时候，小弟兄们取笑的说：“工资钱依旧了，全凭肚装吧。”

想起旧社会，眼里就落泪。扛长工难，做媳妇难，住地方的更苦难。说话不敢高声，家里走步不让有声音，掌柜的睡着恐怕惊醒，捧茶、点烟，眼里说话，动作要灵敏。袜子烂了自己补，衣服破了自己缝。在旧社会伺候人，有一句结论：“干好、万好，一时不好，就被开除了”。穷人怕失业，打了饭碗更可怜。尽管那样艰苦，仍然非常讲究人格。人虽穷，但人的品质和信誉不能坏。过去有句格言：“富不淫，穷不盗”，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如果不是这样，就被人鄙视。

解放后，我们店员们，才脱离了这种苦海，大都安排在国营单位，成了国家的主人，过幸福的生活。

# 回忆义丰粮店

赵国华

原归绥市小召前半道街南头有一所坐东迎西的大院，就是原来的义丰粮店。它是前归绥市十二家粮店之一。该店成立于公元1924年间，财东起初是山西省崞县的张三猫。本名张树帜，字汉捷，乳名三猫。此人是山西省阎锡山部下的高级军官，曾任过山西省北路镇守使，衙门设在大同市，雁门关北的晋军都归他指挥。

义丰粮店的经理是周达德，也是山西省崞县人，与张三猫同乡，所以张三猫拿出壹万元作为资本，支持他开设了这一个义丰粮店。粮店的字号牌匾，是从大同制成运来归绥的。当义丰粮店开业的时候，横挂在大门上边，上写着斗大的三个金（金色）字：“义丰店”。当时人们给编了一套顺口溜：“黑牌金字，张三猫的独事（独资）”，又说：“大门不正，厅子歪，掌柜的就叫——周不开……”。

经理周达德，为人正直，说话也直爽，对店内人员要求严格，不好好干工作的，他真不客气，但他有嘴无心，说完拉倒。因此，伙计们有三分怕他，都听他使唤，有时挨了骂，由于日久天长摸透他的脾气，也不计较。

周达德掌柜十分重视培养青年人才，在他的培养教育下，先后出了不少精明强干的人。例如，裕源公店的阎铨、郭鹭

于庆龙三位掌柜，原来就都是周掌柜的徒弟。还有聚丰店副经理武则赋、广聚店的经理郝步蟾，这些年轻能干的人才，都是周掌柜培养起来的，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

公元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张三猫辞职还家，将一万元投资全部抽走。当时京绥铁路已经通车，当地的粮食能运往京津一带畅销，粮店行业正在活跃时期，况且义丰粮店也不是亏钱买卖。于是又招了新的股东。这次加入的财东有半道街德恒永、通顺街的武兴亮、大御史巷的赵明、山西定襄县的牛车善堂，还有城南公喇嘛村的义和泉粉房，这家粉房的财东名张耀元，同意垫财合股经营。

上述六家新股东，共计投资一万七千五百元，每三千五百元作为一个整股，共作财股五个。当举办柜事的时候，将这几家的股份分别记入万金帐上，作为合股经营的合同契约。从此义丰店的字号改名为：“义丰恒店”。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四年，八年的经营过程，扩大了业务，打下了经济基础，曾开过二次红利股子，一次开过银元三千七百五十元，一次开过一千八百五十元。

公元一九三四年，股东又有变更，主要的新财东有德中和土店（即经营鸦片的商店）的经理贺秉温，还有小南街世义成的翟世华，和盛祥的季子明、德恒永。

贺秉温是挂名的经理，张殿兰是实权当家掌柜，张左仁是二掌柜，张懋廉是三掌柜，斗头儿是王来治，以下是：王奎科、胡雨亭……等。原来的老掌柜周达德年龄老了，新店的副经理们想给他结算帐，一脚踢出去。但是，周达德掌柜与老房东——义和泉张东家相处多年，深知周掌柜虽然年老、



精力已衰，但他为人正派，作事公正，为店柜经营事业操劳了一辈子也没赚下些积蓄，今天居然要将老汉取消到底，踢出归家，晚年不管，这也太不讲情义了。所以义和泉新东家，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义丰店的店院是义和泉一家的产业，所有权是属于义和泉的，于是给贺、张提出一个意见，

“这次你们重新写札柜事和人员，如果还有周达德在柜，我的店院房屋仍让占用，如果没有周掌柜，店院我想要收回，另开车马大店，请找别处，立即迁移”。因为原来占这个店院时是从周掌柜的关系上才让的。义和泉就这样将了张殿兰一军。

粮店不比其他行业，店院需要相当宽阔，粮仓、油厅、厅房、马厩好几百间，不易移动。为此，贺、张不得不答应，这才将周掌柜留下，但是，以后柜事不容再管，给吃点劳金，以度晚年而已。

贺秉温这次加入义丰店，以经理名义出面，其目的是想当商务总会的会长。这个目的后来终于达到了。当然，商务总会的会长在地面上名头高大，可以扩充经济势力。在旧社会里，为争名夺利，象贺秉温这样玩弄权术，并非个别现象，日本人进来以后，贺秉温一直爬到厚和市的市长地位，这和他投资义丰店并任经理职务，不无关系。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从张家口捉回来枪毙，落了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义丰恒店从此结束，第二次改称为义丰和店。主事掌柜是张殿兰，斗房的大头儿是王来治，一九三六年王来治死后，杨道岐当了大头儿。大摸斗的贾如意、刘存，他们都三十来岁，正当青年有为的时候，进粮仓打粮食(过斗数)，每斗

粮食重量足够三十五斤（包括斗皮重），一气打三十石不展腰。两人一前、一后，两只粮斗循环着飞出，仓口上有一个倒斗的，川流不息，倒入麻袋，就象一股水流似的，真快，一阵就装五十包，看起来眼花缭乱，目接不暇。

义丰店的店院宽阔，前院过斗，后院储存，粮仓一个挨一个，约有一百多个，每个粮仓写着标志，按千字文排列：“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每个大仓能容四百石，小仓也能储存一百七十石。加上东、西囤，冬季积粮能贮两万来石，其中包括客贮粮食。义丰店的相与前后山都有，后山细粮多（小麦、莜麦、油粮），川地大部分是谷、黍、高粱。

过去粮店的掌柜们常说：开粮店的有三付资本，其中股东投资是一付本钱，这谁都知道，第二付本钱是以粮食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又能购进一部分粮食。第三付是，借用客户储存之粮，次年粮价高涨时卖出，以归还银行贷款，不再支出利息，待到秋后集粮时候，又能低价收购抵还，这样循环、周转，三年过来总能长钱。所以粮店行一般经营赔不了钱。

义丰店也是一家大粮店，包括店柜、斗房、车房、磨房、伙房、下夜房、看囤人等，全店共有八十人左右。人们说：粮店开了门，对外是一家，到晚关住门，对内是七家，是个大家庭。

张殿兰、张友仁在企业管理上，水平一般化，使用人方面，比不上周掌柜。周掌柜对伙计们一视同仁，讲究：“天子重英豪，不要重地道，只要有本事，不问那乡人”，因此，在他当义丰店经理时期，培养出好多人才来，这和他的思想作风是分不开的。

义丰店的弓守先、李茂才二位先生（会计），是周掌柜一手培养起来的，这两位年轻人有才学、有能力，是义丰店的后起之秀。如李茂才写帐记忆力特别强：“冬季集粮忙，流水上千行，如有一笔差，脑子有印象，采用活捉法，一下能找见，大显神通手，人人佩服他”。

弓守仁又名弓长龙，挺机灵。人们说：“年轻活泼的弓长龙，多才多艺百事通，能写会算样样精。还会书法读古文”。这两位先生现在都年过古稀，但精神还很好。

粮店的店员们（小弟兄们），在旧社会里十分可怜，有这么几句话：“粮店业，受苦行，吃的不好，挣钱难。一年工资十二元，平均每天三分三。每年二、八月，十分心胆寒（怕开除、打饭碗）。”为什么老人们让我们住粮店呢？

“一十五岁离家乡，妈妈送我村外边，两眼不禁泪汪汪，金石良言吩咐咱，家穷住粮店：‘摆不了苦，吃不饱，……’”真的，住粮店真苦寒，炒面稀粥大锅饭，一年四季都不变。每天中午学写字，到晚锻炼打算盘，天天学，日日练，勤学苦练不厌烦。

公元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侵入绥远，人心惶惶。义丰店的人伙走了大半，恰好这年冬天，粮车增多，可把留守的人们忙坏了。一九三八年，局势稳定了些，回家的人们纷纷返绥，原来的地方一律不要，家家重新用人。但是，住粮店的那些人，依然再住其他粮店，这就是：本行干本行，省得再培养。

日本鬼子进来以后，公元一九三九年，成立粮业组合，对粮食行业加强了统治，当时家家营业萧条。义丰店的经理张殿兰，为了维持店柜存在，加入了粮业组合，各粮店的人

员被分配下乡收购公粮。粮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在日寇统治时期，走狗十分猖狂，在当地有三大特务，最坏的是：白玉（本市回民）、冀西峰、张桂枝，他们手下还有狗腿子，这些狐群狗党，更为阴险，整天游街串店，混娘诈钱、进行敲诈勒索，好人见了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对他稍有不满意，轻者打你个半死，甚至抓到日本特务机关，置于死地。德丰粮店经理傅宝山，兴和粮店的掌柜张善植，都是无辜被害，死的十分凄惨。义丰店的经理张殿兰，那年正染病在床，闻此噩耗，亦受惊而亡。

日寇侵占八年，粮店行业处于低落，后来义丰店有些年轻人，纷纷离开，另行组织开设新店。

公元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又来了国民党，粮店更遭殃，又抓兵、又要钱，粮店还是不好干。

义丰店最后与北沙梁原义兴店李兴邦（又系兴和店的粮头儿），合并为一家，重新开设了永恒粮店。义丰店的全部历史也就结束了。

# 关于天主教

张辉敬

天主教传入中国，始于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当时传教士很少，及至一九四〇年鸦片战争后，各帝国主义者打开中国的大门，作为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工具的各国传教士大量涌入。

各国派出的传教士，统由罗马教廷传信部管理。传信部给它们划定传教区。各修会的传教区，一般都划在本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所划的传教区，冠以地方名称。例如“绥远教区”、“宁夏教区”……等。至一九四〇年，全中国已大发展。

到十九世纪后期，基本上每个传教区都有本教区的小修道院，而大修道院则是几个教区合办一个。至一九二二年全中国有十四个大修道院，亦称神哲学院。

内蒙传教区设于一八六五年。未设前，远在一八二〇年，即有圣味增爵会也叫遣使会的传教士（亦名司铎，也叫神父），从北京经过张家口东北上的西湾子（天主教徒聚居点），来呼市新城看望教友，只是临时往来，并不常住。以后又有从山西太原府来探望的，也不常住。至一八六五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正式经罗马教廷传信部批准，在内蒙古设传教区。其范围包括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还有宁夏省的银川市、陕北的部分地区，以及山西省的大同城区。总起叫

内蒙古传教区，分为：热河教区（热河全省）、西湾子教区（察哈尔全省）、绥远教区（绥远省境西至包头，包头的西门外就为宁夏教区了）、宁夏教区（河套、宁夏一部分，陕北一部分）、大同教区（大同和大镇、阳高以及周围地区）。一九三二年从热河教区分出赤峰教区（赤峰市周围，叫国籍教区，由中国籍主教、神父管理），一九三九年从西湾子教区分出集宁教区（也是国籍教区，包括集宁、丰镇、凉城、察右前、中、后旗和商都县）共七个教区。

至一九二二年，全内蒙古传教区内已有热河松树嘴子小修道院，西湾子小修道院，绥远二十四顷地小修道院和宁夏三盛公小修道院，就是没有个正式的大修道院（即神哲学院）。经各教区的主教们共同商定，建立一个内蒙古的神哲学院，地址选在山西大同府南门的卧虎湾，于一九二二年动工，一九二四年建成。第一批大修道生在新建成的“山西大同修道院”（即神哲学院）上课。入院学生人数屡有增加，及至一九三〇年后增至百人左右，楼房狭窄，容纳不下。各教区主教们又开会决定，把神学与哲学分开，即以大同神哲学院改为神学院，另建哲学院一处，地址选在交通要道的绥远省归绥市，玉田城水磨街，从一九三五年动工，一九三六年秋建成，共支建筑费现洋伍万元。可容纳五、六十名学生和教职员，供教学之用。

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时，解放军进驻大同神学院，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炸坏了神学院的楼房，院方决定迁往绥远，经解放军将全体师生护送到大同北面的孤山火车站，又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辗转到了归绥市。这样神学院与哲学院又在归绥市合并为神哲学院了。这时的院长是廉启心（比利时传教

士)。一九四八年冬绥远教区主教穆清海为逃避即将来临的解放，命白祥副主教（中国神父，当时就逃往国外，叛国了）带领六辆汽车转移到巴盟，又转到三盛公。其中以廉启心（比利时人）为院长的神哲学院全体师生乘了四辆汽车，二十四顷地以郎葛礼（比利时传教士）为院长的小修道院的高年級修道生和教员们乘了一辆汽车，呼和浩特市中国修女院的修女们乘了一辆汽车。小修道院转到三盛公后与该地小修道院合并。

一九四九年绥远省和平解放了，穆清海派高若山中国神父去巴盟把全部大小修道院师生和修女接回来，各归原处。

解放后，在呼市的天主教人员，曾因外籍传教士的煽动，一度抵制“三自”革新运动，但在外籍传教士返回本国，当地教友思想逐步提高的情况下，已走向爱国、爱教的道路。

一九五五年二十四顷地小修道院也合并于呼市神哲学院。

归绥市天主教哲学院历任院长：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为穆清海（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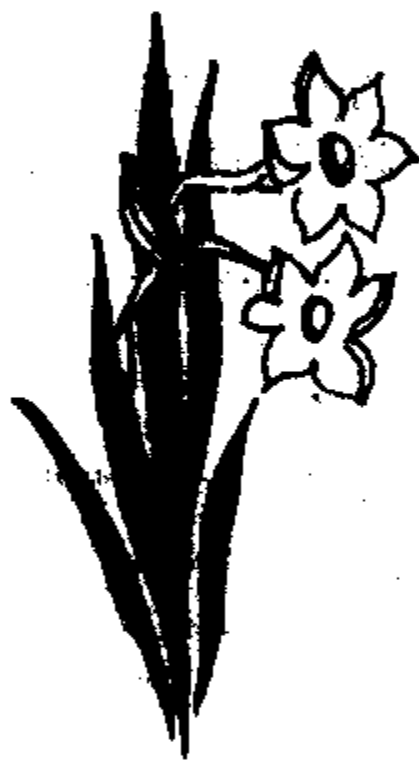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为廉启心（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为常守义中国神父（也是入了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二年为廉启心（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先为李从哲，后为赵国范（二人皆为中国神父）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为张敬中国神父（后改名张  
辉敬）





# 绥远省天主教神哲学院简介

少 林

天主教神哲学院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大专院校。

神哲学院亦称大修院。另有小修道院，是培养初、中级神职人员的。大小修院统称修道院。

内蒙天主教区，于一九三五年建绥远哲学院。一九三六年开始教学。一九四八年大同神学院迁来，合并为绥远神哲学院。

现将该院教学情况简介如下。

## 一、领导机构

学院有院长一人，主管教务及师生生活；有教导（亦称神师）一人，主管学校宗教及品德修养，控制学生的思想；教师十数人。他们都是由教区选择品学皆优的神父派充。教师大都是比国鲁文大学毕业。他们的生活费用由该管教区供给，不从学院领取。

## 二、招生和学科

学生由各教区小修院初、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凡品学良好，拉丁语及格，有志当神父者都可上升大修院。

哲学院主修科为哲学、语文、数理化等科。哲学有逻辑学、抽象学、宇宙学、伦理学等。学制三年，期满后，转入

大同的神学院学习神学。神学方面主要是学习教义教规、圣教史、圣教法典等。哲学和神学课本都为全教会通用，以拉丁文写成。这里必须指出教会学习哲学是为其神学服务的，以哲学原理去探讨教会的教义教规，给教义教规提供理论根据。

绥远天主教神哲学院，从一九三六年创办，到一九五六年，共招收过十几批学生，计三百多名。毕业后升成神父的约二百多名。其中有十几名被送往梵蒂冈入传信部大学深造，有二十多名被送往北平辅仁大学读书，其余都回本教区服务。有的派往偏僻的小堂口传教，也为数不多，而大部分是给洋教士当付堂，做弥撒，给娃娃们讲要理等。

### 三、生活和学习

绥远哲学院的建筑布局，分前后两座楼。前楼供教师办公、食宿；后楼供学生学习和生活占用。

后楼楼下正中为院长室，院长室的两侧有自习室、大食堂及各班教室。另外，有一座做礼拜用的小圣堂。楼上除了神师办公室外，整个是一个很宽敞的大寝室。

上课当然都去各班教室，而自习时，却集中到大自习室。室内有百十张大课桌，一排排，一行行，整整齐齐。每人有固定的课桌，他们不背书包，书和用具都安放在自己课桌的书柜内。室内有一条规则：保持安静。不管是否自习时间，也不论领导在或不在这里，而这一条规则必须遵守。

大食堂内摆着一行行长方形大饭桌和长条板凳，桌上按各人固定坐位放好了用洁白的餐巾包着的碗筷。

开饭时一齐开始，结束时一齐结束，师生一同进餐。开

饭时不准说话，由指定的学生轮流向大家朗读教会的圣书或圣人言行。

楼上大寝室的木板地上，摆着一百多张钢丝床，被褥都用一色的床单苫着，要求整洁、美观。院内学生都必须住校。寝室里不论是否休息时间必须严守静默，不许喧哗。

课前课后都有适当的体育活动、文娱活动和劳动锻炼的时间。院内从后楼到大门口的一条人行道上，两边都长着行距整齐在白杨树，挺拔笔直，直插云霄。白杨的一侧是菜园，一侧是运动场。运动场内，篮球、排球、足球等场地都有。各班教室都没有风琴、提琴和其他乐器。活动时间，运动场上的角逐声和音乐爱好者的弹唱声汇成一片活跃的景象。菜园里种有各种蔬菜，园地四周栽着桃、李、杏等果树，间或有一丛丛红玫瑰、白丁香散缀其间。楼前面整个是葡萄架，架上爬满了品种不同的葡萄树。院内一草一木都由师生动手培养、保护和浇灌。

#### 四、宗教生活

学院的学生，在学习上较差一些不要紧，但在宗教生活、精神道德修养方面如无长进，就会被认为没有“天主的圣召”，随时有被开除出院的危险。宗教生活方面主要是：

一、祈祷：祈祷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言行、工作学习诉给天主，祈主帮助，做好本职工作。他们认为服从领导就须必听命于神长，院规就是天主的圣旨，更认为只有热心祈祷才会好好完成自己的职守。所以早晨一起床就默祷片刻，课前、课后、饭前、饭后都做祈祷，晚间上床前，又通过祈祷，感谢天主一天的恩佑。在整个工作、学习过程中从祈祷

开始，以祈祷结尾，简直把祈祷放在学院的首位。

二、弥撒：弥撒是天主教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作为救赎世人祭品而献给天主的大礼。耶稣最后晚餐，以酒和饼祝圣，把自己的血和肉献给天主，又叫他的教徒吃了，并叫他们照着做，永为纪念。院内师生每天早晨起来在小圣堂内做此弥撒圣祭。小圣堂内放满了一排排的跪凳，前面正中竖立十字圣架，下面是祭台。做弥撒时，院长穿上祭衣走上祭台主持，学生们端端正正地跪着参与圣祭。

三、每月有一天为神修课（即小避静），在这一天内不许说话，严守静默，专务神修，进行默祷，自我省察。每年有一周为神修课（即大避静），在这一周内不许说话，严守静默，专务神修，自我省察一年的所做所为，考虑自己的前途决择问题。此外，每个学生每月要同神师面谈一次，即谓之谈心，谈自己的思想、言论、行为，并祈求指导。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与控制，院方规定：学生外出必须请假，并在出外时，须三人相偕行动，不许两人，严禁单独行动。

#### 四、解放前夕的绿远神哲学院

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摇摇欲坠，比籍主教穆清海等，竟作最后挣扎，通过向学生作报告，讲要理课，以中国的各个教区的“教案”为重点教材，以殉教的“先烈”为学习榜样，煽动学生作好准备，在“教难”时期，要忠于教会。他们特意指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内蒙托县，被义和团处理的韩默理主教（荷兰人）为殉教者中的“光辉典范”，把他当做“致命圣人”来尊敬，而且还编了

一段经文让学生向他祈祷，以煽动学生与人民为敌，替帝国主义卖命。

一九四八年底，穆清海将全院师生迁后套，又转三盛公。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战争胜利，年底又将全院迁返呼市。

### 五、全院师生推行“三自”革新的表现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这给中国天主教摆脱梵蒂冈控制创造了良好条件。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全国各教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自”革新运动。而穆清海、廉启心、徐正鹤等躲在阴暗角落里，煽动学生抗拒“三自”运动，说这是叛教行为。当呼市天主教教友、神甫、修士、修女到大南街人民影院开三自革新签名运动会时，廉启心、徐正鹤竟预先告诫学生抗拒签名，并带领学生前去破坏这一运动。由于三自革新纯属中国天主教内部事务，外国人无权过问，所以当时廉与徐都被关在门外，不准进入。会场内台上台下形势紧张，气氛森严。主持人先讲了“三自”革新的意义，然后要求大家签名通过，这时，竟有少数学生高声叫喊拒绝签名，以致运动受到影响。事后，穆清海还对学生表示不满，气愤地说：“你们都是胆小鬼，没有一点勇气”。

一九五一年帝国主义传教士全部离开我国之后，内蒙天主教在王学明总主教领导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爱国爱教的光明大道，全院师生也提高了政治觉悟，分清是非，参加革新。

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院内师生有的也曾被打成右派。

随之一九六〇年院务停顿。打倒“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恢复，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全国各教区堂口重新开放，上海、北京神哲学院重新恢复，呼市神哲学院也得到内蒙党委的关怀和批准，即将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重新开办。现在内蒙天主教爱国会负主要职务的有王学明总主教。还有张辉敬、田维耘等。也有在教育界、医务界、工厂企业方面工作的，如李英、高飞林、韩进学等，他们都是教会中有资望的神职人员，忠于教会、忠于祖国，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他们将在反帝爱国爱教方面，引导教友们，做出贡献。

## 从东土默川各村兴建龙王庙说起

刘友仁

一九五〇年以前，东土默川的村庄差不多都有龙王庙，因为中国的旧传说中“龙王”是会降雨的神，这一带地区为十年九旱之地，既然龙王会下雨，当时的人们便信奉龙王，给它建筑了庙宇，为它焚香、上供、祷告、领牲，祈求赐降甘霖，以泽禾稼，而维生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思想解放，这一带农村中的龙王庙相继被拆除。说到各村龙王庙的具体建立时间，因无史料记载，已无从查考。按史册所记，以龙王为司雨之神，系东汉张道陵所创道教之说，而道教传入土默特地区，又是乾隆年间大量汉人迁来垦荒时之事，距今约已二百三十余年。当时，涌入垦荒的大量汉族人民，为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兴建龙王庙，当系事出必然。

农民之所以迷信龙王，实质上是对雨水的渴望。东土默川人过春节叫过大年，年三十晚上除夕午夜后要笼旺火、放爆竹，接神上供、焚香、叩头，讨吉利。如果在拢旺火时天空中能有白雪飘扬，农民便喜不自禁地赶紧接口气说：“瑞雪兆丰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闹花灯，这晚哪怕能有几片飞雪飘地，农民便接口气说：“雪打灯，好年辰”。二月初二为龙王过节，有言道：“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家家要吃饺子，叫作“安龙眼”。男人们都要在这一天剃头，说这是剃

“龙头”，过了这天便是剃“狗头”了。尤其是男孩子们，当时使用铁匠打的剃头刀剃头，本来很疼，也只好咬紧牙根在这一天剃，甚至连哭都不敢哭出声，生怕惹得休息一冬之后入春抬头将要治水的龙王爷生了气，那还了得。那时，没有日历，人们看月日使用历书，也叫做“皇历”。历书上，把每一天都按六十花甲子编出来，从正月初一日看，最早的辰日在初几日，便说是几龙治水。如初五日是辰日，便说这一年是五龙治水。传说二龙治水最好，多龙治水反而不下雨，有句歇后语道：“龙多实靠龙多旱，媳妇多了不做饭”。在十年九旱的土默川地区，二龙治水也难免旱魃为灾，偶而也遇雨涝成灾的年份，农民便说：“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天旱又不下雨有什么办法，冬季很少降雪，盼到二月二龙也没有抬起头来，再盼到“立夏”，甚至到了“夏至”，也很难下一场透雨，墒乾不能下种，或种进去的地出不了苗，农民真是心急如焚。尤其是秋旱，危害更加严重。农民说：“春旱不算旱，秋旱撩一半”。仰望天空，烈日炎炎，眼看赤地千里，禾苗濒临死亡，该怎么办呢？这便出现了大规模的“祈雨”，也就是祷告请求龙王降雨的活动。

“祈雨”的形式很多。最简单的是落第一场雨时，鼓舞小孩子脱光了屁股，站到雨里淋身子，孩子们欣喜若狂，边喊边蹦任雨淋着。有的大人也和着衣服淋雨，口中自言自语道：“泻泻火，泻泻火”。还有的人家，小孩久病不愈，也要许愿说：“我家娃娃病能好，六月六为龙王爷领个性”。说话要算数，这一天准要在早晨太阳未出官前就宰一只羊，富户便杀一只猪，更富的还有杀头牛的。大型祈雨的便是村



中人集股宰畜出资上供焚香，轮番跪拜祷告，请求龙王降雨。趁着这个祭祀之机有巧取豪夺捞油水坑害人的，比如人家出不起资，豪强者就逼着人家卖地、卖牛，致使倾家荡产，美其名曰：“对龙王心诚。”

有趣的顶数“请龙王取水”最为隆重。常记得托县胡麻滩这个村自己没有龙王庙，就去别的村请龙王，然后抬着泥塑的龙王偶像再到黑水泉子去取神水，这支请龙王取水的人伙共为六个人，这个“六”与“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的“流”相谐。这六个人均为身强力壮的汉子，他们光着膀子，光着脚，有单裤不穿，专门脱下来围系在腰间，头上扎着带叶的杨柳树枝圈儿，请龙王的花轿上也插满了杨柳枝。出发专在晌午间，这是为了显示多炎热、干旱呀，龙王爷睁开眼睛看看吧。这六个人的仪仗队，头里一个怀抱红布绷着的瓶子，中间两人用花轿抬着从别村请来的泥塑龙王，后边三个人中，一个背一只大红牛皮鼓，一个拼死命擂得震天响，一个大铙拍得震耳聋，其意是生怕老龙听不见加大声响。打鼓的调子都有讲究，专门打当地最流行的“长流水”的鼓牌。到了那传说为神泉用锅扣着的黑水泉子，把红布瓶放到泉水里，六个汉子，左三、右三围泉水转六遭，便回。这支队伍走起路来，一个飞快，为的是午间去了午间回，图个吉利，使龙王爷自己也感到热得受不了发个慈悲下场透雨。

龙王也请过了，神水也取过了，全牲供神，满斗焚香，全村人叩拜祷告，求龙王恩赐，日日如此，等什么时候下雨了，才把泥塑龙王鼓乐喧天送回原地，便作了事。

人们费尽了苦心，一年到头，可顶好的地一亩也只产粮五斗，大部分一亩地是二、三斗，也有为数不少的地连种子

都收不回来,加之官匪抢掠财主盘剥,十年九不收的年景,年复一年地延续下来。东土默川各村在建立龙王庙的年代里,真是民不聊生。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四辑

作者 =

页数 = 1 9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